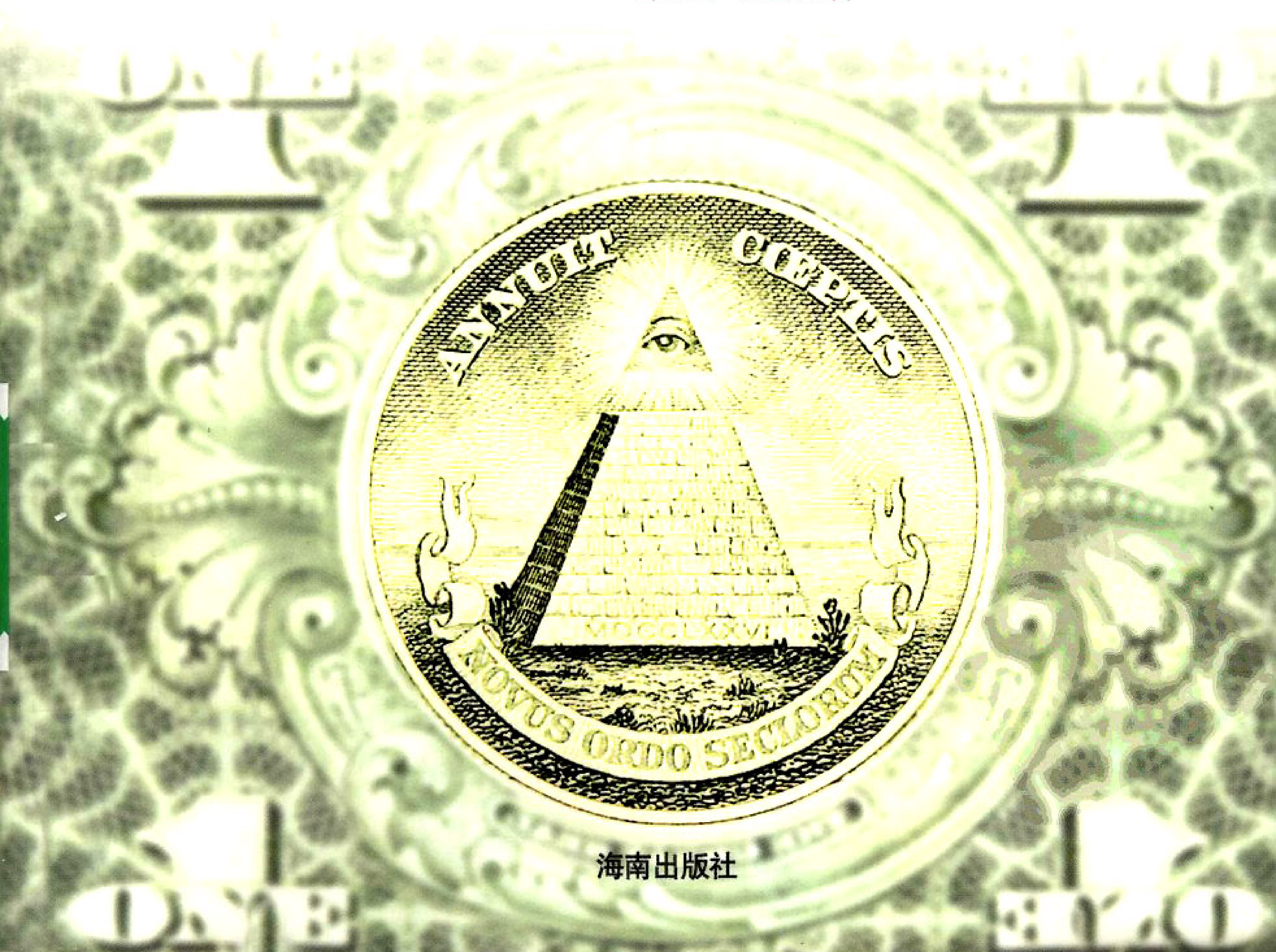
光明会

Who are the illuminati?

阴谋论的前世今生

[美] 林赛·波特 著
韦民 王春燕 译



海南出版社

光明会

Who are the illuminati?

阴谋论的前世今生

[美] 林赛·波特 著
韦民 王春燕 译

海南出版社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8－16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光明会/（美）波特（Porter，L.）著；韦民，王春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1
书名原文：Who are the illuminati?
ISBN 978－7－5443－3158－6
Ⅰ.光…　Ⅱ.①波…②韦…③王…　Ⅲ.启蒙运动—政治组织—史料—德国
Ⅳ.K516.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2919号

光明会

作　　者：［美国］林赛·波特（Lindsay Porter）
译　　者：韦　民　王春燕
出 版 人：苏　斌
总 策 划：刘　靖　任建成
责任编辑：刘德军
装帧设计：第三工作室·嵇倩女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25
字　　数：180千
书　　号：ISBN 978－7－5443－3158－6
定　　价：28.00元

目　录

导 论

17 世纪的光明会发誓向梵蒂冈复仇，这是历史事实。在伽利略时代，早期的光明会被梵蒂冈从罗马驱逐出去，并被无情追杀。光明会员逃离险境，藏匿于巴伐利亚，在那里开始与其他躲避天主教清洗的难民群体合流，这些难民群体包括神秘主义者、术士、科学家、超自然主义者、穆斯林和犹太人等。

——丹·布朗，2001 年。

光明会这个控制世界方向的小集团是基因的杂交物，是数千年前状若爬虫的外星种类与人类混种交配的产物。

——大卫·伊克，2003 年。

谁是光明会成员

谁是光明会成员？是 17 世纪的神秘学派和江湖术士？俄国革命背后邪恶的操盘手？还是寻求针对人类、策划宇宙阴谋的外星人？在所有诸如此类的指控背后，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说这只不过是传说和神话而已？我们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光明会是一个叫亚当·韦斯豪普特的人于 18 世纪在巴伐利亚创立的，它是一个短命的秘密组织，为“共济会”所仿效。这个组织的名称“Illuminati”，意为“启蒙的人”（enlightened ones,

又译为：受光照的人），系韦斯豪普特亲自选定，以反映这个组织对知识的追求，尤其是对平等主义和理性哲学思维的追求。这些诉求是18世纪的欧洲其他地区闻名于世的启蒙运动的基础。历史事实显而易见的光明会，何以某种程度上近似疯狂地与外星基因杂种、世界新秩序，或一个世纪之久的报复天主教会这些不同的想法挂上钩来？一个蕴含光明、启示和清澈透明的字眼为什么并如何演变成黑暗、恐惧和混乱的象征？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探究每个理论的起源及其演绎进程。通过结合各个显然互不关联的理论，来提供一个从今天的视点去追索光明会最初陷入为人诟病之时的系谱，那么，一个共同的线索就会显露出来。一旦建构了这样的系谱，关于光明会的神奇故事自然清晰可见：该会仅仅源自一小撮人，在几十年里，基于其自身体会的焦虑感，他们对光明会的内涵进行解释和装饰，并将这些理念传承到下一代。

20世纪6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提出了一个周期性的且不断加剧的历史现象，这甚至是个困扰人的问题，那就是历史的阴谋观，这个理论观点认为世界事件都是通过颠覆和秘密策划而产生的。他称之为“偏执的格调”（paranoid style）。这个趋向的特征是相信历史事实不是来自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而通常是由幕后少数居心不良者精心操控的结果。霍夫斯塔德率先把这种倾向与极端右翼等同，他从历史的视角将少数团体看作是承担“世界病”罪责的替罪羊，其中有移民群体、少数族群、犹太人、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或者更遥远过去的“共济会员”。霍夫斯塔德提出此理论40多年之后，“偏执的格调”不断兴旺发展，但不再只是极端右翼者所独有，也不再是政治理论的范畴。在一个信息24小时不断传播的时代，也许我们都变得太过愤世嫉俗；

也许战后已经揭露了太多官方的谎言和掩饰，阴谋论已然是当今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世界贸易大厦遭到攻击的几天里，各种阴谋论蜂拥而出，对发自白宫的官方说明版本构成挑战；戴安娜王妃的巴黎之死在英国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仿佛警察当局和街头小报不过是在偏离那些追寻隐藏事实的细节。即便在世俗的生活中，阴谋和怀疑都是共同话语的组成部分。真有些莫名其妙，如同《X 档案》的口号“事实就在那儿”（The Truth is Out There）一样，我们好像在期待着政治家向我们撒谎。

精心包装的“阴谋论”

今天，“偏执的格调”的特征是，无所不包、支配一切的阴谋论观念已稳步来到舞台中央。比如说，对于肯尼迪总统谋杀案的直接影响，无以数计的观点相继面世，与包括“沃伦委员会报告”在内的官方版本叫劲，该报告描绘了若干政治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随的替罪羊——黑手党、国际共产主义者、共济会员、得克萨斯的石油大亨或者中央情报局名列其中。而在当今，阴谋论者在这些不同的因素之间找到联系实乃家常便饭：在一个庞大的阴谋网络中，任何事情都是不无关联的。这些“大阴谋论”（mega-conspiracy theories）最盛行之处，是断定这个世界由一个秘密权力掮客组成的精英集团所统治。一旦人们接受了这样的基本前提，那么一整套假设就会紧随而至，甚至表面上纯洁无瑕的行为也会被视为邪恶；例如，政府公布社会保障号码就被看作是积极谋求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证据。

前“守护新世纪”（goalie-turned New Age）的头目大卫·

伊克（David Icke）显然是这种趋向最极端的一个例子。他炮制了一个号称超越时空，甚至物种的理论，用世界的新时代这样的解释进行包装，声称人类面临的终极武器是环绕地球的“负能量”。但是，在倡导无所不包的阴谋论上，此人并非特例。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信徒、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帕特·罗伯森（Pat Robertson），在其1991年出版的著作《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中归纳了一个令人惊异的共同信仰，描绘了一条秘密组织与白宫、国务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相联系的单线，以及他所称呼的“极端新时代分子”（extreme New Agers）。为了实现一个“世界政府、世界警察、世界法院、世界银行和货币，以及世界精英”的计划，“财富的彻底再分配”或者彻底摧毁基督教信仰就必不可少。

这些经过包装的无所不包的理论四处泛滥，究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光明会。今天，许多阴谋论者将光明会信徒看作是虚幻的精英，他们与谋求一个世界政府的各种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罗伯森所说的与政府高层连接的“单线”。罗伯森津津乐道的一个流行论断就是，这帮精英寻求摧毁支撑西方文明大厦的两大支柱——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今天，许多基督教右翼进一步接受了这样的论断：光明会与“反基督”实为一丘之貉。这只不过再次说明了阴谋论的立场是何等的不明不白。比如，美国的“爱国者运动”（the US Patriot movement），实际上是一个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组织，坚持白种人基督教徒至上的理念——这是上帝赋予的、超越任何其他信条和种族的权利。在如此环境之下，它与得出这样的结论之间只有一墙之隔，那就是非基督教信仰就是威胁，就是寻求摧毁其所谓的优越性。那么，除了撒旦，谁是基督教主要的复仇之神？光明会怎么与这样的假设纠缠在一起了？如丹·布朗（Dan Brown）在其畅销

小说《天使和恶魔》中所断言的，光明会是17世纪誓言报复梵蒂冈的敌人。这样的看法有什么事实根据?

阴谋论的幽灵

看来，就像当代对于背信弃义的便利寓言一样，基督教右翼与“新时代”（New Age）阴谋论者也在从稀薄的空气中召唤光明会的幽灵。但是，它们不是第一个让光明会承担“世界病”罪责的组织。20世纪60年代，光明会被喻为一个更严峻的威胁：共产主义的传播。对此深信不疑，且四处招摇的是糖果生产商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此君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美国极端保守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的创始人。罗伯特·韦尔奇仅凭一己之力就复活了战后对光明会的恐惧心理，在其1966年撰写的短文《及时的真理》（*The Truth in Time*）中写道：

> 无论这个越来越无所不能的秘密指令是不是归因于韦斯豪普特的光明会，或者是来自这个和其他组织的领袖，我们都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可能一直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其他人曾经是。因此，为了尽可能避免这样的问题，让我们姑且称这样的统治小集团为“内部人”（the Insiders）。

当罗伯特·韦尔奇建立“约翰·伯奇协会”，以抗御共产主义在美国传播的时候，他是横扫这个国家的“反共”浪潮的一个波浪。按照中央情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目标无他，就是要“摧毁西方文明，并将历史拽回到野蛮的残忍时代和专制主义”，韦尔奇的所作所为就是要消除这样的影响。他一直是20世纪50年代臭名昭著的参议员麦卡锡“追猎女巫”（witch hunts）行动的积极支持者，并

以建立他的“协会”来强化其“十字军运动”。显然，韦尔奇认定了这样的必要性，即60年代“约翰·伯奇协会”从数以万计的大众中吸纳成员。但是，韦尔奇的反共说辞是独特的，他选择相信并确认一个幕后的隐藏组织，傀儡的主人在操纵着一根“共产主义细绳”。无论他了解与否，他都在进行着一个相当邪恶的寻找替罪羊的传统，一个从本世纪伊始的残留物，其根源则更为古老。

即使罗伯特·韦尔奇将光明会神话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据此为颇具自身特性的政治议题而变换花样，他也不能令人信服地演绎这个故事。他绝对不是在反共狂热中编织秘密阴谋和模糊力量观念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柯林神父（priest Father Coughlin）通过一系列的广播节目，在大众中掀起了一阵反共狂潮，他的知名度甚至家喻户晓。柯林的反共狂热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一个秘密的精英团体，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核心部门，正在幕后静静地密谋。10年前的20年代，美国汽车制造大亨亨利·福特就已经使用了同样的模式，认为一个秘密力量正在幕后暗中谋划，以推行其政治议程。但是，反共不是福特的目的。他在20年代出版于《迪尔伯恩独立》上的系列文章，使得一个令人厌倦的、现在大多遗忘了的遗产永续存在下来。福特的文章表达了其猛烈而持久的“反犹主义”立场，怀疑存在一个正在渗透并损害美国人生活所有方面的犹太人计划（通过从棒球到爵士乐、到禁酒年代的私酒等非凡手段）。在其执迷不悟的报复性活动里，福特暗示有一个秘密组织，并且受到所指控的犹太人的影响；光明会卷入其中，但它是“一个伪共济会，源自法国，意在无神论和革命，受犹太人的强力资助”，犹太人隐藏在“共济会的名义之后”，以推进其穷凶极恶的意图。利用流行的替罪羊理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共济

会”阴谋构成三位一体，并在光明会幌子下搅成一团。

关于犹太人

福特不能避免地受到一本名声扫地的伪书——《犹太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影响，该书于20世纪早期问世，试图冒充一个犹太人小集团的成员之间策划主宰世界的会议记录抄本。从其混乱不堪的起源看，现在人们还是相信这是苏联秘密警察的杰作，希望借此煽动反犹情绪，并为其在新世纪转换之际横扫这个国家的邪恶计划赢得支持。在福特将秘密组织的神话并入到其反犹活动的过程中，他颠倒了修正主义历史学家、法西斯分子内斯塔·韦伯斯特提出的理论，后者在光明会传说的发展中提供了下一条线索。韦伯斯特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作品确定，一个秘密的犹太人小集团只不过是个烟幕弹，正是光明会通过传播世界性共产主义的恶魔般的图谋，才使得其主宰世界的计划长久存在下来。《议定书》仅仅是一个牵制性战术，就如同她在1922年的《世界革命》一书中所阐述的：

> 这里是全部的解释：犹太种族的阴谋也许发端于骷髅地（Golgotha），它隐藏在共济会仪式的背后，为随后的革命浪潮提供驱动力，并激发了马克思阴森森的仇恨、托洛茨基的恶性理论，以及所有具有顽固而坚定的旨在摧毁他们痛恨的基督教之目的。这个理论真实可信吗？或许。但在目前的作者看来，它依然不能证实，因为它没有提供这个神秘事件的所有关键点。

该神秘事件的关键点在韦斯豪普特的作品中或许可以找到，这些作品反映了韦伯斯特时代热衷于神智学和其他神秘主义的

时尚，她声称看到了隐秘活动的证据：

> 我们不要忘记：在光明会兴起的同时，繁荣于巴伐利亚、且竭尽全力与其联系的撒旦小团伙，今天正在我们的国家兴风作浪。现代光明会行使的权力是包括从催眠术到巫术的神秘权力，自从18世纪之时起，魔术师卡格里奥斯托（Cagliostro）就部分确立了这个教派惯用的手段。

诸如此类，韦伯斯特令人信服地将光明会的故事引入到20世纪，并为延续至今的许多理论奠定了基础：神秘主义者的断言在基督教右翼的恐惧中再次浮出水面，并强化了光明会撒旦崇拜的名声；这个组织的共和主义哲学被歪曲成共产主义威胁的化身，究其背景，则是反犹主义肮脏而不可逃避的污点。多么有趣的遗产！即便今天，韦伯斯特的作品作为有分量的历史文献而经常被引用，以充当光明会存在的证据。甚至对于主流社会、有声望的出版商而言，韦伯斯特的著作也是继续翻印出版的香饽饽。

但是，韦伯斯特关于光明会的看法根源何处？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并不缺乏意识形态的敌人，为什么她要选择复活一个已有数世纪之久的教派？从任何方面来看，这个教派至少存在了一个世纪。

作为一个反犹的狂热分子，韦伯斯特同时也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保皇主义者。在其从事阴谋论研究之前，她撰写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其中包括一本浪漫的小说，她通常持有与上层社会相同的见解。在研究期间，她恰好接触到正在探究光明会神话基础研究的两个男士。其中之一是遭耶稣会驱逐的一个无家可归的牧师，牧师正在撰写当时正在开展的法国大革命，他将光明会的观念引入欧洲大陆，并把这个“指挥棒”传递到令人尊敬的苏格兰科学家，科学家们再把这个指令散布到

整个英语世界。

当好战的天主教组织，它以“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or Jesuits）而闻名，在18世纪中期遭到法国王朝解散的时候，巴鲁尔神父（Abbe Augustin de Barruel）被迫逃离法国。此时，法国大革命这一爆炸性事件已然显露，正如其他人之所为一样，巴鲁尔也在寻求大革命的答案和原因。作为一个保皇主义者，他不可能将人民起义归咎于放浪形骸的宫廷，相反，在1798至1799年出版的《雅各宾主义历史阐释备忘录》（*Memoirs Illustrating the history of Jacobinism*）这部详尽的四卷本著作中，他开始构建煽动者的身份。在罪人之中，有启蒙哲学、革命的雅各宾派和共济会分子。巴鲁尔把这些煽动性意识形态的起源回溯到了一个阴暗的地方小镇上业已消亡的哲学团体，那就是光明会。该会的创立者亚当·韦斯豪普特：

> ……本质上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现象，一个无神论者自责的空虚感，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因为缺乏过人的才华而对真理百般狡辩，他具备邪恶的所有能量和狂热，据此产生了这个无信仰和无法无天的阴谋家。

如果不是巴鲁尔，光明会的故事在蠢蠢欲动之时，也就是1788年政府宣布其为非法组织的时候就几乎完结了。但是，光明会的故事对于巴鲁尔来说再理想不过，是不能拒绝的：在此君眼里，这些外国哲学家们似乎在坦率地鼓吹激进的法国哲学观念，不仅如此，他们还与神秘的前基督教教派（推断为反基督）过从甚密。对巴鲁尔更为受用的是，光明会已经不再存在，他人因为死无对证而难以驳斥他的论点。根据光明会的故事，他建构了这个组织的声誉，为一个将传承其个人传奇的神话播下了种子。

罗比森的观点

就在巴鲁尔对法国大革命中秘密组织所谓的角色鬼迷心窍之时，苏格兰科学家约翰·罗比森（John Robison）正在从另外一个渠道来考察这些证据，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将责难几乎都置于光明会的脚下。但是，罗比森是从一个纯正新教徒的立场上来探讨光明会的。他的著作《1798年的阴谋证据》因此充斥着道德谴责：

> 他们首要和急切的目标是在没有工业的基础上占有财富、权力和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妄图消灭基督教；然后，大肆挥霍之风和普遍性的放浪风气将使他们获得所有邪恶的信徒，并有能耐推翻欧洲的文明政府；此举得逞，他们将考虑更广泛的扩张，并延伸到其他大陆，直到他们将人类一律降格到无序的群氓状态。

罗比森的观点传播到了1798年秋天刚刚诞生的美国，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时期。法国大革命对这个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双方的看法差异形成了政党间的分界线。保守主义者担心导致法国王朝崩溃的无信仰的影响扩散到美国海岸，而罗比森的观点则加剧了他们的忧虑。从保守主义者的观点看，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走火入魔的结果，正是这些革命观念的传播才最终促使任性的大众奋起颠覆了现存的秩序。即使美国本身的创建来源于革命，并建立已在法国产生恶性影响的民主原则基础上，保守主义者惧怕这些根基在面对煽动性的影响时还是非常脆弱。仅仅过了一年，光明会挑起革命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危险，通过一小撮保守的新英格兰清教徒的一系列布道，走入公众视线。当然，光明会的脚步绝对不会到达美国海岸；

它们在一个世纪之前就业已消亡。但对保守主义者来说，他们昭示着自由思想、过度理性主义的诱惑性危险，更糟糕的是，对神职人员而言，是自然神教论带来的危险。质而言之，美国对光明会产生恐惧的第一个具体例证是对家庭价值观堕落的斗争。假如考虑到这种恐惧盛行何等短暂，衰退何等迅速，那么就很容易低估其影响力。在其处于高潮之时，甚至乔治·华盛顿也确信事态的严重性，他在1798年写给一位神职人员的信中说："怀疑光明会的教条和雅各宾主义的原则没有在美国传播，这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没有人比我对这个事实更为满意。"

对历史的还原

这是一个对光明会的恐惧如何逐步展开的故事，是从巴鲁尔到韦伯斯特、韦尔奇，一直到如今的再现和发明。但是，真实的、历史的光明会又当如何？他们是谁，其目的究竟是什么？虽然一直有大量教派和团体的名称衍生于"光明"、"启示"（illumination）的点子，如16世纪西班牙的"阿兰布拉多斯"（Alumbrados），18世纪法国南部神秘的"辉映"（Illuminés）的命名，真正的巴伐利亚光明会是由该州因格尔斯塔德（Ingolstadt）的一个大学教授亚当·韦斯豪普特于1776年建立的。"光明会"（the Order of the Illuminati）的目标是在极度传统和保守的欧洲国家研究并推广启蒙运动的原则。秘密活动对这个团体的生存至关重要：无论教会还是国王都不支持这个组织反牧师和反君主制的理念。韦斯豪普特积极寻求创设一套教育系统，独立于其时在欧洲大行其道、无处不在、飞扬跋扈的天主教会势力，并坚信"充满智慧的隐蔽机构是有朝一日将人类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手段"。

在其鼎盛时期，光明会的成员达到2500人，他们散布于全欧洲各地，其中包括当时的一些主要思想家，如歌德。这个组织仅仅建立12年之后，即遭一道政府宣布所有秘密组织非法的法令而被取缔，光明会就此不再存在。

然而，在近250年里，有关光明会的参考书目及其所谓对主要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不断再现。韦斯豪普特本人颇有争议地被列入历史上反动透顶的人物榜中，他的目标也公认为遭到极端歪曲，如果还有人还记住他的话，那也只是作为罪恶的化身而记住的。按照20世纪早期的一位阴谋论者的看法，他是“一个人类恶魔”。即便在韦斯豪普特自己的时代，他也被指控进行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窝藏、投毒、异端等不一而足，并被迫在流放中渡过残生。在出版的一本为其组织辩护的著作时，韦斯豪普特依然强调其博爱主义的目标，这是他所期盼的最高道德原则。在《1787年改进的光明会体系》中，他描绘了光明会的候选人是：

> 那些不幸的朋友和兄弟；那些有一颗能够爱与友善之心的人；那些在逆境之中坚忍不拔、在所从事的事业中孜孜不倦、在克服困难中勇敢无畏的人；那些绝不嘲讽和轻视弱者的人；……那些不会虚度光阴的人；……在真理和美德遭受质疑、并饱受大众轻蔑之时，那些还有足够勇气追随其内心深处信条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合适的候选人。

但是，韦斯豪普特的辩护没有包括道歉。至死不悔，他写道：“我非常自豪作为光明会的缔造者而为世界所知。”

由此看来，从哲学家到共和主义者、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反基督分子，究竟谁是光明会信徒？本书追寻了从韦斯豪普特建立该宗派到今天的若干理论以来，光明会

信徒真实或想象的身份的发展过程。本书关注对光明会的恐惧与认识如何再现，难以设想的是，在经过长达两个世纪之后，已经完全释放了其历史依托。本书以考察韦斯豪普特的光明会活动，以及是否存在对其指控的事实开始。然后探究这个组织的声望在大革命期间如何传送到法国，在 18 世纪晚期登陆美国，以及它对当时政治话语产生的影响。这个轨迹在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里隐秘地运行，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内斯塔·韦伯斯特系列著作的问世才走向复活。随后的章节关注韦伯斯特的阴谋论模式如何为极端右翼所采纳，并充当推进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反共事业和加剧对 90 年代“世界新秩序”的恐惧感。最后章节着眼于光明会的故事如何被左翼所美化，具有讽刺意味的首先是 20 世纪 70 年代诸如罗伯特·安顿·威尔逊这样的反传统文化分子的作品，然后是较真的“新时代”（New Age）和“不明飞行物”（UFO）理论家。最后，这个神话演变最有启示性作用的是关于我们自身的焦虑。透过光明会的透镜端视历史，的确揭示了许多关于恐惧的本质。

第一章
欧洲秘密组织与光明会的起源

月黑风高下的阴谋

在1785年的一个夏夜，一个信使正在从法兰克福到巴黎的行程中匆匆而行，突然被一场倾盆大雨所困。他奋力与这场暴雨搏斗，在电闪雷鸣中绝望地寻找庇护所。他将不可能抵达目的地，因为一道猛烈的闪电划破天空，并击中了他的脑袋。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了几位巴伐利亚的光明会成员发出的信件。隐藏于其衣服内层里更多的文件是有关这个组织及其在欧洲挑起革命的计划。在所有的秘密组织之中，光明会近来已经成为政府取缔秘密组织法令的焦点。虽然他们一直都没有指名道姓，但其无神论的、激进的哲学思想使得巴伐利亚当局相当不爽。据报道，信使是在给另外一个光明会支部传送急件的路途上一命归西的，这显然是天谴的结果。君主制是圣父所拥护的抉择。

上述故事有几个版本，有的认为这个不幸的信使是遭人暗算了，而文件则安置在他的身体上了。其他的说法是信使和他的坐骑被烧成黑炭，但是载有文件的鞍囊则令人惊异地毫发无损。对于这段插曲，当代没有任何说明性记录，但随后的评论家们则为光明会的神话留下了丰富内容。为何不这样做？虽然

是假冒伪劣，但这个故事将许多光明会传奇压缩到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月黑风高下的阴谋策划，神秘的急件，革命计划，以及上帝没有站在他们一边的证据。最后的一点对当时的巴伐利亚居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中，这帮人依然生活在教会主宰的阴影之中。

较其新教邻邦，以及很少造成民众骚乱的横扫其余欧洲大陆的革命性启蒙观念而言，18 世纪巴伐利亚知识之光实在是暗淡许多。在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只有乏善可陈的公共和社会生活，以耶稣会的形式组织的教堂并没有行使其权力。运作数世纪的耶稣会教育体系最终导致这个国家知识停滞不前、迷信四处泛滥。

在一个欧洲其他地区正在对教会和国家关系进行激进改革的时代，巴伐利亚宫廷却在公然坚挺天主教。包括教育机构在内的所有政府机关人员被要求宣誓信仰“无沾成胎说”、忠于教堂、坚守“反对改宗”（Counter-Reformation）的理想，任何新教教义的主张要迅速而残酷地镇压下去。

在天主教的欧洲地区，好战的天主教组织“耶稣会”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各种学院，自 16 世纪晚期以来就稳固地掌握了巴伐利亚的教育体系。17 世纪 30 年代之前，所有的教育机构都由“耶稣会”运作，其中有他们在慕尼黑和因格尔斯塔德建立的大学。尽管没有超过新教邻邦，著名的“耶稣会”教育一开始也是平等的，但是在 18 世纪之前，它已然硬化为机械式的陈腐学习方式。课程僵化，根本不允许偏离教会的信条，并有极其严酷的审查制度伺候。受过教育的巴伐利亚人意识到新的观念正在其他欧洲地区激荡；但是，他们同样意识到他们接触不到那些能够揭示新观念的书籍。

但是，对新教教义的各种信号施加压力是不够的；教堂需

要信众坚定重申信仰，因此，宗教节日和各种仪式被再度引入。在教堂随意对待教育的地方，“崇拜”之时也便相当松懈。18世纪之前，“祷告”（acts of devotion）一直是他们更为繁重费力的活动，因而逐渐演变成公共庆典。比如说，朝圣者能够乘坐马车，圣徒时代的苦心经营变成了最简单的教堂出发仪式(church-going)。现在的许多仪式则意义空虚、迷信和神话盛行；农民用掩埋其憎恨和惧怕的偶像的办法祛除严寒，在地图上放些贡品来确保丰产。这种宗教态度还有更为邪恶的一面：随着迷信渐渐走入到对巫术产生恐惧，在1750年到1756年间，两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作为女巫被砍了脑袋，并被一把火焚烧。

在迷信盛行和智识窒息的背景下，光明会建立起来了。这个组织就为每个天灾人祸而饱受责难，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它一直与古代波斯的暗杀集团、中世纪西班牙的异教徒，还有江湖术士和撒旦崇拜者联系在一起，现在它作为一个传播知识的组织发展起来了。在巴伐利亚限制知识氛围的抑制之下，欧洲其他地区兴起的革命观念激发了韦斯豪普特和他的同辈们。光明会想如法炮制开明国家的革命方式，那是不可能的。光明会的缔造者亚当·韦斯豪普特不仅仅受到启蒙思想的激励。毫无疑问的是，他同样受到了具体针对“耶稣会”的强烈反牧师思想的驱动。

韦斯豪普特其人

亚当·韦斯豪普特1748年出生于因格尔斯塔德，一直接受“耶稣会”的教育。他的父亲是因格尔斯塔德的一个大学教授，父亲去世后，韦斯豪普特的教育就由他的教父——颇有权势的巴龙·伊克斯塔德（Baron von Ickstatt）监管。对他进行保护的

结果就是年轻的亚当·韦斯豪普特在一所“耶稣会”的学院接受教育。尽管这段经历产生了长久的消极影响，但是韦斯豪普特对耶稣会并没有任何不尊敬的地方，在其后来的组织建立中，他还大量采纳了耶稣会的若干组织方式。

15岁那年，韦斯豪普特上了大学，虽然教会处心积虑加以防范，但据大家所说，他还是能够接触到法国启蒙哲学家们的作品。当然，在此之前，他已经获得了“聪明思想家”的名声，与此同时他也具有激进、傲慢、好斗的人格特点，还有不可动摇的正义感。在他完成学业并在大学得到一个教职之前，他以无情地质疑耶稣会的信条和教学方法而名声大振，这在耶稣会主导一切的环境下是不为其同事所乐见的。此时，他与伊克斯塔德的关系奏效了，他的坏名声并没有阻止其职业晋升。更有争议的是任命他为教会法的教授职位，这在当时是只有耶稣会的成员才能享有的位置。竞选活动和阴谋诡计随之而至，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韦斯豪普特的薪金被停发。韦斯豪普特的反应是传播闲言碎语，而这只会带来同事们的不信任。

对巴伐利亚光明会进行最为完整说明的是热内·佛斯蒂尔（Rene Le Forestier）的作品，直到今天，他的著作依然是鲜有对手的。有关光明会的仪式和通讯联系的大部分细节都来自他1915年撰写的博士论文。他叙述了18世纪70年代中期韦斯豪普特如何开始思考建立秘密组织。无论这是其第一份计划之前还是之后，尽管与共济会员有不爽的接触，但是共济会的若干方面在韦斯豪普特的组织的发展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韦斯豪普特建立其秘密组织的动机是对他所认定的耶稣会密谋和控制大学的反应，他同样也受到了渴望构建一个学习和学术讨论的论坛，以及平等主义真挚信念的激发。韦斯豪普特描绘了他期盼设立“读书会和期刊图书室”的愿望，以追随罗素

“理性是人类的宗教”（reason should be the religion of man）的格言。他多产的作品一再回归到这一主题，那就是光明会需要“启蒙理解”，最终目标仅仅是“人类的幸福”。但是，当18世纪70年代晚期该组织的目标公之于世时，有关韦斯豪普特准备寻求传播启蒙主义的问题立刻蜂拥而出。他阐述了许多使命，并被大量引用，这是阴谋论者的礼物：“记住：是目的使手段正当化，智者应该采用所有手段行善，邪恶者作恶亦无所不用其极。”由此产生的争议延续至今。

秘密组织的黄金时代

韦斯豪普特建立一个秘密组织的渴望本身并不必然可疑或恶毒。18世纪晚期是秘密组织和其他各种类型的社会团体的黄金时代，在咖啡店、俱乐部和沙龙，观念相似的人们集聚一堂，积极参与废话连篇的诸般会议。那些卷入密谋和秘密活动的人相对轻松地加入共济会。所有这些都要求其成员具备中等教育水准，有能力支付会费，这就意味着从理论上讲商人可以与公务员接触，工人可以与地主来往。18世纪70年代中期，在盛行于法国的具有骑士风格的社会团体的基础上，慕尼黑宫廷与其繁荣发展的秘密“友好”组织过从甚密。宫廷的最高级成员，包括马克斯·约瑟夫三世（Max III Joseph），所有人都带着表示实质朋友关系的戒指，发誓效忠忠贞、诚实和永恒的爱。在大西洋的另一边，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则在寻求创建一个年轻人的独立互助会。其实，生动的名称“自由与宽容协会”（Free and Easy Society）是一个误称；它远不是一个吵吵嚷嚷的酒会组织，富兰克林协会之目标是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行善的机制，并在商业投资上相互扶持。其成员要求冷静的

誓言、谦逊得体和追求知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较通常的租借图书点有更多精致的仪式，但韦斯豪普特秘密组织的起源实际上并不比为巴伐利亚的商人组建一个读书会更为邪恶。1774年，一位大学的访问者将韦斯豪普特介绍到共济会。经过谋划，韦斯豪普特充分掌握了该会可以自由泄露的许多熟人的个人信息，填充了他的信息空白，补充了他的消息来源所不能提供的细节。当韦斯豪普特试图加入纽伦堡的一个支部时，他的想象力已经在高速运转，他确信因格尔斯塔德的会员在他的监控之下，这样可以检测一下他是否合适。但是，他的热情洋溢不久就化为失望：支部的收费对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而言过高，纽伦堡的生活费比起因格尔斯塔德更为昂贵，更令人沮丧的是，共济会的许多夸大的秘密在不少书籍上就可以免费获取。由于秘密活动元素是根本的吸引力，因此韦斯豪普特与共济会的轻浮关系就戛然终止了，但是建立自己的组织的渴望也变得更为坚定不移。

几乎与此同时，一个因格尔斯塔德的军官也建立了自己控制的秘密协会，以研究江湖术士的神秘活动。韦斯豪普特再次加入这样的组织，但是他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观念，在年轻的巴伐利亚知识阶层徒劳无益地追求哲学基石的观点影响下而心烦意乱，并有所退缩。无论这是不是所必需的最终推动力量，韦斯豪普特还是急切地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刚开始叫“完美者秩序”（the Order of the Perfectibilists），后来改称为“光明会”（the Order of Illuminati）。

光明会的理想

如果韦斯豪普特坚持使用最初的名称“完美者秩序”，或

者称其组织为“巴伐利亚学生理性主义者秩序”（the Order of the Rationalist Bavarian Students），或同样意义的名称，那么在1784年被取缔之后，他的组织可能已经逐渐变得暗淡无光、默默无闻了。其神秘之处似乎是从其名称衍生出来的，因为在大众的想象力中，它一直与一些和所有渴望“启示”的组织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神话的建构是韦斯豪普特计划的重要环节，当然，在招募会员方面，也像呈现在他的生活经历中的所有神话一样。

韦斯豪普特为这个组织描画的最终目标是“在自由和精神平等的状态下，没有服从、等级和富足这些需要持续抛弃的障碍，从而实现普遍幸福的现实前景”。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什么？他所描绘的“精通这些规则的人……正好称呼为受启示的人”。考虑到光明会随后得到的恶劣名声，韦斯豪普特的使命表述看起来怪异地时髦，他呼吁为了获得个人实现，就要担负起个人的责任：

> 在人类理性所能赋予的全部启示中，没有人在探索我们是什么、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义务、我们能够创造什么福祉，以及行动手段等方面，堪与我等相提并论。（Robison, Proofs of a Conspiracy, 64 页）

1776年5月，韦斯豪普特正式成立光明会，此时仅有5个成员。尽管据称随后这些创始成员包括来自英国臭名昭著的“地狱之火俱乐部”的弗朗西斯·达什伍德，马奎斯·德萨德（表面上在与一个州立巴伐利亚的教授一起从事监狱判决和采访贫民区的工作），以及罗斯柴尔德，但是，真正的事实则平凡得多，组织只包括韦斯豪普特与5个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其中之一懒惰异常，对组织几乎没有贡献，不久就被赶出这个组织）。虽然这个组织成立之初人气不高，会员稀少，但韦斯豪普特还

是采取了秘密活动的规则，以主导这个组织，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该组织就被批判者进行更为邪恶的解读。比如说，在创始之初的这个组织，只有两个人完全了解该组织的目标和起源的脉络。当他采用这些秘密和隐秘活动元素作为吸引会员的手段时，韦斯豪普特紧紧地抓住了人类本质这个特点：

> 在我所知的所有指导人类的手段之中，最有效的无疑是隐藏的神秘。对于这种想法的渴望是不可抗御的；如果一个人一旦认定某个事情之中有神秘之处，那么，无论通过争辩还是亲身体验，都不可能将这个观念从头脑中驱除出去。

但是，这些目标究竟是什么？还有什么与秘密活动相关？韦斯豪普特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先在慕尼黑，其后在巴伐利亚的其他地方建立图书室，搜集包括天主教和耶稣会主宰的巴伐利亚禁止其学生接触的所有图书。大部分这样的书籍在启蒙运动的欧洲其余地区是可以自由使用的：最新的科学教科书（教会视其为异端邪说），或者是法国哲学家们的作品。它们有鼓吹平等和民主等潜在危险主张，在巴伐利亚遭到大规模的发行限制。韦斯豪普特的意识形态对于启蒙的时代是完全熟悉的。韦斯豪普特把促进科学研究作为一条原则，这样是基于人类的事业，而不是为了神秘的理由或者个人的利益，因此，方术或玄学就不在光明会的议程之内，而化学或物理学的研究则在其中。

韦斯豪普特的目标并不全然都是无私的。通过教导和影响年轻的追随者（他们很年轻，年龄在 18 至 30 岁的男青年是这个组织最基本的招募对象，而韦斯豪普特本人则更是主张招募 15 岁的年轻人），旨在对社会、教育、政治和宗教等诸多方面进行改革。与此同时，他也在广泛地散布他的另外一个信息：反耶稣会主义（anti-Jesuitism）。

耶稣会的消失与随之而来的恐惧感

自从来到因格尔斯塔德，韦斯豪普特就一直与他的耶稣会同事争执不休。据大家所说，韦斯豪普特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千方百计疏远权威人士，然后抱怨他是某个阴谋的牺牲品。在大学里，作为理性与进步的声音，韦斯豪普特表现出了与教会的蒙昧主义进行斗争的风格。韦斯豪普特的怨恨主要集中在认为他的同事阻碍了其进行现代化的计划，他们之间为大学图书馆选择图书而爆发了几次愤怒的争吵。按照政府 1773 年颁布的法令，耶稣会已经被解散，但是这也没有缓解韦斯豪普特认定他的同事集体与他作对的疑虑，而且在这个方面，他并不是在单打独斗。在 18 世纪晚期，激烈的反耶稣会潮流在大部分欧洲地区依然存在。

在欧洲的天主教国家长达数世纪的享有权力和威望之后，对耶稣会的压制局面迅速形成。从 1759 年始于葡萄牙及其殖民地，继而在 1764 年的法国和 1767 年的西班牙，对耶稣会的怀疑导致整个天主教欧洲地区一连串的驱逐行动。1773 年之前，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Pope Clement XIV）治下的耶稣会已经彻底解散了。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耶稣会顿时失去了牧师、大学和教堂，22，000 个成员在四处漂泊，他们没有职位或合适的谋生手段。对于许多批判者来说，耶稣会遭完全取缔是毋庸置疑的；它已然不可想象地消失了，这也带来了这个组织潜入地下、秘密重组可能引起在某个地方死灰复燃的恐惧感。具有启蒙精神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和俄罗斯的凯瑟琳二世（Catherine II）为许多遭驱逐的耶稣会员提供避难所，给以教职，这无疑加剧了大众的疑虑。显而易见，耶稣会成员

正在重新组织起来，意在捍卫其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启蒙的新教欧洲地区反耶稣会的历史要比它当前的具体表现更早。耶稣会被看作在16世纪的欧洲，由罗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建立的一个军事性天主教组织，其意图是扩展教会权力，因而自其面世之时就被各种疑虑的眼光所看待。围绕着该组织的流言大量涌现，如针对国家首脑的暗杀计划、颠覆法国政府的策划以及卷入"火药密谋"（Gunpowder Plot）等。一本17世纪的旨在揭露该组织秘密活动的伪造文献传得沸沸扬扬，并多次翻印。该书对耶稣会腐败和挪用公款的指控激起了大众的想象力，对于多数人来说，耶稣会是一个可怕的妖物，应该对从诈取其财富机会到行使妖术之每件事情负责。即便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教会也被认为是一个退步、一个政治和知识发展的障碍。伏尔泰（Voltaire）虽然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是批判教会组织，尤其耶稣会的哲学家中的典型代表。他视耶稣会为迷信和顽固不化，那些耶稣会中对边缘人充满不信任和仇恨的代理人，如犹太人，在异端的幌子下无恶不作。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就涵盖了关于耶稣会的阴谋论，无论是知识界还是大众的想象力，都将该组织与试图谋杀君主、形形色色的贪污罪行以及魔术和神秘主义连接在一起。狄德罗的谴责之词毫无顾忌，其论点无非来自耶稣会的秘密活动（"他们总是对其组织结构保持神秘……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用密码……书写"）和欺诈（"这帮人……都是发誓成为间谍和公开相互指责的人"）。其创立者也被痛加驳斥："在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骑士头衔装饰下，他开始传教布道，热情、无知且成功地使人们改变宗教信仰。"环绕耶稣会的怀疑是如此深刻，甚至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也相信是耶稣会在策划针对他的暗杀计划，并据此囚禁了他们的首领洛伦佐·里奇（Lorenzo

Ricci）。当教皇1774年驾崩之时，顿时流言四起，称是耶稣会将他毒杀。

不为他们所知的是，在构建光明会的过程中，耶稣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光明会渴望破坏耶稣会那么简单。韦斯豪普特的研究和组织方法模仿了耶稣会的许多模式，在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和鼓励成员彼此监督方面尤其如此。当光明会进行卑鄙的阴谋活动这些流言在欧洲甚至更远的地方盛行之时，他们显然与早前人们对耶稣会阴谋的恐惧感一样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必须指出的是，光明会自身应对耶稣会阴谋论有散布之罪）。

光明会的组织结构图

从一开始，韦斯豪普特就将其秘密组织设计为一个包括不同研究层面、每个层次都被其上级所监督的复杂组织结构。他的启蒙平等主义观念渐渐地出现在其信徒面前，这些信徒在接受知识的过程中，将逐渐沿着组织的等级攀登，每个人相应要对自己招募的人的教育负责。韦斯豪普特的目标是在因格尔斯塔德的学生中进行招募，慢慢获得更多的追随者，合适的成员将被考察并被邀请加入光明会。在这个组织的高峰时期，据说在其建立的头两年有2,500个成员（且有可信的理由相信这是个夸大的数字）。而在成立的早期，在政府、教会和文明世界的压制下，可怕的光明会仅仅只有可怜的12个成员。

秘密组织最激起我们兴趣，但同时给他们自身留下许多误解的是他们的秘密活动，这是真实无疑的。从其本质上看，他们的许多地方是不为人知的。在刚开始的几年里，光明会似乎留下了在因格尔斯塔德的一半活动记录，记载了这个组织计划

的方方面面。部分追随者的职责就是记录其研究活动，给其上级呈报文件，上级依次对其学生的活动进展写出报告。这些报告在等级组织结构中上下往来，报告和评语前后传送，看起来无休无止。不管是否是一个革命者，韦斯豪普特都具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官僚管理素质。稍后，当这个组织遭到政府取缔时，这些过度泛滥的文档见证了它的衰落。

此时，许多韦斯豪普特的信件证明了光明会的成员类型，这个组织希望寻找并招募到在人格和年龄上最聪明和最高尚的人——强有力的组织成员可望最终在政治、宗教和教育生活中发挥影响力：

> 通过这个计划，我们应该指引人类。以这个方式和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当运转万物，点燃一切。这个职业必须精心调配和设计，直到我们可以秘密影响所有的政治活动……有谁会想到一个因格尔斯塔德的教授将成为哥廷根（Gottingen）教授们和德意志最伟大的人的导师？

上级通常用古典暗示的方式给光明会的成员一个新名（例如，起初阶段的韦斯豪普特）。韦斯豪普特大部分时间选择斯巴达克斯这个名字——领导起义的罗马奴隶之后——作为假名。其他创始成员的名字包括提比略（Tiberius）和阿贾克斯（Ajax），随后的卡托成了韦斯豪普特得力的左右手。（阿贾克斯因为追求慕尼黑的一位年轻姑娘，轻忽其招募职责，被要求不光彩地离开这个组织。）

光明会最初几年的行动特点是过度的文书工作和招募新成员的需求。韦斯豪普特开始是沿着英国共济会的发展路径，使用三个等级层次进行组织工作：见习生（Novice）、“密涅瓦”（Minerval，罗马神话中掌管智慧、发明、艺术和武艺的女神——译注）和“密涅瓦启示者”（Minerval Illumine）或大师。

虽然理论上晋升并不确定，依靠见习生研修的质量，但第一个“见习生”阶段依其年龄可以持续1到3年时间不等。一旦被邀请加入组织，见习生的上级就会给其一个假名或艺名，表示其将要进行研究的主题：例如，“提比略”可能被要求去研究与其同名者的历史。这些研究件之以详尽的文档，均被提交给其上级，且有与见习生的特别研究领域相关（如艺术或科学）的进一步研究。见习生每周一次面见其上级，讨论其研究的进展（或者隔周一次，尽管其中有大量的信件加以补充）。到此为止，加入光明会听起来就像一年级学位课程一样危险。

但这不是见习生被期待表现的唯一职责。见习生通过招募自己的弟子来获得晋升的机会，依次对其研究活动进行监督。在这个阶段，韦斯豪普特在意其组织的排他性（虽然在组织成员停滞不前的一些年里也有变化）。组织老练而谨慎地接近潜在的招募对象；在短时间里暴露太多的信息可能会摧毁这个组织，因此候选人会被试探一段时间，直到成员们相信他们享有类似的哲学观念。韦斯豪普特刚开始是从优秀的家庭中寻找年轻人，认为这些人更能接受他的理念，当其以后在组织中占据要位时更可能贯彻他的理念。此后，韦斯豪普特的光明会同事巴龙·尼基（Baron Knigge）批评这种方法太过缓慢，要求奉行光明会哲学的几代人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主要层面之中。现在，虽然地方法学教授在设法应对现实环境下的招募问题，而招募倾向于学生阶层。与后来的神话相反，光明会在寻求那些品行良好的候选人；没有说闲言碎语、撒谎、欺诈和放荡不羁嫌疑的人（因为明显的原因）会被考虑吸纳。修士同样不被考虑（“流放的耶稣会员必须像瘟疫一样加以躲避”，韦斯豪普特指示），而其他秘密组织的成员，或妇女则被允许加入。后来的批判者所指责的光明会的罪行之一正是它计划招募妇女（他们的生活方

式逐渐渗透到文明社会；普遍的游戏人生和狂欢作乐就不算贞洁）。正如其后越发清晰揭示的，像大部分对这个组织的指控一样，相对这个组织自身而言更多地说明了其批判者的故事。同样，该组织的反牧师主义（anti-clericism）与哲学家和其他启蒙思想家持相近观念，被再次解读为异教和其时的撒旦崇拜，但事实上韦斯豪普特特别注意招募基督徒。

一旦某个见习生成功地招募到一个新成员，他就会成为导师，行使监督其新弟子研究之责。导师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级别，其规则是在这个新的岗位上管制他自己的行为。导师的核心规则之一是这个组织的整体特点：韦斯豪普特要求不仅仅在成员和普通大众之间，而且在成员彼此之间绝对保密，他解释道："人们必须某个时候用一个方式讲话，某时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话，以便我们自己的下级根本不知道我们真实的意图。"韦斯豪普特特意组建了这个组织，以便除了他自己之外，几乎就没有任何组织成员能够理解整个组织机构。见习生只知道其直接上级，而对更高层次以及成员链条一无所知。当见习生成为导师时，他们必须发誓绝不泄露其直接上级的姓名等信息，这就意味着没有成员能够确保他在金字塔结构中所处的具体位置。

更进一步的防范举措乃是确保秘密上面。在他们中间，下层成员甚至不能与上层成员之间讨论最无关紧要的细节问题，直到允许才能这样做。下级成员也不能保留与组织相关的任何信件。比如说，一旦接到上级的来信，他们就要按照指示归还原件及其答复文档。韦斯豪普特设计了一个编码字母表，来传递更有争议性的信息，指令成员在保险箱中存放这些文件，并加以编码，以在所有者死亡的情况下将保险箱移交给另外一个光明会成员。在巴伐利亚当局宣布其非法之时，这些防范措施

并不能确保该组织的秘密活动可以置于公众视线之外，但是，当时他们必须让成员们有事可做，并永久维持组织存在的必要性。

在初期阶段，只要发誓决不泄露任何秘密，无论何时见习生均可自由离开组织。这用威胁性的语言进行了传递，即如果他如此做了的话，他将会有许多感到担惊受怕的东西，但这与许多秘密组织所要求的誓言又不相同。如果见习生选择留在组织内，并承担其研究和传授角色，他就要发誓忠于组织，为了光明会的事业而放弃自己的人生目标。光明会成员有义务填写有关其家庭背景、特别是他拥有哪些图书这样详尽的调查表。成员们同样要发誓无限服从其上级（这再次令人怀疑这个组织有不详的意图），但是通过逃脱不掉的表格填写，允许见习生每月报告一次其导师的行为，导师依次提交自己的报告，这样，防范措施就得到贯彻。

下一个“密涅瓦”阶段则会举办入会仪式，虽然这种形式让阴谋论者陷入兴奋的狂暴之中，但它是如此紧密地遵循秘密组织行为管理的不成文规则，以至于它看来几乎可笑之极。在这个仪式中，入会者被带到一个人迹罕至之地，也许是午夜的森林或者一个房间，最好有月光进行照明，由诸如猫头鹰这样的密涅瓦象征进行监视。在此时此地，入会者要誓言效忠，一把利剑压在他赤裸的胸脯之上，以此表示如果他背叛这个组织，他将面临如此悲惨下场，并伴之以更进一步报复的威胁。现在，欢迎加入更高的组织等级，“密涅瓦”期待着更严格的研究活动（有专业化的选择，就像学位课程一样令人奇怪），以及更多的管理职责，他不仅要报告其弟子的研究进展，而且还要评论其上级的行为举止。

尽管韦斯豪普特强调对组织的忠贞和兄弟之爱，但潜在的

信息是成员们事实上被秘密侦查活动所控制；他们被迫报告其他成员的行动，而其他成员同样也在报告他们的举动，不能确定的是其他成员究竟是谁，他们在组织中所处之地位如何。正如韦斯豪普特18世纪80年代在给尼基的信中所写的：

> 每人都应该秘密相互侦查并监察身边的所有人；朋友、亲戚、敌人和那些无关紧要的人，所有人都概莫能外，都是应该调查的目标；他应该发现他们的优缺点、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偏见、他们的亲戚，最紧要的是他们的活动状况——一言以蔽之，就是关于他们最详细的信息。

但在最初的几年里，这样的举动至关重要吗？成立18个月之后，光明会还仅有12名成员，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因格尔斯塔德。开始的招募异常缓慢，组织为财政问题所困扰。韦斯豪普特建立一个图书室的梦想代价高昂，光明会的大部分经费都转向寻找需要采购的图书上。成员被派去新教德国和其他地方搜寻书籍；名声不佳的光明会图书室的禁书包含当时的观念和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广泛发行的书籍。从这个方面看，韦斯豪普特为他的光明会同事提供了一个服务，同意他们接触哲学和科学的最新发展动态。巴伐利亚知识界死水一潭，对应措施常常事与愿违；如果其审查制度少些严苛，那么光明会就可能根本不会形成。可悲的是，当韦斯豪普特招募巴龙·尼基之时，后者揭露了光明会的精深研究与新教德国学院学生的平均水平相比，其实并不高明。但在图书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正如韦斯豪普特相信他能够得到的信息越多，他就越能与他们周旋一样，他们所撰写的哲学和科学论文都与包括耶稣会在内的世界宗教相关。毫无疑问，尽管这并不是设计的目的，但图书室的这个方面对其后被指控为神秘主义和妖术增添了理由。

在起初的数年里，这个组织在缓慢地招募新成员的同时，

韦斯豪普特也以所有的方式来推进光明会的保险箱工程。他给1776年招募的一个政府律师、不久后替代浮躁的阿贾克斯作为韦斯豪普特忠诚副手的“卡托”，即维克（Xaviar Zwack）的大量信件显示，这些都是怪异的天真之举。

韦斯豪普特没有任何筹款的方案，这似乎考虑欠周。成员们被要求以去挖掘富裕的招募对象，甚至在光明会的等级结构中以晋升来换取现金。次要的或多个副本的书籍充斥于图书室，因此有出售图书的想法，甚至有人建议如果会员真的忠于组织，就会将个人考虑置于一边，为了组织的利益可以与有钱人联姻。不用说，这些方案对光明会的财务状况根本就没有一个长久的影响，这个组织依然是无足轻重，直到它进入到1780年招募到巴龙·尼基的第二个阶段。

巴龙·尼基的加入

文雅而世故的巴龙·尼基出身于汉诺威的一个传统家庭。他广泛涉猎哲学著作，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在挥霍掉财富和招致其同事们的嫉妒之心之前，尼基在朝廷已有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他引退后到了法兰克福，用余下的钱过着节俭的生活。从许多方面看，尼基都是一个秘密组织的“粉丝”，总想得到最新的奥秘，就像今天的名人在挑挑拣拣那些神秘的宗教或一度时髦的节食一样。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加入了共济会，但从未达到超过学徒的层次，这也许是因为他的上级发现此人太不慎重，还喜欢说些闲话的缘故。意识到不能通过常规的手法获得晋升，尼基转而大量阅读关于光明会的文献，与任何可能向他介绍秘密的人结交。此后，他与“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交往甚密，热衷于组织的神秘主义和仪式，最终还涉猎到方术

研究。在18世纪流行的追求秘密的历程中游历一番之后（经由“琐罗亚斯德”而有短暂中止），尼基的另一个企图是渗入共济会，这次他要对该组织进行大规模的重组。当韦斯豪普特与他联系并邀请他加入光明会时，尼基欣然从命。

正是与尼基的会见揭示了光明会第一阶段的真实本色，作为一个地方性的研究团体，其秘密活动不再比一般的新教学院教育更为深奥或激进。但是，尼基有优越的社会关系，能够给组织带来不少很有影响力的朋友。尽管一些人在认识到这个组织的本质和要求他们承诺的限度后退出了，但是尼基坚持以快速晋升的许诺作为诱饵，而韦斯豪普特则看重他们的主要兴趣：哲学与科学。在与尼基的往来中，韦斯豪普特的平等主义观念受到考验，显然也发现了一些欠缺：明显的是，相对于勤奋和研究而言，权力和社会关系会让一个成员得到更快的提升。在极短的时间里，尼基就跃升到了光明会的最高层级。

此时，韦斯豪普特发现他是自己成功的牺牲品。在组织规模甚小之时，韦斯豪普特还能够让信徒对其在组织中的地位处于无知状态，并且，他们可能为了沿着阶梯上升以到达光明会智者的下一个等级，而不得不这么做。事实是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有大量的学识可以传授，也没有深奥的秘密可以揭示。月光下的密涅瓦入会仪式之后，韦斯豪普特对下一个阶段没有深思熟虑的考虑（除他之外就没有人达到这个阶段）。就尼基而言，这就必须加以改变，而且得迅速改变。如果展现光明会的秘密只是满足于一个道貌岸然的人和一个兄弟会员的誓言，那么它就会丧失信誉，成员就会锐减。

这产生了这个组织一堆矛盾中的一个，同时也为那些力图惩处它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弹药。在这段时间写给维克的几封信中，韦斯豪普特叙述了一些关于光明会新阶段的想法。这个主

要反牧师、几乎由反耶稣支部驱动的，以及寻求启蒙思想的组织者，向维克承认天主教会仪式无法否认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熏香和咒语将人类与其信仰连接在一起。他沉思，为什么不从这个构思中找到灵感，造就出自己特有的信仰仪式。为此目的，他回顾了更早的宗教。共济会的仪式合成了古代希腊礼拜式的许多元素；韦斯豪普特需要发现另外一个途径，注意到古普鲁士、琐罗亚斯德（古波斯袄教始祖——译者注）和“火拜祭祀”（the cult of fire）。这个新的动向意味着韦斯豪普特可以宣称，回顾历史，火是照明的象征目标。这个新的更高等级在某些方面反映了这些起源，其名称合成了“火”或古波斯人的概念。为达到这些标准，首先需要研究物理学甚至电力学，因此就将启蒙思想的元素与古代的神秘事物合二为一了。几个世纪之后，韦斯豪普特决定在光明会的结构中混合神秘的古代仪式，这就像该组织的前基督教祖先所设想的那样。事实上，像一幕哑剧一样真实，它添加了既有的（几乎是捏造的）仪式，以壮大会员规模。虽然设计出真实的仪式细节繁琐而费力，当要采取另一个方针时，韦斯豪普特还是为与共济会结盟这个概念而努力。

共济会的影子

在18世纪的时候，人们对共济会的看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些人只是将其看作放荡不羁的绅士俱乐部，其他人则视其为以不可思议的仪式，是一个名声在外的伪神秘机构，还有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探讨启蒙思想的中心。但在这个世纪末期，当它与革命和雅各宾派不分你我时，所有这些声望都黯然失色了。共济会真正的起源并不清楚，它因自我夸大、共济会浪漫

的神话和那些对兄弟关系的批评而变得朦胧起来。但是，共济会第一个支部出现在英国，在那里它从一个中世纪的协会发展而来，此后传播到欧洲大陆，在启蒙的新教国家尤其得宠。英国支部建立在三个等级之上，即学徒、技工（fellow-craft）和导师，当然在18世纪，这似乎是基于平等主义的观念，这是一个知识社会的俱乐部，接受所有宗教和所有社会层次的成员。欧洲大陆的共济会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发展。在18世纪，一个思想流派可以将共济会追踪到“圣殿骑士”，后者在14世纪遭到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的迫害和摧毁。这个理论认为有些圣殿骑士被许可逃离法国，来到苏格兰并在那里创建了苏格兰共济会（the Scottish Freemasons）。苏格兰的组织模式混合了更多的等级，并强调其“圣殿骑士”的身世，因此不管如何，它都对欧洲大陆的其他支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德国的共济会延续了这个发展趋势，它分成七个等级，明确宣布对组织的忠诚，头衔有诸如苏格兰骑士和圣殿骑士这些称呼。

18世纪的德国共济会是世俗和时髦之中的一个时尚。它是一个泛欧洲的组织，这种国际风味在普鲁士宫廷中获得宠爱，当德国人想起自己的文化并在国外寻找其艺术表现时，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低人一等的情结，其时的德国，意大利人正在演唱莫扎特的歌剧，宫廷中正在用法语讲话。高贵的德国共济会员是皇储腓特烈自己，还有诸如莫扎特和歌德这样的文化巨人。也许作为反理性时代的一个强烈反应，或者作为德国浪漫主义狂飙时期的一个先兆，德国共济会专注于工艺的神秘领域；仪式在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用圣殿骑士和十字军作为其想象之源，其中包括佩戴十字和盔甲的精致装束。德国共济会有两个方面在光明会中得以再现，并允许会员轮流影响共济会员：对组织不可动摇的服从，以及“无名上级”（unknown superiors）

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没有任何成员能够了解组织的全部计划，成员被置于等级结构中，韦斯豪普特则处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中的顶尖位置之上。

但是，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德国共济会已经深陷危机之中。其首领卡尔·哥特赫尔夫·冯·汉德男爵（Barron Karl Gotthelf Von Hund）在没有揭示该组织秘密的情况下去世，该组织随之群龙无首。“圣殿骑士”的演变似乎不再是精致的表演，因为没有人知道上级是谁，组织的秘密本质使其成为牛皮大王的牺牲品，蠢蠢欲动的骗子们通过声称知悉组织的真正秘密而能渗透到支部之中。此外，更糟的是，非法的耶稣会员加入进来并企图重组共济会的谣言泛滥成灾。

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韦斯豪普特和尼基带来了光明会的下一个阶段。在德国共济会毫无发展方向以及光明会需要扩充其成员的情况下，韦斯豪普特便产生了渗透到共济会的主意。秘密活动依然高于一切，因为这将允许韦斯豪普特在一个秩序内构建一个秩序，而成员们则不清楚谁属于（他们自身在那里确实适合于口舌之辩）那些窃取共济会员资格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名士和高级成员），最后是解决光明会更高等级的问题。总是被拖入秘密组织神秘方面的尼基在创建这些新的等级上颇有工具主义色彩，他给予他们诸如牧师、大牧师（Reigning Priest）、大教士（Grand Magus）和“人王”（Man-King）这些头衔；晋升这些等级与共济会不可避免地挂起钩来，没有光明会和共济会两会的成员资格，要得到一个更高的级别就毫无可能。

这种变化似乎解决了光明会存在的许多问题，但在韦斯豪普特与尼基之间，一切远非和谐可言。尼基已经迅速占据了光明会组织的高端位置，并和韦斯豪普特共享最高权力，但他们

在组织方法和目标上基本上还是不同的。韦斯豪普特依然觉得招募工作应该慢慢来，寻求可能的成员要有一段时间，并要审查他们的适应性。尼基则追求数量，为了证实他的观点，按照他的计算，要在 1780 年招募到 500 名新成员。但是，他失败了，因为按照光明会的规则，他本人将要负责监督组织内成员的研究及其义务。尼基的其他方法也为韦斯豪普特增添了烦恼，那就是冒充的宗教习俗和仪式正在变成进入更高等级的环节。对于一直以讨论启蒙哲学和科学发展、并与耶稣会教义的蒙昧主义而战为前提的组织而言，这简直就是悖论，因为它看起来就在积极鼓励光明会一直为之而战的迷信和无知。

成员在增加，分歧被搁置，纯粹以数字而论，与共济会的联盟是完全成功的。1779 年，光明会已经从巴伐利亚传播到德国和奥地利，然后是法国、意大利和瑞士。1783 年之前，光明会已在波西米亚、次年在匈牙利落地生根。准确的成员数字来源是不可靠的，但是据报道在其发展高潮，各处的成员在 600 - 2500 人之间，其中包括歌德、莫扎特和席勒（Schiller）这些高贵的成员，以及传言中的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光明会死了

1783 年前，光明会这样的成功受到了尼基—韦斯豪普特关系恶化的威胁。这年 1 月，尼基在给维克的信中写道：“正是韦斯豪普特的耶稣会教义导致了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他施加于人的专制也许较其想象力、诡计和狡诈更为逊色……我断言，没有什么把握可以置于与斯巴达克斯同样的位置上……我要离他而去，公开反对他和他的组织。”1784 年，在威胁揭露光明会的秘密活动之后，尼基与韦斯豪普特分道扬镳。许多新成员

并没有严肃地持守对秘密活动的誓言。有关光明会的细节被泄露到社会之中，由此造成人们对它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导致添油加醋的流言四处蔓延。约瑟夫二世可能是光明会成员的主张就获得了社会基础，这也带来了如此的恐惧，即光明会参加了将巴伐利亚并入奥地利的阴谋之中。光明会被指控败坏年轻人，是王国的叛徒和从事政治阴谋活动。其年 6 月，卡尔·西奥多（the Elector Karl Theodore）发布第一个政府法令，宣布没有政府的批准，禁止成立所有的秘密组织。

光明会没有被直接点名，当时的感觉像是如果他们将保持一个低姿态的话，这个问题可能就烟消云散了。不管形势如何严峻，光明会员似乎并不将这个禁令当回事。但是，1784 年 3 月的第二个法令证明他们错了，该法令明确宣布光明会为非法组织。针对该组织的措施非常严厉：论文被没收，成员被逮捕，准备提供针对该组织的信息的人被许以特赦。无论是听到风声而有所防范，还是纯粹是运气当头，韦斯豪普特在此之前就已经逃离了巴伐利亚。另外一个原因是，在他为图书馆挑选的图书上与大学方面发生的激烈争论无法解决，韦斯豪普特逃到安全的哥达，在那里，他继续撰写大量激情四射的小册子，批判蒙昧主义的支持者和启蒙运动的敌人。但是，他的脱逃只是进一步激起了巴伐利亚反光明会的情绪，对他提出了狂热的指控，他以前会员的身份而被审讯。

政治迫害（the witch hunt）刚刚开始，并在为次年积蓄能量，1786 年 10 月，当局没收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韦斯豪普特的信件，以及其后在公共媒体发表的一个前光明会成员的居所里获取的文件。丑闻铺天盖地而来，即便颇有名望的报纸也在对急切的公众兜售光明会耸人听闻的细节，经常出版一些新的指控和争论。其中的一些报道是没收的文件中包含如何制造隐

显墨水和毒药的说明书；制造堕胎药品的说明；设计一个强行打开时爆炸的保险箱的说明，以及有关上级成员掌握其入会的敏感细节。公众胃口大开，由此打开了更多丑闻、牵连、传言和阴谋接踵而至的闸门。这一年，韦斯豪普特被迫发布为光明会辩护的说辞，其中，他承认“虽然在一些细节上可能是错的，但我的基本计划是好的”。两年后，尼基加上了他的说辞。但是此时已经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公众和政府舆论已经转向秘密组织，尤其光明会的对立面，光明会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回天无术了。1784 年前，光明会已遭彻底禁止，而韦斯豪普特则继续在哥达的流亡生活。

光明会的幽灵——阴谋论

光明会死了；光明会万岁。这个组织可能已经消亡了，但关于它的流言则不然，他们从巴伐利亚传播到了德国的其他地方，甚至更远。1790 年，有超过 50 本关于光明会的书籍出版，读者们的看法依然充斥着日报的来信版面。围绕着它的神话呈现了自身的生命力，这要比光明会短暂而真实的生命强大得多。光明会神话的一个有趣方面是它如何为此后的阴谋思想提供一个模板；虽然所谓的敌人的面孔会变，但是公众对特定妖怪如何反应的模式却依然如故。18 世纪巴伐利亚对光明会幽灵的恐惧与当代的其他恐惧毫无差异，都沉溺其中，最终吸收它们，因此，在那个世纪末期的公众看来，光明会代表了韦斯豪普特率先寻求为之而战的一切。“反光明会”的情感逐渐成长，并被“反耶稣会教义”所点燃，最后两者无情地且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许多人相信光明会就像此前的耶稣会一样在继续发展，他

们只是被迫转移到地下而已。秘密行为的这种特别之处只会使其显得更为阴险和狡诈，此外，缺乏大众的参与是其地下活动的具体证据。这种看法是贯穿光明会神话历史的一个持续而稳固的思路，并被18世纪的约翰·罗比森和巴鲁尔（Abbe Barruel）一直到20世纪的内斯塔·韦伯斯特和昆波鲁女士（Lady Queenborough）这些阴谋论者所采用。

当时，关于光明会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公众混淆了不同秘密组织的本质。18世纪80年代之前，除了“圣殿骑士团”和光明会之外，对秘密活动和仪式有强烈兴趣的群居巴伐利亚人都可能加入“蔷薇十字会”（Rosicrucians）、“亚细亚兄弟会”（the Asiatic Brothers）或“非洲建设者”（the African Builders）之中，更不用说包括英国、瑞典和法国在内的不同分支的共济会。这些组织的目标可能各不相同，但都有“严格监督”（Strict Observance）的制度，具有“无名上级”的等级制；这些阴暗的安排需要以阴谋和险恶来看待，此外，如果一个组织被怀疑上了，那么所有的组织都会被一视同仁，最后就会被看作是一样的组织——这样的态度延续到了今天。因此，哲学上“启蒙的”光明会与神秘的“蔷薇十字会”、奥秘的方术、“圣殿骑士团”等相互混杂纠缠在一起。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其他组织依然繁荣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光明会肯定同样如此。一些组织很快就利用了这样的混淆术，而为其所用。“蔷薇十字会”试图使其与光明会的污点保持距离，到处散布光明会在共济会的幌子下依然存在的流言。

如果巴伐利亚现在怀疑所有的秘密组织，无意于分清事实和虚构或者不同组织间的差别，那么它就等同于掀起了一场反启蒙运动思想的潮流。有些人一直将当时反光明会的恐惧视为一场反哲学舆论的更大行动的征兆，这一哲学在启蒙原则与革

命紧密挂钩的1789年后达到高潮。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看法在德国正在积聚动力，一方面表现为浪漫主义的兴起，另一方面是建立重新注入基督教价值和反对理性主义组织的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组织采取了秘密组织的形式；从显而易见的路径看，当时秘密组织的盛行概莫能外。

毫无疑问，光明会所声称的目标和意识形态是激进的，在传统束缚的巴伐利亚尤其如此。但是，有趣的是他们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他们追随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思想的理念被用来说明了他们最极端的结论（将继续如此）。巴伐利亚光明会的反牧师主义对于这个组织并不例外，这在当时反耶稣会主义的整体氛围中可见一斑。光明会也不是公然的无神论者，如同其与共济会所共有的，他们是自然神教派，将上帝视为宇宙的“伟大建筑师”。在大众神话里，这个立场将与最极端的反牧师主义相联系，显示了其极性的反面——撒旦主义。同样，光明会采取的反君主制思想意味着对所有众所周知的政府的彻底颠覆，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质疑世袭制和国王神圣权利的组织：这样的观念在横跨大西洋的美国非常流行，在欧洲的新教国家也同样盛行。在18世纪巴伐利亚的背景之下，这种反启蒙思想的浪潮是可以理解的。传统束缚的社会靠的是对教会和王朝权威毋庸置疑的忠诚，因此，对他们而言，质疑这些权威的启蒙哲学思想的传播大部分是破坏性的。光明会作为巴伐利亚本土成长起来的启蒙运动的化身，必然要承受遭激烈抵制的后果，韦斯豪普特揭露了他一直在反对的极端保守主义和狭隘性，正如他后来所写的：

> 巴伐利亚对光明会的处罚也许是这个世纪的事件，如果知道更多的细节，它将激起人类的愤慨。这是不公、愚蠢、怨恨、诽谤、诡计和牧师难以容忍人类理性的彻底

胜利。

与此同时，光明会是反启蒙思想的牺牲品，他们的目标与其他秘密组织的神秘主义混为一谈。光明会神话的这个方面尤其持久，当然，从20世纪早期开始，这似乎超越了光明会作为坚定理性主义者的概念。部分原因可能是词源推理的结果。当韦斯豪普特将组织的名称从“至善”（the Perfectibilistes）改为“光明会”的时候，他就给后来的阴谋论者一个把柄，那帮人需要在他的组织与中世纪的西班牙和古代阿拉伯之间建立起明显的联系。16世纪西班牙的“阿兰布拉多思”（Alumbrados）是一个不需要教会仪式中间环节，而直接从上帝那里寻求“沟通”（communion）或“阐释”（illumination）的神秘组织。遭到宗教裁判所的无情镇压之后，这个组织几乎迅速与包括耶稣会的创立者罗耀拉在内的其他“异端”混淆在一起。罗耀拉因被怀疑同情这个组织而被逮捕，虽然他在预先警告中逃脱，但组织还在：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的联系只是证明了巴伐利亚光明会是个根深蒂固的异端邪说。此后的17世纪早期，“阿兰布拉多思”的追随者扩散到法国，那里他们以“光照派”（Illumines）而闻名。该组织非常短命，其追随者被立马逮捕。近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个隐讳的神秘派别以同样的名称现身于法国南部，好像持续到了1794年；这个“光照派”为阴谋论者增添了散布法国大革命成因的素材，但是这与韦斯豪普特并没有任何关系。

阿萨辛组织

所谓与阿萨辛组织（the Order of the Assassins，“阿萨辛”意为“暗杀者”，“刺客”）之间的联系更有戏剧色彩，因此，

混入越是持久和广泛，观念控制、毒品滥用和谋杀的骇人听闻的元素就越多。这个11世纪的组织以恐怖和谋杀使得穆斯林世界恐怖万分。这个组织的成员以其残忍无情和绝对服从其精神领袖而名声在外，在西方则以“山中老人”（old Man of the Mountain）而闻名。据说这些成员定期服用大麻，到达一个恍惚缥渺的“阳光普照”（illuminated）的国度，在此期间，他们犯下各种罪行，其领导也将这作为确保成员效忠的一个手段。据说“阿萨辛”源自“哈沙辛”（Hashashin）和“秘密的保持者”这个词。按照传说，这个组织建立在著名的金字塔结构的基础上，其中包含“无名上级”措施的使用；对于阴谋论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礼物，可以作为“阿萨辛”是光明会前身的有力证据。对于神话创作者而言，那就更加妙不可言，据说这个组织使用了惊人的招募方法。招募对象被下毒和绑架，然后运到有漂亮花园的豪华地点。一旦从这个人间天堂里苏醒过来，在再次吸毒和送到原地之前，他们会被允许在这样的环境中享受几天。如此这般，未来的阿萨辛被许以天堂中的一个位置，作为交换的是对其上级不可动摇的忠诚。当光明会的神话在20世纪再次浮现的时候，它与所有其他“阳光普照”的神话相互紧密交织在一起。最后，它们相互吸纳，被用以强化各自真实性的手段；比如说，与“阿萨辛”的联系导致了这样的看法，即韦斯豪普特本人也在有定期消费大麻，以达到先知先觉的状态，通过这种联系，其成员的忠诚（和绝对）就毫无疑问了。

在短短的12年中，从一个颇有争议性的地方研究团体，到一个在公众看来是西方文明的灾祸，光明会一路走来。绝对没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表明光明会的组织非常出色，是一个他们自称为动力十足的机器。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反光明会情绪的第一个浪潮期

间，这个神话的主要元素已经就位，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在见识秘密组织基于从博爱或社会的到神秘或哲学的不同兴趣而兴旺的时期里，存在着一个关于秘密组织本质的公众舆论的潮流变化。现在，秘密活动毫无疑问是令人怀疑的，在所有的形式及其最极端的地方它都与叛逆相关：与政治议程有关的组织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些与精灵或神秘有关的则是撒旦。此外，这些秘密活动的元素与大众观念中的所有组织统一在一起，将他们归属于一个共同而险恶的议程，这就纳入了社会所有的最糟糕的恐惧。这从光明会图书室的禁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观念。一旦神话呈现了它自己的生命，这些书籍中想象的内容就简单地反映了社会最恐惧的那些观念——不论无政府主义、异端（撒旦主义或“无宗教信仰”）还是一些巨大的未知恶魔。欧洲其他地区正在阅读同样的资料这一事实没有被提及，审查这些资料有无合法性也从未被质疑。

因为光明会神话成为社会恐惧的仓库，因此，对这个组织的看法在不断演绎，并异化为该组织最初意图的反面，同时也渗透了许多矛盾之处。因而在巴伐利亚耶稣会秘密策划的恐惧的高潮，光明会代表了反对耶稣会蒙昧主义的坚定理性主义。对于那些惧怕这个无所不在影响力的人而言，那就没有任何抵触的地方。当光明会的神话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地区时，也没有这样的矛盾，反叛的信息再次被解读为法国大革命背后为了推翻封建王朝和贵族政治的原因。

第二章　启蒙欧洲的恐惧

对一个骗子的审判

1798年12月27日早晨，知名魔术师康特·卡格里奥斯托（Count Cagliostro）——社会名流和国王的法师——被教皇卫兵从床上抓获并锁上镣铐，在罗马到圣安吉奥城堡（the Castel Sant'Angelo）的街道上蹒跚而行。他的居所被洗劫一空，其漂亮的夫人洛伦佐被送到一所地方修道院。在他的物品中，有教皇庇护六世（Pius VI）将会完蛋的预言，以及一些奇怪编排的物品，其中包括一对十字剑和一个特别柔顺且活灵活现的女性玩偶。他被捕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城市乃至欧洲最边远的角落："卡格里奥斯托因为试图将光明会引入罗马而被捕。"

8天后，这个魔术师出现在宗教裁判所前，他不得不接受至少43次严厉的庭审。在此期间，他被指控犯了亵渎、冒充内行、造假、诽谤和欺骗——甚至强迫其爱妻卖淫等罪行。但是，与对他最为严厉的指控，即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角色和加入共济会相比，这还算小巫见大巫了。

仅仅几个月之前，他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卡格里奥斯一直将欧洲抓在自己的手掌上。长期以来，他以医治者和神秘家的身份获得颂扬，受到最有特权的沙龙的欢迎。等待其重要消息的美人们绝不会承认他认罪了，失败了，她们在宗教审判所

前面带着头罩和镣铐等待审判他的消息。1791 年 4 月 7 日，他被判处“无期徒刑，在一个坚固的堡垒服刑，那里的罪犯遭到最严格的看守，没有任何赦免的可能”（Gervaso, Cagliostro, 225 页）。一个新的法律批准了此前颁布的命令，禁止所有秘密组织，尤其是共济会“和其他统称为光明会的组织”。

判决的消息震惊了整个欧洲卡格里奥斯托的追随者；判决与其罪行相比似乎也太过严厉了。但是，1791 年的欧洲与卡格里奥斯托如鱼得水时的欧洲是截然不同的，任何秘密组织都会使当局惊慌失措。

法国大革命这一历史剧变的规模和狂暴前所未有，其意义和反响远超过了法国。始于巴士底狱暴动的大革命，在 1792 年的 9 月大屠杀达到了血流成河的高峰，次年，皇室成员也遭到处决，开始的心理安乐演变成了阴森恐怖。整个欧洲都在焦虑地注视着法国。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如何阻止其扩散到邻国？

伴随大革命而来的是如此激进的政治图景，这就要求对这个世界有崭新的认识。旧的确定性已经一去不复返；在强大的新兴力量面前，文明世界的根基显然没有任何意义。随着正统王朝的摇摇欲坠带来了观念上的急剧变化，熟悉的范畴遭到摧毁并被替代，以常规的手法来解释这些惊人的事态发展显然越来越不够。对于欧洲专制主义统治者而言，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君主制丧尽民心和领导层分裂的结果，这样的看法意味着他们需要维持好自家的秩序。对于其他人来说，大革命原因的常规解释是，法国民众自发地崛起，并以其自身的意志来抗议挥霍无度且道德破产的君主制，这似乎也不合理。

必须要对无法想象的事情做出新的解释。填补真空的是过度简单化和精心建构的神话：秘密组织。由于革命的推进，接

受长达数世纪的宿怨、巫术、撒旦主义，当然还有光明会充当如此不同又不可能的原因，秘密组织阴谋的神话将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随着这个看法的发展，要求接受他们的如此推理越发变得诡异，阴谋论者为了阐释这个策划和阴谋的巨大网络，不得不跨越更大的想象空间。

对共济会卷入法国大革命的怀疑开始并不需要巨大的信仰跨越。参加革命的一些最有名的人物，如拉斐德将军（General Lafayette）和康德·米拉波（Comte de Mirabeau）都是共济会员。路易八世的玄孙、当今国王路易十六世的堂兄弟奥尔良公爵（Duke d'Orleans）于1773年被任命为共济会法国支部的会长（Grand Master）。按照诽谤他的人的说法，公爵后来自称为“开明”（Philippe Egalite），他从大革命和处决其堂兄弟中获益匪浅：即法国王位。还有什么比法国共济会会长召唤所有力量听命自己、法国共济会颠覆了君主制这样的事情更有说服力呢？但是，在当时炮制的阴谋链条上，这样的论调仅仅是一个微小的环节。从大众理论的角度看，大革命背后的原因还要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始于“圣殿骑士团”（the Knights Templar）。

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是一伙修道武士，发过修道誓言的圣战骑士建立于12世纪，旨在保护前往“圣地”（Holy Land）途中的朝圣者。刚开始，他们只是依靠朝圣者的施舍，他们的命运在几个世纪里发生了变化。来自教皇的保护使其免于“什一税”和其他征税，这极大地改善了他们的财务状况，并从开始时的8个成员迅速成长为一个强大的组织。无论是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的力量，还是因为他们服从誓言的秘密本质，总之在1307年

前他们触犯了法国国王菲利普的天条，后者逮捕了他们的成员，将其首领雅凯·德莫雷（Jacques de Molay）关进监狱。包括德莫雷在内的骑士们被指控为异端，并在光天化日之下的严刑拷打之下“认罪”，这样的折磨没有几个人能够活命。德莫雷时运不佳，花了7年时间屈服于野蛮的讯问，他试图洗刷骑士会的名声，但没有成功。按照传说，当德莫雷在巴士底狱等待受死的时候，他组建的4个骑士团支部，发誓为他的死复仇，并摧毁教皇制度和法国王朝。他被处决后，据说骑士团已经潜入共济会，他们在共济会以苏格兰风俗为幌子来重建自己的组织。1792年出版的一本书《雅凯·德莫雷之墓》（*le Tombeau de Jacques de Molay*）把法国革命归因于骑士团的后代身上。对于许多骑士团神话的拥护者来说，大革命“始于”巴士底狱暴动这个事实绝不是巧合，而是报复德莫雷之死的象征性行动。此后，在路易十六世被处决的时候，有大批骑士团成员高喊德莫雷名字的流言在四处传播。

法国大革命中有关秘密组织的神话具有延续至今的阴谋论的所有元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将所有秘密组织彼此间进行简单的混合。按照这种观点，任何秘密行为既是令人可疑的，又与任何其他活动相关联。因此，如果一个组织遭到怀疑，那么所有组织都要用同样的刷子予以清理。“骑士团”立刻与共济会勾结在一起了，共济会与革命的雅各宾俱乐部相连，雅各宾派与光明会互通，由此推断，所有的组织都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些联系的解释的确越发错综复杂，但是却建立了更多的印象。对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而言，这样的解释颇有诱惑性，将过失一股脑地推给一个反叛的小集团，使其成为一个巨大的没有人能够见识其阴谋的组成部分。但是，法国大革命绝对不是回溯数世纪和几个大陆的阴谋的结果，秘密组织神

话的起源可以归结到一些关键的人物身上。

对“神秘”的狂热——光明会沉渣泛起

在18世纪最后20余年时间里，法国这个哲学和百科全书的发源地，同时也存在一种矛盾的趋向，那就是狂热追寻所有神秘和莫名其妙的事情。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受到嘲讽的催眠师安顿·梅斯梅尔（Anton Mesmer），却给巴黎的贵妇们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还供以奢侈的豪宅，进行“身体入定”（animal magnetism）或催眠术的表演，并开放给观众。在上层社会里，不乏降灵神会、神秘主义和方术的热衷追随者。有闲阶层里的江湖骗子盛行，其中之一是大革命的评论家费阿德（Abbe Fiard），他写了至少3本书来证明是魔术师或术士引发了革命。当然，许多暧昧的人物注意到了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在充满敌意的大众中，这也无助于她的目标。

在所有这些江湖骗子之中，没有人有知名的康特·卡格里奥斯托那样充满魅力与放肆，在他的许多成就之中的一个就是，他是第一个坚持光明会和大革命之间有直接关系的人。此人出生于意大利巴勒莫的吉乌塞皮·巴尔萨摩，就像他生活的大部分事件一样，卡格里奥斯托的称号似乎是他自己的发明。利用最快的时机离开巴勒莫之后，据信他在东方广泛周游，并学到了神秘学和方术的秘密。此后，他在伦敦待了一段时间，被发展为共济会员，他也创建了自己版本的组织“埃及共济会”。该版本有精心安排的地点和仪式，混入了其东方旅行中获取的奇特想象力，旨在为其成员展现东方神秘主义的秘密。他的流浪生涯帮助其活跃于欧洲宫廷，而其神秘的狡辩术也让他能够接近上层人士的内部小圈子。在路易十六最喜爱的“魔术”晚

宴上，他表演心理治疗的节目，主持降灵神会，迷惑那些心甘情愿的参与者，通过贩售暧昧的药剂和“不老金丹”为其奢侈的生活招财进宝。在臭名昭著的“项链事件”中，他是主要的角色之一，一个曾经盗窃珠宝和身份造假的精明对手让倒霉的玛丽·安托瓦内特大失脸面，因此他在狱中待了6个月——这是一个他根本不熟悉的环境。从法国逃到意大利后，他被指以异端、神秘主义和欺诈而被宗教裁判所逮捕，还因为其他犯罪指控，最终被囚禁于罗马的圣安吉奥城堡。

在被捕之前，卡格里奥斯托的所作所为已经在整个欧洲恶名昭著，热切的大众急切地搜寻这个浮华人物的任何消息或流言蜚语。遍及欧洲大陆的报纸都留意到这一事件，这个人物及其灿烂生活的最后动向能够确保更高的报纸销售量。因此，卡格里奥斯托向宗教裁判所招供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而对于新闻报道者来说，真实性没有多少或完全没有意义。就他那一方来看，他们异想天开地拯救他的生命并使其神话永恒的企图却是无与伦比的。整个欧洲兴高采烈报道的这些招供，包括他自己革命活动和参加诸如光明会这些秘密组织的夸大其词的供述（大部分是想象的）。虽然他们在当时和其后都绝对没有历史的确证，但当其基本上以这些供述为基础撰写的自传于1791年出版时，它都被视作光明会大部分神话的证据，并为后来详尽的反光明会文献播下了种子。

审判期间，卡格里奥斯托从其共济会的经历中获得了许多好处，这强化了他与“骑士团”、“严规支部”（the Strict Observance lodges）和光明会的联系。他声称一些神秘的人物将他介绍到共济会和光明会的秘密之中，这些人物以“德·温德曼”（der Wundermann）和孔德·德·圣热尔曼（the Comte de Saint-Germain）而闻名，他们各自被描述为一个外交官、间谍、

神秘主义者和江湖术士。与自我发明的孔德的权力相比，卡格里奥斯托只是一个新手。这个背景不清的冒险家可以讲大部分欧洲语言，但是口音没有一个地道。通观他的生活历程，可以看到他在18世纪各不相同的重要插曲，他1745年首次现身伦敦，并成了威尔士亲王的朋友，然后在路易十五的宫廷里成为蓬巴杜夫人（Madame Pompadour）宠爱的人，此后在俄罗斯见证了政变和凯瑟琳取代彼得大帝。虽然欧洲都熟悉但并不为人所知的是，人们相信“孔德”（the Comte）已经获得了哲学家的宝石和永恒生命的秘密——从其漫长的生活传奇看，看起来他都绝对没有超过40岁。卡格里奥斯托一直意识到在供述中自我神化这样恶名昭彰特性的力量，他提供了孔德吸纳加入光明会、地下洞穴、密封箱和血誓这些润色加工的丰富故事：

> 装满论文的铁箱子打开了。介绍人从中拿出一手写本，第一页上写道：“我们，骑士团的长老们……”，紧接着的是一个宣誓表，我记不清准确的字眼，但有祈求摧毁所有暴君的意思。用血写的宣誓有11个签名和我的……他们是光明会12个长老的名字……我设法看清的很少，我推测第一个行动是打击法国，法国之后是对付意大利，从罗马下手。（引自：Gervaso，Cagliostro，92页）

他编织了关于光明会计划渗透到整个欧洲权力机构的精巧故事，这个故事以推翻法国君主制为起始，以他们中的一个出任教皇为结局。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卡格里奥斯托认为，光明会在罗斯柴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的帮助下，借助共济会的保护，已经在欧洲大陆聚集金钱。

虽然他的这个说法从来就没有得到历史确证，但是关于罗斯柴尔德的说明在20世纪还是被内斯塔·韦伯斯特这样的阴谋论者所采纳，用作推测犹太阴谋的伪造“证据”。此外，尽管巴

伐利亚当局没收的许多光明会的论文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但还是没有人确证卡格里奥斯托的供词。

卡格里奥斯托先是被判处死刑，后来判决改为终身监禁。虽然其中的原因不为人知，但却强化了人们这样的判断，那就是此人身后有许多强有力的朋友，比如像共济会员或光明会员这些人，他们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上达教皇。在圣安吉奥城堡待了16个月之后，他饱受梅毒带来幻觉的痛苦，随后被转移到圣列奥堡垒（the San Leo Fortress），关在12平米的地牢之中，直到1795年死去前都被全天候严加看管。他已经越狱并在欧洲、俄罗斯和美国被人认出的故事多年里在四处流传。甚至还要拿破仑发布公告证实他已经死亡来平息流言。

奥尔良公爵扮演的角色

随着1791年《约瑟夫－巴尔萨摩，所谓康特·卡格里奥斯托的生活与行为》的出版，卡格里奥斯托审判的消息传到了法国。因为卡格里奥斯托臭名昭著，这本书迅速取得成功，也许出版商并不相信仅仅凭借卡格里奥斯托的名声来打造声势，所以在法国市场上的翻译版本进行了删减。相对于卡格里奥斯托的总体生活历程而言，法国版本更为注重描写此人丰富多彩的生活，比如“埃及共济会”、彻底的伪神灵主义和为取悦年轻女会员而精心设计的仪式等。这却只是进一步混淆了共济会的作用，并造就了光明会神话，此外，虽然这本书并不是第一本采取反对共济会立场的书，但在那些已然怀疑幕后策划事件乃秘密组织所为的人中，它显然有助于强化他们的诸般恐惧心理。

法国人尤其感兴趣的一个细节是，卡格里奥斯托声称他知道1786年建立于巴黎的一个新的秘密组织，该组织的目标是摧

毁天主教会。据说这个组织的创建者是一些高官显贵，其中有一个主教、三个外国大使和一个被称为“王子”的人。尽管根本就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个组织，其成员可能是哪些人，但是革命的反对派还是发现了将光明会视作无名秘密组织幕后的奥尔良公爵（Duke d'Orleans）的阴谋角色是有用的。气派高雅的公爵，全心全意地拥抱革命理想并积极参与到革命的重要事件中，这是路人皆知的事情，因此保皇派对他是冷淡以对的。那些怀疑秘密组织插手革命运动的人非常敏捷地接受了公爵卷入这样诡秘的活动。一位反光明会的作者写道：

> 为了不玷污纸张，我不能继续叙述奥尔良这个令人憎恶的名字，他会玷污一切，会使人类本质堕落或丢脸。他只要光明（Illumination），在一个组织中显示所有的观点、性情和原则，以填满他那颗邪恶的心……这个不足为齿的人受到米拉波（Mirabeau）的启示，一直是这个组织最狂热的门徒。（Robison，Proofs of a Conspiracy，216 页）

奥尔良公爵（Duke d'Orleans）是一个臭名远扬的自由思想家，在打着自由、平等和博爱的革命旗帜之前，他就早已让法国社会感到反感。作为一个年轻人，人们经常看到他的马车穿行于巴黎街道上，任何路人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有可能倒霉地跌入他的车轮之下。公爵肆无忌惮地享受他的豪华生活，很快就花光了家族财富。因为受到资金匮乏的威胁，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在他的广阔花园里设立了一系列的商铺和货摊，实际上是在奥尔良公爵的地盘上搭建了一个永久性的狂欢场所，正如一个批判者轻蔑地评判：这是首都仅有的“最寻常和荒谬”的群体。虽然他是路易十六的堂兄弟，但长期仇视玛丽·安托瓦内特意味着公爵经常不在宫廷；相反，他出游伦敦，在那里会见了威尔士亲王（未来的乔治四世）并给英国政府和议

会留下了印象。1789年前，他将其民主原则付诸行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甚至被推举为国民大会主席（他拒绝的职位），虽然是个贵族，人民还是很敬重他的：陷落巴士底狱的兴奋人群举着他的半身像。（财政部长雅凯·内克就不能等而视之。同样的人群用石头击打他的半身像，并砸毁了它）。1792年前，公爵已经抛弃了奥尔良的名字，自称为“公民开明”；以前是皇家宫殿的花园被重新命名为“革命花园”。

但是，次年菲利普·开明遭受了无数革命同仁的命运，于1793年11月6日以革命叛徒的罪名被处决。这是一个享乐到最后时刻的人，在处决他的那天早晨，据报道他与许多朋友一起享受丰盛的早餐，饮下了整瓶的香槟，穿上洁净的衣服出发，前往断头台赴死。

作为革命常规历史中的一个次要角色，由于与共济会的联系，一些阴谋论者将奥尔良公爵的角色拔高到关键策划者的程度（始自保皇主义作家，一个当代的公爵加拉特·德·蒙特鸠伊，并由今天的阴谋论者重复的一个固执的阴谋论是，公爵个人通过囤积粮食而导演了革命，独自造成了普通大众的饥荒，最后导致反叛）。公爵对于参加共济会的解释如下：“在没有人能够预测我们革命的时候，我自己参加了共济会，这能树立某种平等的形象，就像我参加会谈可以提供某种自由的形象一样。我已经放弃了现实的幻想。”

值得指出的是，菲利普对其卷入共济会的辩护不是对革命的反对派攻击的反应，而是对来自其革命同仁批评的回应；作为其革命信条的证明，他不得不抗议他参加共济会只不过是民主理想真正落实的前奏。在法国大革命之时，对于任何人来说，共济会都是相同的事情，都会面对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攻击。

共济会要对“革命”负责

18 世纪 80 年代之前，法国的共济会建立完毕；在最后的 20 年里，已经构建了 300 个新的支部，其存在已是平常小事了。法国共济会的特征是具有所谓“苏格兰仪式”（Scottish rites）的神秘方面，并赶上了这些仪式和典礼，虽然其成员彼此互称“兄弟”，但这更多地只是平等主义的表象。大多数成员来自上层社会，热衷于维持排他性的元素。尽管也会为民主理想而动动嘴皮子，但许多支部所要求的高级会员的会费是禁止工人阶级的会员加入的。因此，左翼因为贵族会员资格而有许多理由怀疑这些支部。此外，参照“苏格兰仪式”意味着共济会与专制的斯图尔特王朝有某些关联，因而提出了这些支部及其会员忠诚与否的疑问。在政治光谱的两边，这将成为反共济会人士再次浮现的忧虑。共济会要求会员誓言效忠，其分支机构遍布欧洲，但他们都是谁？他们是不是首先效忠支部，国家仅仅摆在第二的位置上？这种担心一次次在欧洲出现，上至君王、下至百姓，大家都为存在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大网络而苦恼不已。

对于法国右翼而言，对共济会活动的恐惧感来自政治光谱相对的一端，它根基于共济会参与到革命的雅各宾俱乐部之中的认识。雅各宾俱乐部源自布雷顿俱乐部，1789 年在凡尔赛由老资格将军的代表建立，开始他们来自布里塔尼（Brittany），不久后也包括全法国的代表参加。当国民大会那年稍后转移到巴黎的时候，俱乐部的所在地在一所多米尼加修道院的餐厅。在共和党人看来，俱乐部的建立是为了在国民大会之外寻找盟友，刚开始其成员中包括像米拉波这样的温和派人士。不久，与俱乐部联合的爱国组织在整个法国遍地开花。到 1792 年前，

它就以“雅各宾社会”、“为了自由和平等”而知名，其开始的温和政治立场变得越来越激进；不久之后，雅各宾这个字眼就等同于革命了。由于奇高的入会费，因此开始时其成员是些专业人士或资产阶级。地方性俱乐部则更为民主，但是开始的巴黎人俱乐部有更多的自由贵族的适当份额。此外，组成最初的布雷顿俱乐部的代表都是共济会员。

但是到1792年前，雅各宾派不再是一个联合阵线，而是分裂成为温和派（成为吉伦特派）和激进派（山岳派）。吉伦特在居所被捕，并被前盟友罗伯斯庇尔处决。雅各宾派同样在1792年前宣布共济会支部非法，这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共济会同情的革命组织的行动。对于法国右翼和封建制度的许多支持者来说，雅各宾俱乐部存在共济会会员的事实只会强化这样的理论，那就是共济会要对革命负责。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就是十足无能的革命者，因为他们精心策划的阴谋最终无情地转化为反对自身。许多贵族共济会员想在断头台上试试运气（包括奥尔良公爵），而与此同时，像拉斐德这样的人则失去了声望和影响力。不幸的德科赛－布里萨克公爵（Duke de Cosse-Brissac）是前“骑士团”的长老，他被处以私刑——如果革命是执行为雅凯－德莫雷复仇的使命，那么它已疯狂地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

总之，共济会的批判者和党徒在辨别英国的和大陆的共济会的角色上同样苦恼。在英国，共济会成员包括皇室的社会地位崇高的成员，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威尔士亲王、坎伯兰公爵和苏塞克斯公爵都是共济会员——因此，任何趋向雅各宾革命的机会并不存在。在恐怖的高峰，英国共济会通过在一份其杂志的封面上印上威尔士亲王的照片来说明他们的保皇倾向。此后，共济会的出版物指出，奥尔良公爵（Duke

d'Orleans）被砍掉脑袋是“罪有应得”。如果欧洲大陆的支部被认为是人人平等热情的温床，那么在海峡对面的英国则无疑是保皇派。

但是，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仅仅因为共济会从各个阶层中接受会员，同样可以发现共济会建立在政治光谱的不同侧面，即便那些在革命中算得上的人也不能提供一个联合阵线。一个革命的记者并自认为共济会员的尼可拉斯·博纳维尔（Nicolas de Bonneville），就遭到了雅各宾派和反革命派的攻击。就雅各宾派而言，博纳维尔的出版物包含了太多神秘的和超自然的内容；而对反革命派来说，博纳维尔的活动充满危险的破坏性。虽然博纳维尔的共济会信仰可能包含超自然的因素，但是他的革命信条是毋庸置疑的：他是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密友，他具有许多潘恩的理念并在其报道中宣扬之，并且翻译了潘恩的《理性的年代》（*Age of Reason*）一书。

巴鲁尔神父和他的《备忘录》

在欧洲大陆，共济会仪式的外部装饰此前已经进入了大众的想象之中，共济会意象已经渗入革命的流言非常盛行。在“九月大屠杀”期间，据称共济会的符号在狱卒和囚徒之间交换；那些做出准确反应的人免遭上断头台的命运。约翰·罗比森（John Robison）在将光明会的恐惧传播到美国方面影响巨大，也在重复这种形象生动的看法，那就是法国国民大会主席戴的帽子与共济会长老的一模一样，市政官员佩戴的肩章与共济会新人的相同。其他作者也在使用同样的主题，将断头台的形状看作是共济会“三角板”标志的参考物。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则被基本上视为共济会的内容，源自共济会仪式上的

标语。在这些流言不断重复、出版之前，已经演变成了光明会的参考文献，认为激进共和党人的红色弗里吉亚帽子也是出自光明会的入会仪式之中。

“骑士团”与巫术，神秘莫测的共济会与革命的这个潜在的联合可能已经停留在大众神话的王国之中了，这不会是一个人的工作，据信许多人都要对构建流传到今天的阴谋论模块负责：耶稣会，一时的共济会，以及巴鲁尔神父。作为一个宗教小册子和道德短文的多产作家，巴鲁尔同样是个坚定的保皇派，其暧昧的“杰作”《雅各宾主义历史阐释备忘录》，系统地编纂了关于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巨大而包罗万象的阴谋的许多理论，接受了通常对启蒙运动的全部猜疑——法国哲学、共济会和百科全书，最终他们仅仅沦为光明会的傀儡。他的《备忘录》涵盖了今天认可的阴谋论叙说的全部要素，其中包括表面上无休无止的“事实”的累积，以证明那些要对世界变迁事件负责的邪恶小集团的存在，以及这些组织自古至今无时无刻不在的证据。

富于争议且误入歧途的巴鲁尔1756年加入耶稣会，与许多同道牧师一样，最初他在图卢斯担任教师。1762年前的时候，整个欧洲反耶稣会的愤慨之情日益高涨，在法国甚至到了巴鲁尔必须离开祖国自行流亡的程度，他在整个欧洲游历，并在布拉格待了一段时间。直到1773年，他才返回法国，其时，耶稣会已遭镇压。回到法国之后，他一度为一个贵族家庭的孩子作指导老师，但不久在与其雇主大吵一架之后，丢了教职。路易十六登基时，他进献了他的出版物给国王，取得了一些成功，这给了他力量，因而他继续追求他的文学生涯。这些早期作品表现了他的政治观点，影响了其臭名昭著的《备忘录》。虽然他整个后期作品的偏执思路并不明显，但是他从1779年就参加

的保守的《文学年刊》依然在质疑法国哲学的主张。由于伏尔泰领导的法国哲学派在高声攻击现有的教会，尤其是耶稣会，因此一个曾经流亡的前耶稣会员出版更多的反哲学文章并不令人惊讶，巴鲁尔第一个主要作品被翻译成了几个欧洲语言，并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喝彩。

在巴鲁尔开始步入正轨之前，他发现他成了争论不休的保守记者们的先锋，并在《教会月刊》上发表反哲学的短文。革命事件为此人顽固不化的诽谤和讽刺文章提供了大量的原料，这使他愈发尖酸刻薄。1789 年前，他已经开始鉴定革命的一些关键原因，把它归因于“公众道德的堕落和法国哲学的发展”之上。其作品还没有呈现的是直接攻击秘密组织。在以后几年里，这将发生变化。

1792 年的“九月大屠杀”迫使巴鲁尔前去英国避难，在此期间，他会见了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两年前他出版了《法国大革命的反省》）以及约翰·罗比森，后者是苏格兰科学家，其出版的《阴谋的证据》（*Proofs of a Conspiracy*）虽然站在新教的立场上，后来也提供了大量的秘密组织神话。与此同时，身在伦敦的巴鲁尔的观点开始采用更为偏执的调门，且无所不用其极，并在《雅各宾主义历史阐释备忘录》一书中登峰造极。

这部四卷著作于 1798 – 1799 年出版，并立刻在整个欧洲流行开来。该著作先后译成了包括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荷兰语在内的 9 种语言，其删节本也于次年面世。法国版本直到 1837 年还在继续再版，在诸如“约翰·伯奇协会”这样右翼阴谋论的团体中，继续有该书的支持者。

巴鲁尔的《备忘录》为读者认识法国大革命的原因提供了易被理解、表面上看又有逻辑，以及详尽无遗的大量细节，这

为巴鲁尔赢得了许多爱慕者。通过堆砌一个又一个细节、一个又一个“事实”，巴鲁尔旨在证明法国大革命如何为雅各宾派、共济会和光明会这些秘密组织所精心操纵的，以及这些秘密组织与诸如伏尔泰、狄德罗这些启蒙思想家及其哲学思想是何种关系。在巴鲁尔看来，反君主制和反牧师主义的法国哲学是中世纪的秘密团体直接派生的东西，这些秘密团体组成了共济会，在共济会的背后就是光明会。

巴鲁尔在头两卷中没有提出任何关于替罪羊的启示性说法，而是把焦点投向通常的嫌疑人启蒙思想家身上，这些令人担忧的哲学思想支持国家边界的垮塌、推翻君主制并在价值的基础上构建民主制度。在论述这个阴谋论上，巴鲁尔著作有趣的地方是第三、四卷，他为这些思想家们追溯了历史前身，并得出了光明会最终利用如此关系的结论：

> 在人权的口号下，支部的秘密活动构成了革命的基础。第一条宣布人类平等和自由；主权原则本质上属于人民；法律只是普遍意志的表现。近一个世纪以来，阿尔让松（Argenson）、孟德斯鸠、罗素和伏尔泰的思想都是如此。这些傲慢而反动的原则一直都是各类诡辩家、神秘的共济会或光明会莫测的根基；现在，他们在装饰革命准则的封面。（Barruel，Memoirs，vol. 4，397 页）

巴鲁尔的著作确定了他视为“先觉信仰”（Illuminism）的两种形式，即无神论的和神智学的形式。韦斯豪普特的秘密组织属于第一种类型，因为他们似乎是在念念不忘地摧毁教会、王朝和一切公共财产。为了证明这个，巴鲁尔重复了这段主张，那就是法国共济会被一个邪恶的组织所操纵，许多清白的共济会员处在边缘位置上，而精英核心团体则构成了光明会的智囊团。巴鲁尔声称至少有 60 万共济会员参与了这一阴谋，在其核

心，有包括拉斐德和奥尔良公爵这些惯常的革命嫌疑。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巴鲁尔的一些混淆可以归结为相当清楚的误解上，在他那个时代，他并不是唯一混淆两个不同且对立组织的专业术语的人：即巴伐利亚的“光明会”和法国的“辉映”组织（Illuminés）。如同前一章所指出的，“辉映”是法国南部的一个神秘教派，在17世纪中期就已经出现了，可能是类似16世纪西班牙“阿兰布拉多斯”（Alumbrados）这样的早期“辉煌”（Illuminized）派的派生物。像他的同代人一样，巴鲁尔参考了马奎斯·德·路西特（Marquis de Luchet）1788年撰写的著作《“辉映”随笔》一书。路西特此书是批判神秘的“蔷薇十字会”对腓特烈·威廉二世的政治影响，使用“辉映”（Illuminés）这个字眼的意思是指任何描述神智学家、“蔷薇十字会员”和“马蒂尼”人（Martinists）等的神秘主义者。巴鲁尔也不是唯一错误归纳了路西特关于“蔷薇十字会”与光明会论断的人，这只是促成了不同组织及其目标的一般性混淆。

巴鲁尔著作面世于急切需要寻找答案的时候，以及需要认识难以设想的革命事件的时候，这能保证他拥有大量善于接受的读者群。从他的著作及其揭示的阴谋论的整个规模上看，它还是可能被忽视的，当时，《备忘录》在主流的文学和哲学家那里进行了多方讨论。政治作家、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1797年5月1日写给巴鲁尔的信被巴鲁尔的英语翻译解读为一种支持，就该书头两卷的出版，柏克在信中写道：

> 我本人已经了解了你的主要阴谋家中的五个；从自己的特定知识出发，我可以说从现在追溯到1773年，他们都在忙于进行你已经描述得很好的阴谋活动，在方式和原则上你都有真切的表述——对于这些，我可以作证。（引自：Roberts，The Mythology of the Secret Societies，201页）

在柏克的辩词里，此时巴鲁尔还没有出版后面的两卷，那两卷中，巴鲁尔越发变得偏执和歇斯底里。这里巴鲁尔将光明会描绘成精心策划“迄今为止最普遍的、最触目惊心的和最具破坏性的阴谋活动”，亚当·韦斯豪普特就像撒旦（“一个本质上令人作呕的现象，一个不知悔改的无神论者”），尼基则是一个“服侍地狱之王的帮凶”。巴鲁尔的语言参照了异教徒的说法，吸血鬼和撒旦对于许多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些可能已经同情其观点的人在其后两卷出版之后也会拒绝这种文风。显然，他不再能够掌控他庞大而又无所不包的阴谋论，其观点包含了矛盾的政治家，财政部长雅凯·内克（Jacques Necker）就被说成扮演了主要阴谋家和爪牙的角色：“蔷薇十字会”既是光明会的敌人，又是它的朋友。

但不是所有巴鲁尔的读者都会必然接受作者绝望诉说的东西。培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贪婪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向他的朋友推荐：“本书的一半充斥着极为乏味和很难自圆其说的错误，但是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雪莱从许多页上发现了越发钦佩的光明会理想。（值得注意且不凑巧的是，玛丽·雪莱在因格尔斯塔德大学学习时写了《弗兰肯施泰因》，这是一个象征着科学启蒙和革命的地方。）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他的谴责中甚至更为直接，在1800年的一封写给詹姆士·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信中，他拒绝巴鲁尔的主张，视之为“一个狂人的胡言乱语”，认为巴鲁尔恐惧的真正本质是“共济会将会在人类中带来信息、理性和自然道德扩散的危险”。

巴鲁尔使用了许多后来的阴谋论思维的战术来回应他的批评者，这与19、20世纪无论是反天主教、反犹太人还是反共产

主义的“猎杀女巫”（witchhunts）行动有若隐若现的类似之处。在第四卷的前言中，他捍卫了他的立场，引用了他的批判者生活的事实作为雅各宾—光明会阴谋的证明（沿着“你思考，因为那是雅各宾人要你思考的问题”这个路线而得出观点）；如果所有其他的失败了，巴鲁尔就会简单地指责他的批判者是光明会成员。在针对哲学家孟德斯鸠的一系列为其立场辩护的信中，巴鲁尔的结论是哲学家明显是羞辱他的“辉映”（Illuminés）分子。有趣的是，同样的议论也用在了巴鲁尔身上，作为光明会不存在的证据：的确，如果他们就像巴鲁尔所说的那样强大的话，他们就不会允许他出版谴责其计划的大量小册子。

在他所理解的世界出现毛病的一切事情上，巴鲁尔迷恋于将光明会作为其原因的象征，而这是不难领会的：他是一个保皇派、反启蒙运动者和流亡的前耶稣会员。他见证了国王被处决、他的使命被解除并失去了祖国，如果是启蒙理念招致了如此多灾难的话，那么某些人的暗中操纵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不幸的是，作为一个历史的古怪人物，他的所作所为不能被轻易抛弃。其工作不仅在他那个时代具有极端的影响，而且作为光明会范畴不可挑战的证据及其巨大的影响规模，其激发的有关工作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出版商以准确的历史文献为名来贩卖巴鲁尔的著作，并将他描绘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为数不多的作者之一，在论述他所称呼的人民、他所详细分析的阴谋和他所提供的确切证据材料上，他的作品明确而具体”。

今天，人们是否相信一个被激怒的前耶稣会员对光明会的控告是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问题是，当极端组织采纳了他的观点，并利用其为他们自己的魔鬼的邪恶活动充当假定证据的时候，比如说，20 世纪光明会的参照物始于与犹太人的混合。

又如，卡格里奥斯托这些自保的骗子提到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那时被捡起并被用作“事实”，而不是在他们的历史背景下加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狂人的胡言乱语”被作为历史真相而贩售的事实显然是灾难性的。

在他的众多作品中，巴鲁尔开始并没有提及犹太主义；当他撰写第一个版本的时候，法国的犹太社区还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并饱受社会孤立之苦，在政治上可以忽略不计。1791年，当法国国民大会解除了所有针对犹太人的法律限制时，这种局面开始发生变化。对某些人来说，这可以被看作是犹太人获益于革命的证据，因此必须在其组织中发挥作用。巴鲁尔迅速接受了这样的理论，并将其增添到自己偏执的混合物中；一旦“阴谋探测将军”（Conspiracy-Finder General）支持这样的观点，它就被广泛接受为事实，在1806年前，《备忘录》的各种版本被修订，以合成这个新的纠缠物。从这一点开始，犹太人开始被视作包括光明会和共济会在内的所有秘密组织背后的终极力量，这个流言最终将导致20世纪早期《犹太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出笼，这是一个旨在归纳秘密的犹太仪式的臭名昭著的伪造文件。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给这个理论做出贡献的是约翰·罗比森。巴鲁尔支持光明会阴谋论的动机理智上是坦率直接的，罗比森的则少得多了。

罗比森的主张

今天，在所有其他方面，作为以下著作的作者，罗比森令人印象深刻，书名是《来自可靠权威的关于共济会、光明会和读书会在欧洲实施针对所有宗教和政府的秘密会议的证明》

（1797 年）。不清楚罗比森撰写本书的动机是什么。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应该被期待着支持启蒙运动的原则，而不是去谴责它们，虽然他似乎没有遭受巴鲁尔那样丧失理智的恐惧感，但是显然也有自身的偏见。尽管他的背景可能没有使其避免各种错误，但是却为其理论赋予了明确而危险的外表，故而有理由使其理论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出生于苏格兰、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罗比森在回到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出任物理学教授（当时称为自然哲学）之前，曾经在整个欧洲和加拿大四处游历。他是一个知名科学家，为《大英百科全书》贡献了各种论文，1783 年担任爱丁堡皇家学会秘书长，这个机构是新近为促进科学知识而成立的。

像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罗比森也是一个共济会员，并且需要分清“好的”共济会（比如英国的共济会）和海峡对岸的颠覆性教派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这些教派已经成为危险的精巧仪式和政治煽动，罗比森可能一直受到怂恿而撰写了这本书。罗比森的书如同巴鲁尔的著作一样矫揉造作且错误百出，都以类似的前提为出发点，旨在证明 18 世纪 90 年代的革命活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是如何横扫欧洲的，这是由一个小集团的煽动者策划的革命，那就是光明会。罗比森不断炮制一些大众化的理论，认为光明会在遭到巴伐利亚当局取缔之后潜入地下，而地下活动为其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掩护。他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看法之上，即如此惊心动魄的革命活动必定是被操纵的，至于这个理论的证据，他试图提供光明会和诸如邪恶的奥尔良公爵、塔列朗（Talleyrand）和米拉波（Comte de Mirabeau）这些重要的革命名人之间的联系。

米拉波（Comte de Mirabeau）是一个粗暴的知名革命人物和“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的发言人，直到 1789 年事件

之时，他一直过着一种充满失败和丑闻的特权生活。据报道，由于一出生就是畸形脚和臼齿，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惊人的勤奋，性格争强好胜。年轻的时候因为患上天花而使外貌更加难看（他的父亲描绘为“丑如魔鬼”），但是这并没有对其浪漫的成功带来消极的影响。在一个阶段里，因为一连串的通奸行为而被囚禁——最初以“色情罪”被判处死刑。人总是有点运气的，米拉波的看守正好是一个共济会员，故此不仅撤销了对他的判决，而且他还得到了特权。

罗比森关于米拉波与秘密组织勾结的理论基础是后者于1786年对柏林的三次外交访问，以及米拉波写的一本书，书名是《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君主制度》（*The Prussian Monarchy Under Frederick the Great*）。米拉波在此书中称赞光明会反耶稣会的行动，在普鲁士的秘密组织的不同作用上则似乎含混不清，那时，他将理性主义的光明会和神秘的“蔷薇十字会”混为一谈。尽管这样的混淆并不是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法国，巴伐利亚的光明会往往与神秘的法国教派“辉映”相混淆），但罗比森坚信如此混淆并非无意：

> 他（米拉波）在柏林时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辉映”的短文，这是曾经出现过的最怪异和最厚颜无耻的表演之一。在那儿，他将存在于德国的一个派别称之为“启示”（Illuminated），并且声称他们是荒谬绝伦和狂热幻想的人，他们与每个理性的迹象作战，并且从事最荒诞不经的迷信活动。他对这些及其仪式和典礼等方面做出了一些说明，好像他已经无所不知。他的派别是一个基督教迷信、“蔷薇十字会”的愚蠢以及可以带来耻辱和仇恨的一切的混合物。但是，这样的组织根本就不存在，为了从监督中包庇这些

> 众所周知的光明会成员、阻挠统治者留意到他们真实的阴谋，米拉波吐露了他自己欺骗的本领的秘密……他清楚地知道光明会只是一个截然对立的标志；因为很久以前……他就属于“启示”（Illuminated）。（Robison，*Proofs of a Conspiracy*，12 - 13 页）

然后，罗比森开始证明米拉波发起并给巴黎支部带来了光明会的激进理念，他招收塔列朗这样的名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个故事被一直到今天的阴谋论者接受为事实。

这个故事的根据是，米拉波与一个前“光明派”（Illuminatus）分子、激进的雅各布·莫韦仑（Jacob Mauvillon）1786 年在柏林的一次会见，据称，那时莫韦仑在向米拉波灌输光明会的各种理念，并表明了要让米拉波将他们带到法国支部。罗比森的著作不仅用最严厉的字眼抨击他所感知到的大陆共济会的激进活动，而且对于其责难的加尔文主义这个恶根圈的不道德生活极为憎恶，以证明米拉波“放荡、纵情、赌博和不虔诚”，声称他的“邪恶行为中缺乏宽容”，且“饮酒是唯一他不能沉溺的罪过，因为他精疲力竭的身体不允许这样做”（Robison，p214）。

但是，对于放荡不羁的奥尔良公爵而言，米拉波道德恶行最突出的一点被保留了下来，这部分原因可能是公爵占据了法国支部长老的位置（罗比森似乎并不清楚公爵已经在 1787 年放弃了这个头衔）；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怀疑罗比森热衷于在他的英国共济会兄弟和海峡对面的堕落之间划清界限。罗比森在大费周章地解释英国的支部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位置，奥尔良这样的滥权行为在英国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国家，我们没有国家长老权威的概念……在德国的许多大城市里，居民对共济会长老

的尊敬要比对他们各自的亲王多得多。奥尔良公爵在法国的权威依然巨大……”

接下来，他重复着下流的流言蜚语，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强化公爵无赖的名声。他被描绘为与男扮女装者，其中之一便是米拉波……以及其他共和党人的代表进行阴谋活动；人们看到他在观察示威的暴民，但是“躲藏在孩子们身后的阳台上”进行的。最后，他被指责介绍了“三百个以上的美女……会见并招募了两营的队伍……前往凡尔赛宫保护王室”（Robison，217页）。罗比森说，这效仿了韦斯豪普特为了光明会之目的而利用乡下妇女的范例。异性装扮癖、懦弱、拉皮条……罗比森似乎在说，我们设想的光明会不过如此。

其时的罗比森提出了关于启蒙理想的一个危言耸听和歇斯底里的解读，并用之于光明会操纵法国大革命的“证据”：

> 没有什么能够更有说服力地说明一个派别的初期意图……在法国，为了彻底推翻宪制并在其废墟上建立民主或寡头政治……说明了所有的王朝篡夺者和暴君，以及所有的作为其教唆者的特权组织。他们打算建立一个政府……其中天才和怪人占据高位。他们意在取消那些长久积累起来的财产和成功工业的保护法……他们意在构建普遍性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不可剥夺的人权观念……因为要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他们打算彻底根除所有的宗教和基本道德观，甚至要通过摧毁对婚姻誓言的敬意和从父母的手中接管孩子们的教育这个手段，破坏掉国内生活的纽带。这是光明会能够教导的全部内容，也恰恰正是法国已经经历过的事情。（Robison，215 页）

罗比森这个被大量引用的段落清楚地将光明会的格调等同

于启蒙运动的精神，它们都有在美德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之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这个理想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革命中就太过熟悉了。就欧洲顽固的卫道士来说，这些理想实在令人胆战心惊，就像法国激变的后果一样是社会秩序的严重威胁。对于罗比森来说，分享其诸如“自由”和“平等”概念等保守主义的人也在像这些威胁一样发挥作用，其动机和摧毁“宗教与普通道德”的结果是一致的。

与光明会对抗的霍夫曼

罗比森的许多理论受到了躲避革命的法国流亡者的影响，其中包括巴鲁尔，他的英文作品将其理念带到了另一个读者群中，进一步强化了一直盛行的流言。另一个罗比森详细引用的作者是奥地利人利奥波德·霍夫曼（Leopold Hoffman），这是一个前共济会员和反革命派，从革命前的两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撰写疯狂责难秘密组织的文章，他更是详尽地证明光明会和革命的雅各宾俱乐部之间的联系。

霍夫曼受到个人敌意和坚信秘密组织危险的驱使。许多年里，他都在与韦斯豪普特的得力干将巴龙·尼基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报纸上对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活动进行指控与反指控。一个高明的报业经营者关注任何重要事情（并总是一只眼睛盯着下一张支票），霍夫曼留心到光明会故事的销售价值，并力求使之保持在公众意识的兴趣中心。

由于要寻求光明会活动的“证据”，霍夫曼不断虚构精细的阴谋情节，抹黑那些在这个过程中反对他的任何人。他不是机智且文学修养高超的尼基的对手，尼基用详细的讽刺予以反击，使用阴谋论自己的语言来嘲讽他。尼基的讽刺性小说《蠢

货的规则》（*Order of the Simpletons*）讥讽了霍夫曼这类作者，其阴谋论在尼基看来，要对酿成的恐慌和猜疑，以及将社会推回到宗教法庭的启蒙前的状态负责。

在此之前，类似光明会、雅各宾或者宗教法庭的字眼几乎已经毫无意义，且变成赞许的字眼，以此抹黑那些不赞同自己世界观的人。但是霍夫曼的理论在保守派和反革命之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采用罗比森一样的基调，并且当增加和推动这些理论的时候，这些理论将会繁荣成长。如果只是记得罗比森的作为不过是对法国革命的当代现象的个人反应的话，那它就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加工品，是一个海峡对岸的评论家对当代恐惧和偏见的说明而已。但是，他的文本具有以下深远的后果。

罗比森认为光明会的基层组织已经跨过大西洋到达美国了，这在18世纪90年代初生的美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促使美国人于1798年制定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the Alien and Sedition Act），以及19世纪20年代晚期成立了“反共济会党”（Anti-Masonic Party）。在此之前，罗比森的影响力使人陷入阴谋论思维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的书籍被接受为历史事实；对于许多阴谋论者和像极右翼的“约翰·伯奇协会”这样的极端组织而言，今天它还被引用为事实。当今一个版本的前言将罗比森描述为“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并且认为“从‘光明会’到‘共产党宣言’的线索是直接而完整的”。

在仅仅15年多的时间里，短命的光明会已经从一个成员仅5人的地方性哲学俱乐部，演绎为被彻底视作文明世界的一大灾祸。自从光明会1785年消亡以来，西方世界就一直在对其感知到的活动保持高度警惕，甚至超过了该组织存在的时候，这

几乎毫无例外离不开巴鲁尔和罗比森的所作所为。感谢罗比森，光明会的神话将会被介绍并警醒到一个全新的读者群，那就是建立不久的美国。

第三章
十八世纪美国的光明会恐慌

摩西的布道

1798年5月9日，杰迪迪亚·摩西牧师（Jedidiah Morse）在波士顿的新北方教堂（the New North Church）向民众发表了演说。摩西是个新英格兰地区虔诚的加尔文派教徒，在前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对这个国家的不虔诚和缺乏对权威的尊重日趋警惕，这在东北部最令人敬仰的教育机构的年轻人中尤其如此。他讲出了他深沉的忧虑，坚定地描绘了弥漫于新生美国的堕落程度和应该负责的祸根：

>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个称为“启示”（Illuminated）的组织就一直存在于德国；其直接目标是“彻底根除和消灭基督教，推翻所有的文职政府”；它批准了像自杀权和杂乱性交权这样骇人听闻的原则，与此同时，它还谴责爱国主义原则和积累私有财产的权利；为了执行其不可告人的宣传，它企图支持心有不满的人，极力掌控像学校、文学协会、新闻媒体、作者、书商和邮政局这样的文化机构；它热切地暗示其成员进入无论文化界、政界还是宗教界等力所能及和影响巨大的位置上。（引自：Stauffer, *New England and the Bavarian Illuminati*, 233－234页）

摩西的布道在新英格兰地区像一团慢慢燃烧的火焰，他的影响达到高潮。摩西令人毛骨悚然的预言甚至惊动了乔治·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总统，二人对他的主张做出了严肃反应。美国正在寻找国家发展之路。在挣脱了一个压迫者的锁链之后，美国公民在真实或想象中的潜在新敌人的图谋面前感到非常脆弱。摩西的根据何在？如果有根据的话，那么一个新英格兰地区的牧师如何意识到欧洲秘密组织的卑鄙意图？

摩西的布道第一次在美国公开了光明会阴谋的神话，并让摩西及其本地区的其他同事几年中都在为传播这个警报而忙碌不已。虽然这是光明会作为一个威胁首次激起了美国人的反对，但也不是美国第一次集合起来，反对所感知的敌人。此外，除了摩西对光明会的明确说明，他的布道是训诫新英格兰地区的教徒走向政治化的典型代表，而这正是保守的牧师所期待的。

18 世纪后期的美国政治受到了大洋对面改变欧洲的主要事件，即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影响。美国人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矛盾的，并因此而分裂为不同的党派立场。在为从英国人那里独立的斗争里，法国无疑是一个可贵的盟友，最初，法国大革命受到令人振奋的推崇，并为这个新兴的共和国所期盼。但是，法国的事件血流成河、损失惨重的事实造成美国对自己过去革命的反思和焦虑，并提供了一个民主导致暴乱的可怕图景。如果民主原则必然滑入如此逻辑结果，那么美国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吗？

直到 18 世纪 90 年代，美国的联邦党一直都在传播这样的观念，革命英雄乔治·华盛顿是其领导人。但是，1791 年前，这个党的分裂威胁到了它的主导权。当托马斯·杰斐逊与前联邦党人詹姆斯·麦迪逊一道于 1792 年建立民主党时，每个政党都在寻求公众的支持。一个方法是利用法国大革命这个榜样来

为自身目的服务。对于联邦党人来说，倡导一个对美国自由构成威胁的外敌理念仅仅是个权宜之计。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开始可怕地演化为一场恐怖活动时，他们就受到呼唤支持反法的巨大压力。在这个年代的开始几年，亲法国的热情在美国非常高涨。在这个世纪结束前，美国将做出剧烈的改变；从这个年代早期的同情法国，转为相反的极端，认为法国是个致命的敌人，在那个敌人的内心是光明会的图谋。

当时美国人的流行态度是他们自己的革命某种程度上可以指导法国，为其显示抛弃暴君之路。法国脆弱的君主制应该推翻；其天主教教会的权威（通常被疑为一个清教徒国家）在王权只能被欢呼的情况下被拉下马来。费城是美国最具世界性的城市，同时也是受法国文化影响最大的美国城市，这个城市听任亲法国氛围的疯狂展示，其中包括肆无忌惮地歌唱革命歌曲，激情四射地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念，以及展现丰富多彩的法国旗帜和革命符号。甚至通常清醒的新英格兰人也受到亲法国的联邦党人大卫·塔潘（David Tappan）的影响，塔潘是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在1793年的一次布道中宣布革命即将到来："突然闯入我们视野的是多么光荣的革命！多么伟大的自由思想！何等公正、富有活力和壮丽的情感！看看那些根基已然摇摇欲坠的专制教会和国家！"到1794年之前，与联邦党人的牧师一道，他的内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谴责革命和散布雅各宾派威胁的流言。但在其时，美国对于法国事件的兴奋点依然占据着这个国家。

热内的到来

法国大使埃德蒙·热内（Edmund Charles Genet）1793年从

巴黎到达查尔斯敦，他自称“公民热内”并彰显其革命信条，此时他受到痴迷的公众和公开场面的盛大欢呼。当来到美国的时候，虽然这个推崇世界主义的年轻外交官仅仅30岁，但是他的外交职业一直不算平淡无奇：自从青年时期开始，他就被法国外交部所雇用，20多岁的时候就在圣彼得堡的驻俄罗斯使馆出任秘书。他对法国大革命的高声支持没有获得俄罗斯宫廷的青睐，并于1792年被草草解雇了。这无关紧要：在法国，他在吉伦特派中赢得了自己的声名，法国政府毫无保留地支持他前去与华盛顿政府谈判美国对法国的债务问题，这些债务是独立战争期间产生的。

来到费城之后，热内遇到更多的奉承。无论来到什么地方，充满激情、时髦、高雅的热内都会成为报刊的头条新闻，他激烈的形体动作令共和党人兴奋，但是，也让华盛顿政府产生了疑虑。坚信其革命原则准确无误的热内在1793年处决路易十六的时候丝毫没有隐藏其欢乐之情。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却标志着他们终结喜爱法国的开端。在殖民地为独立而战的过程中，路易一直是一个忠诚的盟友，并且提供了昂贵的资金援助。法国财政的可怜状态并不是与美国革命全无关系，国王之死让许多美国人惊恐万分。但是，接近热内的人似乎被一股狂热的热情流所压倒。一个盛行的流言是，法国国王脑袋搬家之后不久，在费城的一次为这个年轻外交官举办的宴会上，热内带领费城的许多名士痛饮庆祝君主之死，寻欢作乐者将一只烤乳猪命名为“路易”，这使亵渎行为达到了顶峰。显然，事情正在失去控制。当革命开始不可阻挡地滑入恐怖之中时，费城产生了尖锐的分裂局面。许多人丢弃了他们亲法国的情结，而另外一些人则继续支持革命，甚至采用革命历法和激进共和党人的装扮。

无论是因为其招待会过分招摇，还是其自我膨胀的本性使

然，总之，热内已经越过了外交条约的界限，并且表现得俨然是一个国家首脑，而不是一个公务员。当法国 1793 年 2 月对英国宣战的时候，华盛顿的反应是在 4 月宣布保持中立，禁止美国卷入欧洲事态的任何行动。热内显然不理会这一政策，并采取了自己的行动，发出允许美国武装私船查封英国船只的许可，顿时使美国的中立政策完全失效。这使热内逃脱不了干预其他国家事务的干系，他确信他有人民的支持而无视他们的总统，这导致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召回热内。也许鲁莽却不愚蠢的热内根本就没有返回法国的打算，此时的法国，吉伦特派狼狈下台的结局是直接走上断头台。他选择在纽约北部渡过余生，并娶了一位州长的女儿。虽然这个人在美国的外交生涯非常短暂，但是对法美关系却具有长远的影响，并在光明会阴谋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年后的 1813 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写信给亲近法国的托马斯·杰斐逊，敦促他在这段时期里不要低估热内的影响力，短暂但极为真实的恐慌是热内将鼓舞美国人民投身革命：

> 在热内的激发之下，你当然绝对不会感觉到恐怖主义，1793 年，费城街道上成千上万的人民日复一日地威胁要将华盛顿从其居所中拖出来，实现政府革命，或者驱使它宣战，支持法国革命……最冷静和最坚定的智者，甚至费城的贵格会信徒（the Quakers）已经向我传递了他们的意见，除了黄热病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拯救美国于政府总体革命之中。

一般来说，存在许多狂热且有能力推翻美国政府的力量，这个看法是难以忘怀的，这些支持法国的多姿多彩的展示并非令联邦党人担心的唯一方面。与热内在费城耀武扬威的招待会

同时发生的是以“民主协会”（the Democratic Societies）而著名的政治社会俱乐部的崛起。

“民主协会”的崛起

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至中期，“民主协会”产生于美国社会俱乐部普遍时髦的背景下，与其他组织一样，其组织目的是讨论启蒙理念，甚至他们的对手光明会也相信其成员数量和影响远比事实上的众多和巨大。从本质上看，18世纪大西洋对岸的许多组织都是支持启蒙理念的，他们热衷于讨论民主的本质。但是，美国的这些俱乐部不仅仅只是做一些无益的推测；民主原则实际上已经在推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探讨上。此外，政府也不喜欢一个叛乱组织自行解读民主这样的看法，这正是他们害怕“民主协会”的原因所在。费城一些俱乐部公开模仿法国的俱乐部，这正是问题所在。自从本杰明·富兰克林18世纪20年代建立兄弟会俱乐部以来，虽然殖民地一直都有建立社会组织的传统，但是，一旦最新俱乐部的具体形式与国外反叛的雅各宾派等量齐观的话，那么所有的组织将会受到质疑。不管其对立面最极端的恐惧如何，也很少有组织在秘密厮会；大多数组织的成员还是相当公开的，并且信奉今天所有自由主义者极为熟悉的那种平等主义观念，比如说，他们倡导女权、取消奴隶制和刑事改革。但是，1794年10月，“民主协会”成为一次叛乱活动的盟友，将他们置于完全不同的境地，此活动就是“威士忌暴动”（Whiskey Rebellion）。

这个不受欢迎的征收威士忌税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于1791年实行的，此举在费城的农民和联邦税务官之间激起了一连串日益暴烈的对抗。此外，威士忌对这

个国家的这一地区而言简直就形同于一种硬通货；对于农民而言，这看起来就像是他们生活的负担，是工业化的东北部和农业化的西部地区发展失衡的象征。税务官们遭到一系列恐吓性威胁：一些人涂上焦油、装上羽毛而逃离城镇；其他人发现阻断的道路为成堆的粪肥或者砍倒的大树所封锁。夏天之前，事件达到极致。匹兹堡市的联邦党同情者传来消息，准备将农民出卖给政府。七千反抗的农民计划在城中游行示威。

虽然一个达成妥协的尝试推迟了这次示威，但反叛者 1794 年 8 月 1 日最终还是到达这个城市，此时他们已经没有抢劫和掠夺的兴趣了。局面在机敏的匹兹堡公民的热情欢迎下进一步扩散开来，匹兹堡市民欢呼反叛者的光临，甚至在他们充斥街道时供给食物。这一天结束前，大多数农民已经离开市区，仅造成微小的破坏。尽管如此，政府对这个事有不同的解读，他们表面上公开寻求与反叛者进行谈判，私下里却在准备一场战争，他们坚信费城事件是肆虐欧洲的革命的一次国内表现。10 月，华盛顿率领 13，000 名民兵沿着阿勒格尼山脉剿灭了这次叛乱活动。

乔治·华盛顿坚信，这次反叛活动是他所描述的农民和一个更有组织的煽动性团体，即“民主协会”之间“若干非法集会”教唆的结果。那年 11 月，他在国会的演说具体指出了这个“自创的协会”，这个术语意味着联邦党人已经从“民主协会”跳跃到了雅各宾派的秘密会议。联邦党人的报纸选择了这个术语，马萨诸塞州报的一篇社论警告“民主协会”正在秘密工作，以“动摇政府机构的整个秩序并造成混乱，以至联邦政府、宪法、法律、公众秩序和私有财产都成为暴力或冒险的对象。”在 1794 年秋季的短暂时间里，秘密政治俱乐部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亲联邦党的新英格兰地区的牧师立即从华盛顿的演说中得出了必要的结论。民主一共和党人对于加尔文信徒的新英格兰人来说是成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信奉世界主义和认可法国启蒙思想清楚地显示他们是革命理念的盟友，这些人将会摧毁美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民主党人的英雄托马斯·杰斐逊与法国长期保持着联系，自 1784 年开始作为美国驻法国的外交使节在巴黎生活过 5 年。他的对手嗤之以鼻地指责他只是“一个女人式的法国附庸”，在一次突袭中质问杰斐逊究竟效忠于哪个国家，并且下意识地诅咒这个与美国新教信徒的道德公正相对照的法国娘娘腔。法国毫无疑问与革命紧密相连，且对于保守的牧师而言，革命又与自然神论（deism）有关。1794 年托马斯·潘恩出版的《理性的年代》清晰地指出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牧师最恐惧的是什么，紧接着的自然而然的结论就是，革命将导致教会的毁灭。潘恩写道：

> 我的小册子《常识》在美国出版后不久，我看到这样极为真确的可能性，那就是宗教体系的一场革命之后，将会发生一场政府体系的革命。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无论是由犹太人、基督徒还是土耳其人发起，痛苦和惩罚以及每个对既定信条和宗教首要原则的讨论，都会如此有效地阻止教会与国家的非法联系，以至直到政府体系必须改变，在世界面前，它们不能为人民带来公正和公开；但是，无论这应该什么时候完成，一场宗教体系的革命将会来到。人类发明的才能和神职者的权术将会水落石出；人类将会返回到上帝独一无二的纯粹、清晰、纯净的信仰之上。

教会的反击

新英格兰地区的传教士们颤抖了。对于保守的牧师而言，自然神论是所有革命的核心。实际上，自然神论是对18世纪信仰的迷信本质的一个反应，自然神论哲学的核心认为，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自然奇迹，但是“他”不会干预各种奇迹形式的运行。像托马斯·潘恩和许多其他的缔造者一样，自然神论者相信，上帝的意愿不是通过超自然的迹象或征兆，而是通过一系列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而体现出来的。但对于保守的牧师来说，拒绝已经构建的原则就无异于亵渎神灵。就他们而言，一旦不虔诚进入到美国人的内心，那么整个政府的革命将会为期不远。许多新英格兰地区的牧师意识到大量不敬的行为已经渗入社会，在年轻人之中尤其如此。在美国革命期间赢得支持殖民地的重要地位之后，牧师们的社会地位已经削弱了。去教堂的人数在下降，对于新英格兰地区的加尔文信徒而言，的确存在许多紧迫的问题，一个更大的社会对他们冷淡以对。大卫·塔潘（David Tappan）牧师是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在1793年的一次宣讲中指出：“令人疑虑的、自然神论的和其他松懈且有害的情绪正在毒害社会。”他责怪欧洲启蒙思想在美国的某些社会领域肆虐：“一种无神论的哲学最近在欧洲达到顶点，它佯装健全的理性、科学和自由的继承人和看护人，似乎也在危险地感染一些更为生机勃勃和思想自由的美国天才”（Staffer，88页）。耶鲁大学校长提摩西·德怀特（Timothy Dwight）同样看到了在激进行为和他的学生减少宗教活动的背后，是通过自由教育的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

> 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一直接受自由教育、具有强烈激

情和原则虚弱的年轻人，不过是些淫荡和野心勃勃的信徒，他们对毫无约束的满足这样的前景欢喜若狂，渴望时髦和华丽的人生，并迷恋这些新的原则。舆论乃至不变的要旨将立即发生巨大变化。惧怕成熟起来的年轻人突然发现，经过先前年代的漫长队列，世界已经完全进入黑暗之中；人类的智慧之光刚刚开始显露。

这样的教育结果造成年轻人傲慢地抛弃过去的各种原则和信仰：

在上一个30或40年开始之前就已经获得的所有科学和所有信息毫无例外站立在他们的见解上……他们发现，宗教一方面是老糊涂和保姆的幻想，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欺骗和诡计的体系，是以欺诈无知民众这个基本目的而由牧师权术强加的结果。他们发现启示录根本就没有权威或证据；道德义务是个陷阱，这可能真的困住了苍蝇，但是具有更强大翅膀的动物则会高贵地鄙视这样的陷阱。（引自：Stauffer，85－86页）。

从18世纪90年代之后，牧师开始坚决支持联邦政府。当时，个人布道会的听众要比牧师自己的集会更加广泛：牧师们可能在不同的教堂发表同样的演说，布道内容通常发表在报纸上或者后来的宣传册上。因此，新英格兰地区牧师的一次激动人心的措辞将比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通常会上达白宫。

由于对叛乱的恐惧和反法国的总体情绪浪潮席卷了整个东北部，对美国产生的危险就成为一个持久的主题。大卫·塔潘在1795年2月的一次布道会上强调国内外秘密组织之间的联系，因而获得政府的垂青：

在先前的论述中，它们（秘密政治俱乐部）在法国的

毁灭性影响一直得以关注。这个国家不幸的影响充分展示了谬误、政党和派别的灵魂，至少其中某些人一直在毫不懈怠地、极为成功地筹划，尤其是谋划后来危险而广泛的西方叛乱活动（例如“威士忌暴动”），在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追溯到这些俱乐部及其教唆者和盟友激动人心的表演和举动上。

在联邦党欢迎牧师大力支持的同时，对于其对手而言，这样的盲从附和证明了教会根本就没有独立公正性。在独立战争期间，政治性布道是一个突出特征，因此，牧师认为这样的批评是道德和虔诚沦丧、法国的影响以及所有力图改变美国基督教信仰的明显证据。1795年，康涅狄格州的一份文件清晰地指出了民主党人在所有这些动作上的作用，将他们的行为描绘为“一个反基督政治的疯狂系统”，并且指出：

在追寻混乱不堪的知识分子设计的每个幽灵中，法国人疯了。在摆脱所有的人类控制之后，他们兴奋地攀登天堂的堡垒并罢黜万能的耶和华。如果他们有胆的话，我们自己的民主党人也会这么做的。

《一个阴谋的证据》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分歧更为明显。美英之间1796年签署的“杰伊条约”（给英国提供了非常优惠的商业权利）在民主党中饱受恶评，他们视之为对英国国王的阿谀奉承，并且背叛了共和党的理想，从当时公开敌对的英法关系来看，这也损害了法美关系。在认识到这些恐惧的这一年，数以百计的美国船只被法国武装民船所捕获。这些美国水手遭到法国粗暴对待的报道升高了敌意，与法国即将发生一场战争的恐慌是非常现

实的忧虑。这个恐慌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恐慌。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昙花一现的崛起让世人见证了法国在意大利战争（1796－1797）中大获全胜，由于他继续蹂躏整个欧洲并“剑”指英国，看起来法国没有称霸世界就不会罢手。当时一个流行而耸人听闻的宣传册，名曰《食人者在行动——对法国侵略的致命恐怖》有许多版本在流传。其中一个版本在前言中发出这样的警告：“本宣传册属于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要阅读。他们从一个真实的来源中发现法国占领这个后果……其中，有谋杀、抢劫、焚毁城镇并侵犯女士的贞洁以及其他许多太可怕而不能叙述的暴力形式。”

似乎局势并非足够紧张，次年的1798年，美国出版了约翰·罗比森的《一个阴谋的证据》一书。阴谋论者的手册面世了。

罗比森的著作强化了保守的美国人最深沉的恐惧感。从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那里、采自欧洲第一手资料的著作，其证据自然真实可信，其中包括雅各宾派推翻政府、教会以及世界上每个文明国家所有著名机构的阴谋。就像许多美国人所怀疑的那样，他指出的原因是启蒙思想带来了骚乱。新鲜而不详的是罗比森认为革命背后的组织正是光明会。其后果是纵火与煽动肆虐。这样的启示紧紧抓住了保守美国人的内心，及其担心光明会将在19世纪末期主导其生活的恐惧感。罗比森对光明会主宰世界的计划的描绘，在那一年稍后巴鲁尔纪念性的《备忘录》出版后再次得到强化：

瘟疫借着风的翅膀飞翔，因此他们的（比如光明会的）胜利军团影响着美国……因此美国北部便有了大量的同党，费城和波士顿在颤抖，他们不断增长的机构必须为大型俱乐部开辟道路；如果兄弟会一度必须收缩并返回隐藏之地，他们依然还会足以强大地组织集会，并变为爱尔

兰的反叛分子；因而，支持那些革命的种类是他们在美国的炙热愿望。（Barruel, Memoirs, 271 页）

新闻保持真挚是不可能的，对于摩西和他的同事而言，这使他们怀疑自然神学渗透到美国社会、亲法国的民主党以及具有世界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杰斐逊和潘恩及其他人那里了。光明会阴谋的神话满足了寻求这个答案的需要，即：关于民主理想是如何与为何在法国如此狂暴地脱离轨道，并且激起了保守主义者的反应。摩西在以下几年时间里都在致力于传播这样的论点，且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

在他全神贯注于光明会的图谋之前，摩西（在其他成就中，他还是萨缪尔神父、电报的发明者）是新英格兰地区著名的作家和令人尊敬的牧师之一。从耶鲁毕业仅一年之后，他就撰写了关于美国地理的流行著作之一《从容看地理》（*Geography Made Easy*）。摩西游历不断，以研究和推动其工作，因此他要比大多数美国同胞更多地理解这个国家。虽然他可能蔑视反对党的"世界主义"观念，但是摩西绝不是一个无知的狭隘之人。此外，虽然从 1789 年起他是纽约"新北方教堂"的牧师，并在这里发表了他最著名的布道演说，但是他在波士顿的社交圈中从不舒心，他经常在私下抱怨这个城市对奢靡和世俗习惯的爱好。

从这个年代的早期开始，摩西及其同事就在与渗入社会的世俗主义的危险进行不懈的斗争，相信诸如杰斐逊、潘恩以及自然神学鼓吹者爱里胡·帕尔默（Elihu Palmer）这样的人，已经在鼓励美国人进行"不洁、破坏安息日以及来源于此的所有邪恶活动"，杰斐逊是"自由思想和非宗教事业的主要信徒"（引自：Knight, ed., *Conspiracy Theories in American History*, 511 页）。虽然虔诚的约翰·亚当斯 1796 年已经击败杰斐逊当选总

统，但是，警醒还是必不可少的。亚当斯总统于1798年在国家斋戒的场合上宣布，这个国家“现在正处于危险和艰难的境地”。随着罗比森著作的出台，摩西焦急地警告他的同胞，次年5月9日，摩西首次发布了关于光明会的布道演说，描述了“苏格兰的著名文化绅士撰写的作品，在前一年里刚在这个国家重印，名曰《一个阴谋的证据》……”，他解释道：

> 我相信这是我的同道的义务，这要归功于上帝、宗教事业、我的国家和你，此时此刻，我诚实而虔诚地向你们宣布这些事实。我唯一的目的是唤醒你和我自己，在如此令人担忧的时刻，对我们最珍贵的利益保持必要的警惕。作为一个忠诚的监督者，我愿意对当前的危险向你们提出警告。

这个危险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而始于国外，并无情地走向血流成河的革命：

> 通过如此可怕的事件——在地球上的国家中造成剧烈震动，毫无疑问，上帝在落实其承诺并实现其预言。人类反对一切政府和宗教的狂怒和暴力最终会以赞美上帝这样的方式而终结。宗教和政府中的所有腐败行为就像渣滓一样迟早会被付之一炬。为了这个目的，“启示主义”（Illuminatism）的可怕火焰在肆虐和扩散……但是，我们在用这个观点思索这些可怕事件的时候，让我们意识到许可，以及将目的和手段混合的表现。因为无神论和淫荡放纵被神圣的天意用作工具，以颠覆和推翻天主教会和专制主义，因此它并不认为无神论和放纵本质上是好东西，并值得我们赞美……为了我们的政治和宗教避难所之安全，我们有理由发抖。为了削弱二者的基础，某些图谋正在制定，并

且公开和秘密地加以贯彻。

在摩西发布关于光明会的首次布道演说时，公众最迫切的忧虑是“XYZ 事件”的揭露，这是法美关系恶化的一系列外交事件。这个事件暗示了法国人的背信弃义是与大众情绪相一致的，但是对光明会的叙述却几近草率——直到其年稍后罗比森著作的到来，在美国还没有人听说这个组织。但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这个理论将获得支持，并在美国东北部的大众话语中持续存在。

“宗教之死”

仅仅几个月之后的这一年 6 月 19 日，作为毕业典礼的议程之一，大卫·塔潘为哈佛的高年级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警告自我沉溺的危险性，并且不祥地指出了“一个新近的组织，它……为了其表面的目标，即从一个压迫性世界再生为乐而忘忧的平等自由世界”。这个“新近的组织”就是光明会，为了学生的利益，塔潘追溯了光明会从韦斯豪普特到法国大革命的世系沿革。与此同时，耶鲁的提摩西·德怀特校长通过合成罗比森和巴鲁尔的理论，继续详述其得意的主题，即“宗教之死”。德怀特是新英格兰地区德高望重的人物：博学多才、举止得体和坚信宗教（他以“德怀特教皇”而闻名）。当他将光明会的危险作为他在美国 7 月 4 日国庆节的布道主题时，这个国家在高度关注。布道期间，他呼吁注意“美国人在当前危机中的义务”。他所提到的危机“由两个巨大而不同的部分组成：毁灭反基督帝国的准备；以及通过虚假的主义和不敬的教士，人类走上了其自称和非同寻常地反对上帝及其天国的道路”。虽然这些非上帝的人包括通常所说的嫌疑者——伏尔泰和百科全

书派——但德怀特同样向美国公众揭示了光明会影响的程度，再次在罗比森的影响下，指出他们成功地曲解了德国和法国共济会最初的博爱目的，其目标是支持“每个新颖的、放纵的和令人惊慌的意见”。

德怀特在他的布道中解释道：

> 因此，通常涂上博爱主义色彩的观念，在这里都会被一个深深而致命的颜料立即抹黑；那些对于污染点新鲜且纯洁的人很快就会无可挽回地堕落下去……在这个温床上播下种子的是令人震惊的革命及其所有可怕的附属物，现在，它正在半个地球上散布沮丧和恐惧。(Timothy Dwight, “The Duty of Americans in the Present Crisis”)

德怀特从德国开始追寻光明会卑鄙的发展路径（德国的“公众信仰和道德一直失常”，造成这个国家的“总体毁灭”），然后是法国，这里，光明会的工作正如许多人所看到的是明确无疑的，再后面是英国和苏格兰。美国人最为惊恐的是，德怀特证实，德国的秘密报告证明了自从18世纪80年代以来，光明会就一直存在于美国。德怀特警告，美国人必须保持警醒，在布道中，他将革命的法国哲学和光明会的工作做了直截了当的比较：

> 我们为了什么目的而应该与人类中那些如此特征和行为的人相联系？我们可能假设同样的特性并追求同样的行为？我们的教堂可以成为理性的殿堂、安息日十年一次、我们咏唱赞美马赛的咏叹调（例如，革命的马赛曲）吗？……我们可以看见《圣经》被扔进篝火之中、一个公众队伍中的笨蛋提供圣餐的器皿吗？我们的孩子们无论是被哄骗还被恐吓，结成暴民，吟诵嘲讽上帝的诗篇，并且大声

欢呼明天摧毁其宗教和丧失其灵魂？……我的同事们，我们应该成为这些罪恶的参与者吗？我们应该将其导入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庭吗？我们的子孙应该成为伏尔泰的信徒和“马拉的重骑兵”（the dragoons of Marat）；或者我们的女儿成为光明会的姘妇吗？

魔鬼从那个瓶子中出来了，而且一去不复返：从1798年夏季伊始，光明会阴谋就已经无处不在。联邦党人雄辩家在遍及东北部地区开始着手处理此事，在其政治对手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的活动下，轻易地忽略了光明会的威胁。

西奥多·德怀特是提摩西（Timothy）的哥哥，他在康涅狄克特州的哈特佛特（Hartford）的一次演说中论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组人，其公认的目标……是摧毁所有的宗教和政府”。在这些“现代光明会”中，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国家谁属于这个组织；但如果我改宗加入美国的‘启示主义’（Illuminatism），我就应该首先选择托马斯·杰斐逊……及其政治协会。”

现在，这个问题一下子沿着政党界线而公开分化。在保守主义盛行的新英格兰地区，报纸迅速采用了这个主题，但是在恐怖贩子的吵嚷之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年7月，《马萨诸塞水星报》（*Massachusetts Mercury*）的一篇社论质疑罗比森的资格：“在这个距离上，是不可能确定其断言的真实性，或者其证言的价值的”，并质问摩西及其他人是否明智地将其主张依附在仅有的来源上。社论认为，罗比森毕竟攻击了美国革命的英雄“高贵的拉法叶”，此外，他的著作显然具有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社论以训诫的口吻总结道，美国人立场坚定，反对成为“欧洲人偏见和无知虚构的每个故事的受骗者。”

介绍光明会阴谋神话的摩西看到了这篇社论带来的直接挑

战，并以一系列不得要领的文章予以回击，他的文章依靠的是流传的看法，在其身后有令人敬重的同事德怀特和塔潘等人的支持，因此，进一步的理由并非必需。那年秋天，巴鲁尔《备忘录》第三卷的翻译出版给其支持者打气助威，显然也为罗比森的理论提供了独立的佐证。11 月，摩西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敦（Charlestown）感恩节布道中重申了他的诉求，并要求国人不要加入感恩节，而是联合起来保护国家免受"外国威胁"（foreign perils）。在该布道发表的版本中，这个所谓威胁的本质被放大了，它对光明会在美国的存在做了 50 页的附录和详尽无遗的注解：

> 在我"五月斋戒讲道"中，已经指出了"启示主义"（Illuminism）在这个国家可能的存在。接下来的事实是，一个可敬的牧师阐述了这个问题，确证了上述断言，这表明我的理解并非无的放矢……在本国北部，正如我所知，最近一直出现并依旧存在一个邪恶头目主导的组织，他们抛弃宗教原则和其他道德义务，践踏婚姻纽带、单独财产权以及国内法律，在工作和消遣中度过安息日，而听任嗜好肆虐；夜晚则是过度放荡，杂乱姘居，而听任欲望驱动。

在指责这个"组织"时，摩西对其不良行为做了冗长的说明——自然神论、道德沦丧、破坏婚姻誓言等等——这在当时许多光明会阴谋论中非常盛行。

摩西的新布道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如果不是自己的意图的话，那么摩西是不会反对自我提升的，他将这个布道的副本递送到约翰·亚当斯总统与前总统乔治·华盛顿那里。次年初，他收到华盛顿的来信，华盛顿对他的布道表示支持："我已经高兴地阅读了它及其附件，希望这封信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为它包含了许多重要信息，如果在整个社会进行传播的话，也和

在一个很少人的小圈子中理解与传播一样是非常有用的。”

其他人则缺乏自信，由于争论再次进入公众领域，摩西的布道受到的欢呼和挖苦几可等量齐观。在联邦党人出版的文件中，杰斐逊被描述为“真正的雅各宾，现代‘光照派’（illumination）的真正孩子……这个国家的敌人”，支持杰斐逊的人印发了来自欧洲的信件，认为罗比森或巴鲁尔的作品在那里已经失信。《马萨诸塞水星报》唆使摩西及其追随者在光明会的威胁性行为和一个更受尊敬的教派贵格会之间进行比较。逐点逐点地，这篇社论认为光明会的与贵格会的哲学并无二致。贵格会在整个新英格兰地区因其和平主义和温和的品德而声名远播，这立刻渲染了对光明会滑稽的恐惧感：

> 光明会尊重所有教会机构的世俗、非宗教和专制的活动；贵格会同样如此。他们同样坚持兄弟之爱和普遍仁慈的义务。贵格会信徒不仅承认这些无神论的原则，实际上也将它们付诸实践。光明会坚持人类平等的思想，贵格会亦如此。像光明会一样，他们在所有会议、特派员不停调动以及每天每次会议的四分之一议程是为了个人事务这些方面具有大体上的相似之处；在美国的任何法庭上，我可以证实这些朋友、这些人类为了慈爱和博爱是如此可怕地与众不同（啊！博爱！），并与其欧洲凶恶的同谋们一直保持并还在保持固定的联系……

托马斯·杰斐逊为这种不断增长的歇斯底里也提供了一个副本。1800年，在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一封信中，他对恐慌贩子巴鲁尔和摩西的恼怒显而易见：

> 最近我……看见巴鲁尔的《反社会的阴谋》（第三卷），它给了我第一个我曾经了解到的看法，其意思是

"启示主义"（Illuminatism）对付"光照派的摩西"（"Illuminate Morse"）……并且他的……组织一直在进行大声抗议。巴鲁尔本书中关于自己的部分简直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话。但是，他大量引用韦斯豪普特（原文如此），他认为韦氏是他所称组织的创建者……

杰斐逊提供了韦斯豪普特目标的一个选择性解释，韦氏的愿望是传播光明会的启蒙理念，这不是一个主宰世界的险恶计划，而是一个教育的渴望：

韦斯豪普特似乎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博爱主义者。在这些人中，他是……相信人类无限完善性的人。他想他可以适时变得如此完善，以至于他将在各种环境下可以驾驭自己，不会伤害任何人，做所有他能够做的善事，远离随时将权力施加其身的政府，当然，改变政治无能的政府。这……正是罗比森、巴鲁尔和摩西一直称为反政府的阴谋活动。

杰斐逊继续评论道，韦斯豪普特的问题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压迫性政府之下这个事实，他必须要在当时共济会的幌子下秘密地工作。如果韦氏享有美国的生活自由的话，他可能已经在相当公开地工作着：

他提出的改善人类本质的方法是"启蒙人类，矫正其道德并以仁慈鼓励他们"。由于韦斯豪普特生活在一个专制和教会的淫威之下，他认识到即便在传播信息和纯道德原则的时候也有必要小心翼翼。因此，他提出领导"自由共济会"（Free Masons）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就给其观点秘密露面的机会，并且成为他被迫流亡和颠覆共济会组织的基础，以及攻击他的罗比森、巴鲁尔和摩西胡言乱语的

> 材料，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在人类中传播信息、理性和自然道德将对其权力带来的危险……我相信，你们将和我一起思考韦氏所写的，在我们致力于给予人类智慧和美德的时候，韦氏的思想根本没有秘密可言，他可能一直都没有为此目的而考虑什么秘密图谋。

虽然杰斐逊所言并非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在1798－1799年秋冬火热而焦虑的氛围中，光明会恐慌继续扩散，并在美国人中一度为此产生了日益高涨的仇外情绪。

XYZ事件

18世纪90年代，东海岸一直遭受着流行性黄热病反复发作的折磨，这在当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的、结果致命的疾病。港口城市尤其脆弱不堪，因为疾病似乎是通过与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商船接触而传播开来的。1798年秋季的费城、波士顿和纽约全部遭到这个疾病的破坏，同时期的报道估计死亡人数达到1万（据信这个数据非常粗糙，只是真实死亡人数的一半）。只要有疾病暴发的苗头，病人就会被隔离，城市的全部机构都被关门大吉。在费城，因为担心将被封锁于自己的家中，市民们不敢通报疾病情况，与此同时，纽约官方在私自庆幸他们限制了疾病对这个外国移民地区的大规模扩散。

这个事情与恶化的对法关系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一种几乎是歇斯底里的怀疑氛围。东海岸的牧师们不断发出的警报，那就是以“XYZ事件”而为人熟知的外交事件产生的似去还留的影响。1798年5月，约翰·亚当斯总统派遣一个代表团赴法解决关于法国袭击美国船只、美国对法国的债务等问题。当美国代表团抵达法国之后，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拒绝直接会见他们，

而是在会议举行之前派了3位手下商谈什么是实质性的行贿这样的问题。当亚当斯的人写信给总统描述这一情况的时候，信件被公之于众，信件的名称用塔列朗手下的姓名X、Y、Z来代替。联邦党利用这个对其有政治价值的事件，让观众获悉法国人背叛的例证，并暗示联邦党在国内的对手杰斐逊的政党也有牵连。在真实和想象的恐惧围困之下，那个秋冬的东海岸地区成为一系列狂暴而未经证实的流言的牺牲品。约翰·亚当斯收到的匿名信通告将有火烧费城的阴谋；当这封信公之于众时，许多市民逃离了该市。费城还有一个流言，说的是一位无名的裁缝独自缝制了数百件法军制服，这清楚地预期了法国即将入侵。这段时间里，所谓“木盆阴谋”（Tub Plot）的故事也在盛传，这个故事描述了法国阴谋者如何在两个木盆的夹层里走私秘密文件，详细说明如何推翻美国政府。此外，还有关于法国人手上的美国船只“大洋号”上的水手遭到血洗的可怕报道。这些故事具有几个共同点，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虚构的。最后发现这些虚构都是源自联邦党，他们因此而失信于人，但是直到此时，他们还是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促成了一种猜疑的氛围，这种氛围在1798年秋天通过《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过程中达到顶点。

在这个期间，尽管或者因为有来自反对党喧哗不已的批评声浪，摩西还是继续其反光明会的神圣运动。就他而言，其观点得到总统的支持，其1799年在国家斋戒日那个场合下发表的演说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光明会，但是呼吁美国人要对外国的颠覆性元素保持警醒：

> 美国人民最珍贵的利益是在各种危险下依然屹立不倒，这些危险来自一个外国的敌意图谋和阴险行动，以及他们散布颠覆所有宗教、道德和社会义务基础的信念，这在其

他国家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祸害。

摩西遭到戏弄——光明会只是诋毁对手的阴谋

1799年早期之前，摩西回头开始搜寻证据，他相信这将使那些诽谤者保持沉默，这就是他所描述为“一个官方认证的一个光明会组织成员和官员的姓名、年龄、出生地和职业等的目录，包括弗吉尼亚的法国‘大东方会’（如共济会支部）在内的100名成员”。他发表了他的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关于光明会的布道，阐述了这些“启示”。

摩西的布道建立在一封信的基础之上，他收到的这封信旨在记录弗吉尼亚的共济会智慧支部（the Masonic Wisdom lodge）自1786年以来的活动情况，摩西详细说明了这个敌人的本质，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外国人（“其成员主要是从法国和圣多明戈来的移民”），以及他们在美国存在的程度及其最终目标：

> 我们确实有秘密敌人，他们在我们国家有规律地分布着；……这些敌人公认的图谋是颠覆并推翻我们神圣的宗教，以及我们自由和杰出的政府。对于并不固执地闭上眼睛或因偏见而致盲的每个人而言，他们阴险和秘密活动的恶果是清晰可见的。

这是摩西所有公开演讲中最为轰动的布道，美国人因此第一次将光明会和共济会支部联系起来，但像罗比森一样，摩西也在竭尽全力在“好的”共济会员和坏的或“虚假的”共济会员之间进行辨别。摩西断言，弗吉尼亚的“智慧支部”是后者中的一员；摩西从可靠的共济会员那里得到确实无疑的根据，那就是“智慧支部”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支部，而是一个光明会的基层组织。从弗吉尼亚支部所谓的成员数字上可以外推，

摩西估计美国的光明会会员数量肯定在1700人左右。

如果摩西希望他的观点得到各种支持的话，那么光明会和共济会之间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自从殖民地时代早期开始，共济会就一直存在于美国，如果摩西认为共济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光明会相互勾结的话，他就会丧失所有的信誉，甚至在其最为强硬的共和党支持者那里也会如此。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萨缪尔·亚当斯在内的许多开国元勋都是共济会员；革命英雄约翰·保罗·琼斯也是一名共济会员，他被视为里维尔的“午夜骑士”。众所周知的是，这个国家的首任总统是一名共济会员，并在国会山的奠基仪式上穿着共济会的服饰。共济会的意象甚至渗入了美国国玺（the Great Seal）的设计上。共济会已经与美国体制结构彻底捆绑在一起了；他们并不准备推翻政府，因为他们就是政府。

另一方面，“虚假的”共济会员是危险的、广泛的和富有活力的；美国人有义务抵御其影响力，否则就要承担其后果。摩西布道的结论是：

> 在这个国家，这个恶魔般的组织还有无处不在的分支机构，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证据……他们甚至吹嘘，他们的计划无所不包且掩藏甚深，是不可战胜的，成功是确定无疑的。如果那时，我们美国人不能……采取行动……我们肯定沦为那个国家谋略和武力的牺牲品，在其法律的封面上以及自己的标准上，将会写上强调性和描述性的座右铭——浩劫、掠夺和毁灭是我们的利益。

这次布道立刻引起了轰动。其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再版四次。联邦党的文件在其后推波助澜，并敦促其读者要人手一本：“那些不希望无视自身毁灭的人毫无疑问要拥有这本书，因为该书在我们国家的每个人心中都确定无疑地证实了恶

魔般俱乐部的存在。”从康涅狄格州到缅因州，其布道选择了这个主题，详细论述了光明会这个“可怕的俱乐部”的存在及其意图。摩西与其庞大的支持者产生了共鸣，康涅狄格州的一个人来信写道，因为摩西，“关于罗比森和巴鲁尔的事实……已经进入了每个家庭”。

由于担心摩西的布道无可挽回地改变公众舆论，民主党的文件大量涌出，寻求每个可能的方式来羞辱摩西及其观点。他们注意到所有关于光明会的论说都会不可回避地追溯到法国，并且怀疑恐慌只不过是联邦党人为了升高反对法国的敌意，并使公众脱离民主党的图谋。弗吉尼亚的《独立编年史》（*Independent Chronicle*）质问如果危险如此巨大，那么为什么摩西不能直接将其证据——其“荒谬绝伦的文件”交给总统。康涅狄格州的《水星报》用嘲讽、绝望的口吻写道：“他将……为他及其职业带来更多的荣耀，以再次回到其‘撰写地理的’的昔日事业，因此并不试图用发现可怕的启示主义（Illuminatism）来扰乱公众意识。”

摩西的对手没用很长时间就找到了巧妙的办法。布道发表后不到两个月，在光明会热点的顶点，民主党的文件就公布了一份渴望羞辱全部光明会神话的状况，并且导致摩西狼狈不堪。首先，调查发现摩西“已经认证的名单”来源是主要的联邦党人奥利弗·沃尔科特（Oliver Wolcott），这证实了反对党的长久怀疑，即光明会阴谋不过是联邦党诋毁对手的一个图谋，摩西无意中惨遭愚弄，对摩西破坏性更大的是《水星报》揭露的东西。这个文件公布了汉堡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埃伯林（Ebeling）的一封来信，他与当时许多包括摩西和杰斐逊在内的美国名士经常通讯，并且是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的成员。埃伯林的来信从欧洲人的视角描述了约翰·罗比森的工作，

他说，从本质上看，罗比森的《一个阴谋的证据》在欧洲简直就是无人问津，罗比森本人也被看作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他陷入财务困境，并被共济会支部驱而逐之。民主党的文件在欢呼，并且指责联邦党的牧师发起了一场类似于“塞勒姆女巫审判”（the Salem Witch Trials）的运动。

惊恐于其关键来源被揭露为一场骗局的摩西，试图通过更精细地调查弗吉尼亚的“智慧支部”而重整雄风。他同样失败了。在与弗吉尼亚国会议员约西亚·帕克（Josiah Parker）通讯联系之后，摩西发现，虽然支部成员大多数都是法国人或原籍法国，但是国会议员可以担保他们人格的力量和清白的名声。“智慧支部”不是一个激进主义的温床，而是正直的弗吉尼亚人的集会。就像大多数公众一样，光明会的痕迹已经消失，摩西不久以后也放弃了这个运动。

恐慌的影响是深远的

恐慌可能会从大众的意识中转移开来，但是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会形成一种狂热猜疑的氛围，导致1798年《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的出台，这是美国最初通过的限制性最大的国内安全法。从6月底《归化法》（*the Naturalization Act*）开始，申请公民身份的居民的居住期限从5年延长到14年。紧接着的便是《客籍法和惩治客籍敌人法》（the Alien Act and Alien Enemies Act），这部法律给予总统未经审判就可以监禁或驱逐侨民的权力，即那些被认为是对“美国和平与安全构成危险的”侨民，或者政府有理由相信的“那些参与到叛逆活动或秘密图谋反对政府”的侨民。人们感觉到最大影响的是最后一部法律，即《惩治叛乱法》（*the Sedition Act*），这部法律对新闻自由，尤其

是那些批评亚当斯政府的报纸进行了严格限制。在这部法律下，犯下以下罪行的人，将被处以高额罚款或两年以上徒刑，这些犯行包括“写作、印刷、宣扬、出版，或应该造成，或获得作品、印刷品、宣传物和出版物的……那些虚假的、中伤的或邪恶的针对美国政府的写作或作品……意在诽谤政府……或者总统……或者煽动民众仇恨美国”。实际上，任何媒介表达或出版批评政府的意见都会面对针对它的法律行动。这与东北部的大多数法庭由联邦党人的法官掌控的事实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充满偏见的胡审乱判。大多数反对派的报纸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这部法律实施之后，有25人被捕，与此同时，其他人则遭受了从拷打到秘密诉讼的诸般待遇。但是最终，这部法律还是极为失败。联邦党人迫害的报道导致其与压迫性的英国政体相对照，并促使托马斯·杰斐逊在1800年的大选中击败亚当斯获胜。

光明会恐慌在其他方面也是有意义的：其遗产将会对共济会在美国的地位带来持久的影响。虽然光明会阴谋神话最初的支持者摩西及其他人，在小心翼翼地从光明会阴谋的毒害中区分“真正的”共济会支部，但是，一旦秘密组织与阴谋思维划上等号，那就不可能将二者分开了。尽管共济会是令人尊敬的，甚至在美国有显赫的开端，但是从19世纪开始的时候起，它的声望顿挫，并在1826年“反共济会党”（the Anti-Masonic Party）成立时降到了最低点。这个强大的政党是美国两大主要政党的真正对手，这是美国第三政党的第一个，它甚至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虽然“反共济会党”没有走完19世纪，但是共济会的名望也从未完全恢复过来。

但是，这显然不是世界最后一次听说光明会。虽然现在这个术语等同于秘密阴谋，但是这样的界定也是不断嬗变的。它可以扩展、适应和歪曲，以吸引与反映社会流行的焦虑感。在

19 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光明会恐慌一直保持蛰伏状态。在 20 世纪的开端，在“反犹主义”（anti-Semitism）的丑恶幌子下，它们将会报复性地再现江湖。

第四章
光明会与反犹主义的兴起

我们应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里建立并繁殖自由的共济会支部，吸纳所有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社会精英的人，因为在这些支部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主要的智识基础和影响力的手段。我们应该将所有这些支部建立在一个管理中心的领导之下，且只有我们自己知情，而其他所有人则绝对被蒙在鼓里，这将由我们博学的长老们做出精心安排……在这些支部里，我们应该与所有革命和自由元素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紧密相连。

《犹太长老议定书》

1920年，一份特别文件开始在西欧城市中广为流传。据称该文件是“长老们”（elders）一次秘密会议的抄本，它仔细描述了接管世界的计划。在此之前，他们的手段是任何阴谋论的学生所熟悉的：通过将他们的成员秘密地送上各种权力位置之上；通过接管各种教育机构；通过给年轻一代“洗脑”，以及通过渗透到共济会的光明会替身充分利用其强大的社会关系。上面的引言可能来自亚当·韦斯豪普特之作，其“一个管理中心

……绝对被蒙在鼓里”的叙述可能模仿了韦氏“无名上级”（unknown superiors）的机制，其“目的使手段正当化”的潜在哲学可能也出自韦斯豪普特之手。但是，这份文件却与韦斯豪普特或光明会毫无关系。其调门是威胁性的，甚至有些歇斯底里，它似乎为西方世界的威胁提供了证据，使此前光明会阴谋造成的恐慌就像是童子军的所作所为。这份文件称为《犹太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它为这个世界宣泄排犹浪潮提供了一种新的且致命的形式，最终在大屠杀中方告结束。

但是，在紧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这份《议定书》就不可避免地与光明会的神话纠缠在一起了，并且成为其现代的化身，甚至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在静静地潜伏了 100 多年之后，光明会威胁造成的恐慌开始蔓延，并为《议定书》扭曲的演变提供了素材；就像游乐园的镜子映照出的总是变形的形象一样，由此产生的可恨宣传也无限反映了过去的光明会故事。在这个阶段，特定的神话得以更加强化：犹太教与秘密组织之间的联系，光明会是七个世纪、千年，甚至更古老的看法等不一而足。

这份《议定书》含糊的起源在欧洲留下了交叉污染的痕迹，从法国到俄罗斯来回影响。历史学家诺曼·科恩（Historian Norman Cohn）的《种族灭绝的正当理由》（*Warrant for Genocide*）一书，为《议定书》的复杂历史提供了可靠的说明。他将其发端追溯到危言耸听者巴鲁尔那里，此君在其臭名昭著的《备忘录》取得成功几年之后，被说服修订其早期理论，以便将犹太人整合进革命的阴谋者的名单之中。据我们现在所知，他如此做的理由实际上是一封伪造信的结果，这封信据说是佛罗伦萨的一名军官西蒙尼尼（JB Simonini，一个假名）

所写。

在巴鲁尔有关法国大革命背后阴谋者的最初坏蛋陈列馆中，还没有提到犹太人。他将矛头指向了雅各宾派、法国哲学派和百科全书派、偏离了正确轨道的“虚假”共济会员等，当然，还有光明会，事实上，其矛头所指的就是那些看起来在挑战现状的任何人。他略下犹太社会不提是出于第二章所提及的事实，那就是在他于18世纪晚期撰写其《备忘录》时，法国犹太人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也许犹太人的数量在整个法国只有区区4万人，他们的生活基本上与其他社会相分离，并且在政治上面可以忽略不计。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伴随着新政府而来的是犹太社会的解放和获得崭新且前所未有的权利，其中包括公民权。在阴谋论者眼中，法国犹太人显然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此时的法国，君主制被推翻，贵族丧失了祖传的土地，教会遭到摧毁，而以前无权无势的犹太人却陡然咸鱼翻身，鹤立鸡群。一旦这样的观念植入到公众的意识中，它便开始扎下根来，并在19世纪伊始继续繁荣成长。

“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的产生

这个理论首次引起公众关注的一个特殊事件，是拿破仑1806年与法国知名犹太人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本质上是向皇帝再次确保犹太人对法国的忠诚。拿破仑称这次聚会为“伟大的公会”（the Great Sanhedrin），这个名称采自古代犹太法庭的称呼。对于批评者和那些对这个神秘社群的权力深感恐惧的人来说，这个名称显示了一个秘密犹太政府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现在只是在大革命成功的结局中再次展示自己。对于拿破仑的敌人而言，他不过是一个反基督分子，通过主持召开“伟大的

公会”，在他的犹太公民面前像弥赛亚一样表演。在伦敦以法国移民为对象的出版刊物《安比古》（*L'Ambigu*）宣称道：“它只是为我们保留了观察的机会，来端视这个反基督分子如何对抗上帝永恒的戒律；那必定是其穷凶极恶的最后行动。”在整个欧洲大陆，俄罗斯东正教教会的“宗教圣会”（the Holy Synod）警告道：“今天，他提出与犹太人重新联合，上帝的愤怒已经遍及地球，以敦促他们谴责他们面前的假弥赛亚。”（以上两个引语出自：Cohn，80 页）在如此激昂的气氛之下，以“西蒙尼尼信件”（the Simonini letter）而众所周知的这份神秘莫测的文件找到了四处散播的理想环境。

1806 年的某个时候，这封信件送到了巴鲁尔那里，警示他：一个远比他所揭露的更为强大的组织已经出现。这封信认为，“如果人们考虑到它的财富与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所享有的保护的话”，那么这个组织可以描述为是“最可畏的力量”（引自：Cohn，28 页）。这支力量是谁？非“犹太教派”莫属。当时作者进一步提供了一个其经历的骇人说明。用卡格里奥斯托捏造见证光明会入会仪式这样明显的模仿手段，作者解释了在一群犹太皮埃蒙特人的会议上，他是如何假装一个犹太人，因此参与了犹太主宰世界的主要计划。他新结识的同伴给他看了“分配给那些支持这个事业的人的大量金银财宝”。不仅如此，他们还允诺如果西蒙尼尼加入共济会，那么就会在其无形军队中晋升将军军衔。那时，他们给他装备了用共济会意象装饰的武器。呈现给他的“秘密”纯粹就是狂想，据推测其起源可以追回到 11 世纪。其中之一是“山中老人”（the Old Man of the Mountain）的看法，“山中老人”是“阿萨辛”的领导人，从 11 世纪到 13 世纪，他令整个穆斯林世界恐怖万状，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而且建立了光明会。因此，按照“西蒙尼尼”的说法，

所有光明会的活动——渗透到共济会、教育和政府机构——都可以归因于犹太人。这还不是全部：这封信认为，意大利至少800座天主教教堂实际上为犹太人所有，只不过是大多数牧师假装是基督徒。这封信警告道，由于犹太人被授予更多的权利，他们将会在整个欧洲收购越来越多的土地，直到基督徒民众家徒四壁，被剥夺一空。但是，这封信揭示的最终目标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们将取消其他教派并确立自己教派的规则……他们将把基督徒改宗到如此众多的犹太教堂，并将剩下的基督徒还原为绝对的奴隶”（引自：Cohn，28页）。

这份文件似乎要独自提出“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神话这一理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及以后出现的所有歇斯底里和耸人听闻的理论中，其中包括魔术师和催眠师恐惧说、“骑士团”恐惧说以及共济会和马丁尼教派（Martinists）恐惧说等，这一次完全是新出现的。它对巴鲁尔产生了震慑性影响：这最终成为阴谋论迷惑的最后片段。巴鲁尔接受了这封信关于犹太人获益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他看到了这一切证据。因为他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共济会策划了这场革命，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组织是相互同情的——如果他们事实上不是同一组织的话，那也是串通一气的。关系不大的是，实际上没有多少共济会支部接受犹太人成员——巴鲁尔推断，他们不过隐藏了他们真正的信仰。他继续指出，作为一个旨在促进人权理念的组织，共济会清楚地打算改善犹太人的运气——除非他们客观上帮助了他们自身，不然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看法在公众中流行开来，许多人某种程度上确信，拿破仑是一个犹太人，这是因为同样的理由：在其战功赫赫期间，犹太社群似乎生活优裕，犹太人社区被关闭，犹太人被解放。

谎言编织的过程

对于巴鲁尔而言，“西蒙尼尼信件”为他的阴谋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基于这个新的见识，巴鲁尔将犹太人阴谋的神话嫁接到他以前的理论上，并重新评估了“圣殿骑士团”的作用（他已经证明了这帮人一直在法国大革命的幕后操纵策划活动）。巴鲁尔突然发现，自从12世纪创建以来，“骑士团”就一直与犹太人结成伙伴关系了。正是“他们”通过“一个21人的最高委员会，其中9人是犹太人”的机构来监督共济会支部的各种活动。在这9人之上的是一个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的秘密3人小组，在此之上的是负责掌管一切事务、秘密挑选的“掌门人”（Grand Master）。这个幻想物与光明会的“无名上级”规则可以相提并论，并且证明了其引人注目的持续性。在几个世纪里，秘密阴谋的神话在扩展和扭曲，并与那些可能成为当时时尚的事情、秘密力量的看法、秘密力量的幕后、幕后的秘密力量等等统合在一起，就像“俄罗斯套娃”无休无止的数量一样，具有相当惊人的伸缩性。

同样，巴鲁尔使一个巨大而隐晦网络的构思延续下来，他认为这个最高委员会没有固定的总部，但是它会在国家头目相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召开会议，并且总是在绝不引起注意的背景下进行。据称，其成员会报告各自的活动，他们或者是基于研究之目的，或者是参加会议（也许是痛击法国哲学思想，或对普遍教育怀疑的证据）。巴鲁尔似乎在模仿他的“长老”，即他对“山中老人”仅有的一点了解，认为他在要求其追随者死心塌地地效忠，不服从的结果就是一个死。秘密组织通过共济会的网络由“长老”中转，扩散到整个大陆，巴鲁尔为此解

释道：

> 从邻居到邻居，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秘密组织以难以比拟的速度传播开来，因为延缓行人行程的既不是坏天气，也不是通常降临于骑手或马车的坏运气；当熟知这个国家的时候，一个行人总是顺利前行……他们不是为了吃睡而停下来，那只是因为每个人属于两个小组。彼此替换的15个行人选择捷径且不断行进，可以在9小时内从巴黎到达奥尔良。（引自：Cohn，31页）

一个拥有步兵军团的无所不在的网络不为饥饿和疲劳这些弱点所困扰，这个看法是一个几乎具有超自然能力的神秘莫测的教派概念的基础，并且是早期光明会神话放大的主要动向。随着这个故事的不断延展，秘密组织超自然的无所不能这个看法不断固定下来，直到20世纪晚期前，还有最后想象力的跃进，那就是光明会员成了外星人（请看第七章）。

“西蒙尼尼信件”的作者从来就没有得到确认，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这是由一位怀疑拿破仑及其对犹太人予以支持的法国政治警察所写。由于其在揭露各种阴谋过程中的丰富阅历，巴鲁尔顺理成章地成了接收这封信的目标。来自法国主要保守派的支持将使社会大众关注这封信的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政治破坏力。这封信在短期里并不会带来理想的影响。巴鲁尔随后在其殚精竭虑的、由阴谋驱动的世界观指导下，对犹太人的作用进行的重新评估也没有获得公众的支持；直到他1820年去世的时候，巴鲁尔的最新作品几乎没有引起关注，与其《备忘录》的成功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它为这份《备忘录》的起源奠定了基础，他所论述的许多理论将会反复粉墨登场——被歪曲、被夸大——就像某些地狱般的主旋律一样回响到这个世纪。

这份《备忘录》的起源是一个扭曲的起源，并与光明会神话的发展等而视之，一旦这个故事获取动力，那就不可阻止，并堆砌一层又一层的谎言，知道其起源根本无人在意。不同点是这份《备忘录》从一开始就是虚构出来的。正确的是这样的：它们首先出现于19世纪中期德国出版的一部小说。为了理解他们在20世纪阴谋论贩卖（包括光明会神话）中的作用，追踪其发展进程是非常重要的。

“西蒙尼尼信件”的影响并没有立即体现出来；在几个年代里，有关犹太人阴谋的神话一直处于潜伏状态，或者说只是在地下弥漫，根本就没有产生较大的反响。下次再度出现的地方是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当时德国犹太人在人口比例中微不足道，只有1．2%，正如诺曼·科恩（Norman Cohn）所指出的，拿破仑时期赋予犹太人的权利激起了“反犹主义”的狂暴反应。到1869年前，德国北部的犹太人得到了其他德国人一样的权利，这时的敌意达到狂热的程度。

“拉比的演说”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的德国，小说《比亚里茨》（*Biarritz*）出版了，它使用了约翰·雷特克里夫爵士（Sir John Retcliff）这个怪异的笔名，但真正的作者是赫尔曼·戈德斯奇（Herman Goedsche），此君是一个失败的邮政人员和死心塌地的反犹人士。除了一份令人痛苦的工作之外，戈德斯奇还是普鲁士秘密警察的情报员。由于伪造文件用于1849年审讯民主党领导人本尼迪克特·瓦尔德克（Benedikt Waldeck）的叛国罪（瓦尔德克随后被无罪释放），戈德斯奇被邮政局解雇。无所事事之时，戈德斯奇转而撰写一些毫无价值的小说，其中包括出版于1868年

的小说《比亚里茨》尤其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本书对策划和目的了无兴趣；要不是有声名狼藉的一章的话，这本书及其作者早就被人忘到九霄云外了。存在问题的这一章“布拉格的犹太人公墓”，骇人听闻地叙述了神秘老人举行的一次午夜会议，为了方便作者和读者，这些老人乐于当众高声讨论其主宰世界的计划。（这些致力于秘密主宰世界的组织似乎对安全问题异常松懈。）当时钟在晚上11点敲响的时候，作者溜进了公墓大门。从阴森恐怖的幽暗之地接连出现13个寿衣包裹的人，每个人都在一个特别的坟墓前停下来祈祷。在午夜迅速来到后，最后一个人光临了，从坟墓深处传来一个空洞的声音，向以色列12个部落的代表致意，最后一个人代表的是世界的“不幸与流亡”。每个人轮流来到墓前报告他们在上个世纪的活动情况，其中包括至此所熟知的恶毒行为的详细说明：储藏黄金，操纵证券市场并据此操纵国家领导人，暗中破坏基督教堂等。这些人当时同意在另一个百年召开会议，其时，他们主宰世界的计划将结出硕果。在小说其他部分讲的是，作者和伙伴力图将这个世界从如此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

这个异想天开的可怕幻想没有沉没到应得的暗淡无光之中；这一具体章节证明了耸人听闻的流行，并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它作为独立的文本而被再版，并在整个欧洲以令人窒息的速度流传开来。首版仅仅4年之后，它就于1872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宣传册，其前言指出，虽然这是一个虚构的产物，但是它也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就像当今的都市传奇或网路骗局一样，它也在整个俄罗斯继续其旅程，该版本相继出现于莫斯科和敖德萨，然后到了布拉格。在它到达法国、1881年在《当代》杂志翻印之前，所有关于它虚构起源的痕迹已经被人遗忘殆尽了，或者说被随意清除了。现在，它以真实文件的面目公

之于世；全部 12 篇演说已经被强化，并被归结到一个拉比的身上，而见证的根据显然是故意出自一个令人尊敬的贵族，也就是怪异的约翰·雷特克里夫爵士（Sir John Retcliff）。现在，这个文本正是众所周知的“拉比的演说”（The Rabi’s Speech），并被当作货真价实的真理。它证明了耸人听闻的持续性，并获得不断增加的扭曲和点缀加工，以卑劣的方式在欧洲传播。迟至 1933 年的时候，一个瑞典的版本面世了，在前言中对令人敬重的雷特克里夫爵士之死表示哀悼，此人终其一生而为揭露“拉比的演说”做出贡献。

“拉比的演说”这份遗产像病菌一样在欧洲肆虐，并以几种不同的形式而展现出来：首先，它在秘密的阴谋神话中再度引入了魔术和超自然这样的元素，这只是巴鲁尔刚刚去世之前所触及的，而此前自中世纪以来则一直被人遗忘了。犹太人拥有秘密的、神秘的知识这个看法赢得了支持，与此同时，这可以传递到中世纪的“骑士团”，而“骑士团”则依次建立了共济会的想法也在不断强化。19 世纪 60 年代晚期《比亚里茨》出版时法国出版的几本书，对这个主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自大革命以来，法国的天主教会与共济会一直在进行痛苦的对抗；具有共和与反牧师理想的共济会是教会所有恐惧的化身。对于虔诚的天主教徒来说，批判教会公然进行恶魔崇拜只是一个短暂的步骤。显然，共济会两方面都有罪。犹太人就是共济会员。因此，就像蛇咬自己的尾巴一样，这个循环观点就被建立起来了。

谎言在漫延

19 世纪 90 年代前的法国，在更容易相信两个组织的神秘力

量的法国公民中，还有许多的骗局。列奥·塔克希尔（Leo Taxil）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此君散布了共济会与撒旦主义相互勾结的几个故事。从一个故事中就可以得到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美国共济会的长老有一部魔鬼操控的电话，允许他与世界上的其他支部保持联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塔克希尔的目的是引起教会关注他敌视共济会，以强调其相信反共济会谎言的意愿。在这个方面他是相当成功的，他的许多荒谬观点进入了反共济会的舞台，直到今天还在引用（比如，共济会在羊头双性魔鬼的祭坛上进行崇拜活动的说法就可以追溯到塔克希尔那里）。1893 年法国出版的一本书使这个联系越发清楚，书名是《共济会，魔鬼的犹太教堂》（*Freemasonry, Satan's Synagogue*）。作者梅乌林（Monseigneur Meurin）是毛里求斯的枢机主教。他的世界观似乎受到巴鲁尔的强烈影响；当然，作为巴鲁尔的天然继承人，他也呈现出了偏执的牧师风格。就梅乌林而言，这个问题是简单的："共济会的一切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犹太人、排他的犹太人和激情的犹太人所为"（引自：Cohn，48页）。在"历史将会说明最近几个世纪的革命是如何在犹太人的最高旨意之下启动的"之前，这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这些革命如何且为什么由共济会发动？因为他们控制了政府！"如果我们不理解所有国家机构的话，就无法说明共济会支部幕后操控所有革命的事实……政府都在共济会的掌握中，归根结底，犹太人控制了政府。"

对于一个犹太人数量很少的国家而言，这些流言传播的热情和速度是惹人注目的。法国农民对诸如此类的故事最有胃口，正是在这些不太可能与犹太社群较劲的乡村，却被严格限制去巴黎或其他城市。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和农民对城市的怀疑让这些故事扎下根来。

如果说“拉比的演说”在法国强化了共济会和犹太教超自然能力这种信念，那么在俄国则展示得更为野蛮，并且被用以激起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横扫这个国家到系列屠杀火焰。俄罗斯的19世纪是落后于其西方邻居的世纪：它屈服于欧洲最后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重压之下，陷入迷信的陷阱之中，步履蹒跚地推行其他欧洲的首都拥有的现代化。本质上看，其进步还没有超越中世纪，此外，没有什么要比它对犹太人社会的态度更清楚地说明这些。俄罗斯有500万犹太人，约占世界犹太人总量的三分之一。自中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定居区”（位于今天波兰的几个省）之中，臣服于各种严格的限制和连续几个沙皇进行的国家惩罚性制裁。在19世纪中期的短暂喘息时期之后，亚历山大二世时，俄罗斯犹太人的生活条件似乎有所改善，但是他1881年被暗杀则让这个进程后退了几个世纪。他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三世、其后的尼古拉二世都是些恶毒的排犹主义者。亚历山大三世在积极鼓吹这样的概念，那就是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暗杀的，1881年至少200人被杀的浪潮随即席卷了这个国家的西南部。“拉比的演说”的到来有助于强化这样的看法：如果需要来自国外的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证据的话，这里的就是额外的证据。

19世纪的俄罗斯有其自生的反犹主义文献，“拉比的演说”只不过再次确证了已经流传了一些时间的看法：未知的与隐藏的同时发生的概念，因而也是不详的预兆。1869年的一本书《卡哈尔之书》（*The Book of the Kahal*）充分利用了读者的无知；其中使用了陌生的希伯来文“卡哈尔”似乎就是不祥之兆（虽然它只是表示“社区组织”的意思，直到1844年，在俄罗斯还是合法组织）。其作者约瑟夫·布拉夫曼（Joseph Brafmann）是秘密警察的情报员，在全国的卡哈尔会议上做了真实且无伤大

雅的会议记录，然后将这些记录编织在一起，认为存在一个将各个组织连接起来的巨大阴谋网络。这本书是如此流行，以至于成了政府的官方文件，并给秘密警察留下了特别印象。其他一些人则采取了行动：一个尤其令人讨厌的家伙卢托斯坦斯基（Hippolytus Lutostansky），他曾经是个天主教牧师，因为犯下太多难以提及的肮脏罪行而被解除牧师权，此人写了一本书，使中世纪犹太仪式上用基督徒血祭的神话再度流传开来。他试图通过以公开否认本书的内容来换取钱财的方式敲诈犹太人的关键角色，但是没有得逞。其后，在1913年臭名昭著的“贝里斯审判”（Beiliss Trial）中，该书被当作证据而采用，门德尔·贝里斯（Mendel Beiliss）是个犹太职员，他被指控在一个宗教仪式上杀害了一个基督徒男孩。卢托斯坦斯基的另一本书《塔木德与犹太人》（*The Talmud and the Jews*）向俄罗斯人介绍了“犹太人—共济会”勾结的概念。这是一个新鲜的故事：直到19世纪20年代被宣布非法之时，共济会在俄罗斯一直享有令人尊敬和仁慈博爱的名声。作为这些论调的证据，卢托斯坦斯基在书中收录了“拉比的演说”。

如此令人遗憾的说明在继续，一些自负的骗子提供了堆砌着一个谎言又一个扭曲的谎言的可恶文献。一个偏执幻想家的作品在奥斯曼·贝（Osman-Bey）的名义下撰写（真实姓名表述为不同的米林格尔或米林根），他是一个国际诈骗犯，因弃保而逃而一直在被追捕，正是这样的人却因为反犹主义而过上了健康生活。其令人厌恶的著作《犹太人征服世界》（*World Conquest of the Jews*）在19世纪晚期的时候已经再版7次之多。在书中，他重复了仪式谋杀通常的错误，并将所有的世界性事件追踪到巴黎仁慈的以色列世界联盟那里，这是一个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慈善组织。他认为，这个19世纪的组织不仅要对法国大

革命负责，而且要对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负责，他们通过遍布欧洲和俄罗斯的复杂而巨大的间谍与代理人网络而工作，这直接呼应了巴鲁尔的断言。这本书的框架是一个秘密犹太政府演讲的伪造见证，它为臭名昭著的捏造物《犹太长老议定书》提供了一个模型。

《议定书》的衍生品

《议定书》于1903年首先出现于俄罗斯，作为圣彼得堡出版物《旗帜》（*The Banner*）的系列文章之一。其编辑克鲁舍凡（P. A. Krushevan）是一个恶名昭彰的反犹分子；仅仅出版《议定书》几个月之前，他已经在他的家乡比勒陀利亚附近的基什内夫（Kishinev）煽动了一场恶意的杀戮，造成45人死亡400多人受伤。这个编辑将这些文章描述为来自法国的译文；至于这些东西如何成了他的占有物则没有任何解释。这些文章最初出版的名称是《共济会与犹太长老世界联盟会议备忘录》（*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World Union of Freemasons and Elders of Zion*）。面世后不久，就像此前的"拉比的演说"一样，它们也呈现了自身的生命活力。不久，他们以廉价宣传册的形式选择并出版了这些文章，使用诸如"我们忧虑的根源"或"人类的敌人"这样的标题。当时的一个版本称为《共济会议定书摘录》，该书显然受到一直流行于法国的"犹太人—共济会"阴谋神话的影响。这些宣传册瞄准的是乌合之众，在帝国卫士装饰的版面下出版，表达了为正在成长的极端右翼组织招揽群众支持的意图。

这个文本在1905年影响了不同的读者群，当时虚构的神秘人物瑟尔吉·尼鲁斯（Sergey Nilus）增补了一本书，书名曰

《小中见大：反基督者思考即将发生的政治可能性》（*The Great in the Small: Antichrist considered as an Imminent Political Possibility*）。炮制这本书的具体目的是引起尼古拉二世对神秘学识的关注，它成功了：根据沙皇的命令，这本书在莫斯科的368座教堂的布道中被引用。直到1917年最后的修订版，这本书已经连续再版多次。由于碰到这样的时机，因而其影响是巨大的。《备忘录》将走向全球。

不足100页的《备忘录》由24章组成，大概就是来自秘密犹太政府的一些演说词和议定书，这些内容强调的是犹太人接管世界的计划，并且描述了一旦此举得逞后的世界状态。1922年出版于英国的版本的序言包括光明会"无名上级"方法的不同凡响，描述了这些阴谋如何追踪到古代，但仅仅揭示了其全部的精选部分：

> 按照秘密犹太主义的记录，所罗门和其他犹太智者在公元前929年就已经策划了一个阴谋，即：由犹太人和平征服整个世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图谋正在具体实施，并由那些不断招入到这个集团的人来落实。这些智者决定以和平的方式、为具有"蛇的象征"（the Symbolic Snake）——狡诈的犹太人占领世界，蛇头代表了已经参与到犹太政府计划的人，蛇身则代表了犹太人，至于政府即便对于犹太民族自己也要保密。

这个文本扭曲而耸人听闻的语言以及逻辑混乱的论述使当时反犹主义的谎言发生倒流，与此同时，也增添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它清晰地说明了犹太人阴谋与自由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自由主义正在证明是20世纪早期的一股力量。以此论之，它与反光明会的文献是明显一致的：一个有潜力威胁到现状的新型意识形态必定是恶毒个人组成的小集团的结果，而

不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的必然现象。如果 18 世纪光明会的概念回应了法国大革命这个复杂问题需要一个简单答案的话，那么《备忘录》在 19 世纪也有类似的突破。《备忘录》对反犹主义扩散的影响导致 20 世纪 20 年代光明会恐慌的重演和重构。

尼鲁斯最后的《备忘录》修订版于 1917 年面世，书名曰《他来了，就在门口……反基督者光临与魔鬼君临世界》(*He is Near, at the Door……Here Comes the Antichrist and the Reign of the Devil on Earth*)。正是这个版本成了废黜的女沙皇最后的所有物，在皇家暗杀行动之后，她从仅仅三本书中的一本（其他的是《圣经》和《战争与和平》）中就找到了个人的寄托。这个偶然性事件似乎证明了这个版本的真实性，并将《备忘录》带入到更大的读者群之中。女沙皇的个人神话偏好促进了这个进程，并为阴谋论者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女沙皇去世后，人们发现她在其流放居所的窗户上刻画了一个小小的万字饰。众所周知，她一直在使用万字饰作为个人护身符，并经常戴着万字饰的珠宝。同样，女沙皇一直是个极度迷信的女人，无论万字饰可以给她带来什么个人含意，在此之前它就开始承载了当代的意义。对于熟悉符号的俄罗斯人而言，女沙皇的万字饰和尼鲁斯的书似乎都在指明犹太人主宰世界阴谋的证据。

在俄罗斯白军解释布尔什维克崛起和“十月革命”的武器库中，这本《备忘录》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该书被分发给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代表团成员，以及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官员，目的在于赢得俄罗斯内战的外部支持。今天要理解如此一堆表面粗糙的废话是如何获得严肃的考虑是很困难的，但是，因为这个世界还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后震撼之中，或许就因此更为脆弱地接受了这些简单的答案。不管怎样，1920 年《备忘

录》在欧洲以几种语言出版，并为许多严谨的出版商认真对待。在英国，是由德高望重的主要出版商“爱尔·斯珀梯伍德”（Eyre & Spottiswood）出版，这似乎给了他们绝对不应得的社会地位。1920年5月，伦敦的《时代》杂志质问道：“这些《备忘录》究竟是什么？它们是确有其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是什么恶毒的集会编造了这些计划，并对暴露计划窃喜不已？……通过扭曲我们国家机体的每个纤维，我们逃脱了一个‘德国治下’只是为了陷入一个‘犹太人治下’？”并非所有出版物具有如此明确的说服力。《时代》社论发表后一周，《旁观者》杂志也评论了《备忘录》，它将该文本描述为“一篇恶毒的愚昧之作”，是“老朽政体的惊慌失措的莫斯科人”的产物，并且“显示了其道德的邪恶和智识的堕落”。这篇文章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轻率地生吞活剥”的话，那么这个文件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以上均引自：Holms, *Anti-Semitism in British Society*, 1876 – 1939, 148页）。

仅仅一年之后的1921年8月，《时代》就从其最初的立场上后退了，发布了一篇社论承认错误。其通讯员菲利普·格拉夫斯（Philip Graves）正好碰到一个宣传册，其调门与《备忘录》极为相似。格拉夫斯通过一个中间人竭尽全力地搞到了这本宣传册，中间人是从一个前“奥克哈玛”（Okrhama），即一个沙皇秘密警察那里弄到的。在法国，这份宣传册是莫里斯·尤里（Maurice Joly）挖苦拿破仑三世及政府而作的，书名为《孟德斯鸠和马基雅维利通向地狱的对话》。这个文本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孟德斯鸠与专制主义的辩护者马基雅维利之间的哲学论争。《备忘录》的炮制者给马基雅维利留下了大量完整的对话，并通过“长老”的口而表达出来。尤里的解释结构设置被用在《备忘录》撰写的模板上，他的文本包括25个“对话”，

而《备忘录》是24个。但是，无论是哪个剽窃约里成果的人都不会太关心逻辑；有些孟德斯鸠鼓吹自由主义的主张也同样归结在“长老”身上，正如诺尔曼·科恩所指出的，这有助于自由主义是犹太人的创造物的基本论调。对俄罗斯读者而言，为了赋予捏造物一些可信度，俄罗斯的当代事件被硬塞进了尤里最初的对话之中。但是《时代》的报道揭露了《备忘录》究竟是个什么玩意：一个俄罗斯秘密警察恶毒抹黑的组成部分，笨拙地推进和寻找席卷俄罗斯的反犹主义浪潮的正当性，并为内战招揽国际支持。但是，众所周知的“潘朵拉的魔盒”已经打开，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备忘录》传播得太过广泛，并获得了太多的支持者。此前，他们阴险的网络正在扩展到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也将充分加以利用，在今天阿拉伯世界的许多地方，这些东西依然非常流行。真是难以置信，21世纪还会有人拒绝相信这个文本是捏造物。

韦伯斯特与光明会神话的重建

在英国，随着《备忘录》信誉的破产，这份文件就只有极端主义者和幻想家才感兴趣。在令人敬重的出版商出版后不久，就在法西斯主义的“布雷顿协会”，或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Lord Alfred Douglas）的极端右翼杂志《简洁英语》上广为流传。一个意想不到的衍生物是他们在激活光明会神话上发挥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今天，它获得了完全的新生和全新的读者群。如果没有光明会神话发展的下一个阶段，那么其发展痕迹就很可能已经冷却消失。20世纪的世界面临如此众多的现实威胁，坦率地讲，为什么要留心一个关于古代秘密组织的荒唐可笑的理论？业余历史学家内斯塔·韦伯斯

特相信她有答案，正是她的作品帮助了这个故事的复活。至于她对光明会神话建构所做的贡献，可以说她是她那个时代的巴鲁尔，她将指出 18 世纪的光明会信仰与今天的信仰之间的联系。

韦伯斯特生于一个家财万贯的家庭。孩童时期，她就过着养尊处优、舒坦优越的生活（其自传《奢华的日子》表现了这种悠闲与安逸的感受），并居住在一所大量国内职员定居的高贵豪宅区中。青年时代，她就拥有一个相当尊贵的社交圈，同样也涉足于当时许多时髦的“非传统的”兴趣，比如神秘主义、精灵主义、心灵感应等。正是爱德华七世的手相师预言了韦伯斯特与阿瑟·韦伯斯特的婚姻，阿瑟是一个缅甸警察，他们是在韦伯斯特的一次舒坦的印度旅行中相识的。回到英国后，她开始了其写作生涯，最初是写一些浪漫的小说，其中包括《骑士保福勒斯》（*Chevalier des Boufflers*），该书的副标题是“法国革命罗曼史”。也许它表现了当时流行的精灵主义，也许它证明了后来的作品中去掉所有理性面纱的旺盛想象力，但是，在研究这本书的时候，韦伯斯特开始感觉到与她所抒写的时代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信她一直是作为一个法国贵族而生活的，却在“断头台”上结束了这样的生活。在巴黎游历期间，她回想起一次排山倒海般的恐惧感，以及城市街道上血流成河的生动印象。从此开始，她短期的步骤是撰写一部修正主义的革命史《法国大革命：民主研究》（*The French Revolution: A Study in Democracy*），从此，她寻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在其 30 年代的写作生涯中，她为战争期间诸如《早报》和《爱国者》这样的极端右翼杂志，撰写了 7 部修正主义历史作品和大量的文章。在一段时间里（1924 - 1927 年），她是英国法西斯党（the British Fascist party）党员，虽然她的观念理所当然与该党盛行

的基调相协调，但是她还是通过阴谋论这个阴暗领域绘制了自己古怪的路线图。在她的同胞打算对《备忘录》揭示的犹太人阴谋论嗤之以鼻时，她独自继承了光明会阴谋的衣钵。

出版于1919年的《法国大革命》建构了韦伯斯特的世界观。她对18世纪法国贵族国度的认同，导致她将革命看作是人类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的象征；现代世界的所有错误都可以追踪到处决路易十六之上。从她本人的利益点出发，传统社会秩序的崩溃（那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上等阶层的衰落）只不过是发端于1789年的事件链条的延续。参照巴鲁尔和罗比森的思想之后，这些思想看穿了她自己奥秘的兴趣和反犹主义的迷雾，她继续调和阴谋论的丰富混杂物，将古代和现代的秘密组织、魔术和大众催眠术合成在一起。正如韦伯斯特在《法国大革命》中所描述的，这个阴谋的催化剂是显而易见的，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光明会的名称首次回到了出版物中：

> 德国共济会和光明会支部是产生所有那些以恐怖告终的无政府主义图谋的根源，正是共济会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之前的三年，处决路易十六和古斯塔夫三世的计划首次被制定出来。（Webster, *French Revolution*, 21 页）

一些当时的评论揭示了韦伯斯特在《法国大革命》上非传统的研究方法。1921年的《旁观者》写道："……无论她什么时候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她都要引用戏剧演员的真实台词。"也就是说，她在编造。但是，她也确实有当代的拥护者：凯切勒爵士（Lord Kitchener）将她形容为"这个国家里颠覆的最主要对手"。她的下几本著作极大地扩展了她的理论，但同样很少尊重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了《世界革命：反文明的阴谋》（1921年）、《秘密组织与颠覆运动》（1924年）以及《社会主义网

络》（1926 年）。

所有这些标题走的是相同的路线，即：通过每个主要世界性事件和骚乱，将一个难以解读的路线追踪到光明会的遗产上。《社会主义网络》和《世界革命》的首版甚至提供了隐藏在幕后的不同图表，并将欧洲每个左翼组织的世系追溯到亚当·韦斯豪普特身上。《世界革命》追逐了光明会从 1789 年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崛起的发展历程，再沿着联合爱尔兰的道路，发展到 1848 年革命和普法战争。在将读者的思维带到现在以后，韦伯斯特质问道："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问题，谁是现代的光明会这个阴谋的始作俑者？"（*World Revolution*，293 页）。这里，她转而在《备忘录》那里寻找答案。

韦伯斯特对《备忘录》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仅仅在这个文本的范围内就说明了光明会阴谋计划的程度：

> 现在，对于那些熟悉秘密组织语言的任何人而言，《备忘录》提出的观点并不新鲜；相反，许多书页里有异常的亲近语气。就当今的作者而言，出现于每一页的思想不过是："我以前在哪里看过？"其说服力某种程度上在不断加强："但这就是光明会而已！"的确，这是如此醒目，并不仅是韦斯豪普特和《备忘录》之间，而且是《备忘录》与后来光明会延续而来的秘密组织之间可靠的类比，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发现，各种观念的连续性是非常明显的。（*World Revolution*，296 页）

当为寻找亚当·韦斯豪普特作品的来源而涉及约翰·罗比森和巴鲁尔的时候，韦伯斯特就强调《备忘录》和光明会目标之间的相似性。韦斯豪普特的"目的使手段正当化"的哲学在《备忘录》中再次出现（"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与其说是我们必须关注什么是好的和道德的，还不如说是必须关注什么是必要

的和有益的"），对成员进行秘密监察以及渗透到大学和共济会的必要性正是如此。在阴谋论者的清单上，《备忘录》中的观点被逐点注以强调标记，这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程度。在某个阶段，韦伯斯特几乎承认了《备忘录》的真实性；它们如此贴切地符合一个秘密世界阴谋的概念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是由要求以那个方式显现的某些人捏造出来的：

> 一个可能性会迅速浮现在脑海中。难道它们（比如《备忘录》）不是描写秘密组织传说的某些人编织的捏造物？假若尼鲁斯一直是这个科目的学生，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死硬的反犹分子，那么对他而言，从早期的模型中重新制定出世界革命的规划就轻而易举。（*World Revolution*，305页）

提出这个看法后不久，韦伯斯特就背离了它，当她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中阐述这个看法时，面对的不过是"怨恨"，"犹太人的倡导者"不过是"返回到《备忘录》是俄罗斯秘密警察炮制的这个荒谬的解释上"。在当时看起，如此自然地演变成修正主义者就像是一个"玻璃逻辑"（glass logic），她的结论是："事实是当时《备忘录》从未被驳斥过，而所谓反证的空缺……要比所有反犹主义作品加在一起还要更多地令大众确信其真实性"（*World Revolution*，305页）。这个颠倒的逻辑是她最喜欢的花招，韦伯斯特不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观点的人，这个观点就是，缺乏有关光明会证据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正是它们存在的证据（巴鲁尔使用了类似的战术）："出版其秘密作品之后，光明会最大的忧虑是说服所有德国人他们的组织不再存在了"（*World Revolution*，79页）。在这个世界上，光明会从魔鬼那里得到了他们的角色，他们通过让世界相信它不再存在来玩弄最大的诡计。

尽管她是在英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时候写作这些东西，但是韦伯斯特的作品并未影响到社会主流。《世界革命》的前言很是疑惑地指出了这个事实，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社会主义媒体完全保持沉默，而大众媒体充满敌意的评论满足了他们自己，然后说这个作品充斥着'偏见'。"世界历史对于光明会这个秘密组织的说明显然是太远的一步，即便在韦伯斯特写作这种满是不确定性的时候也是如此。但在韦伯斯特的理论中，她并不完全是孤家寡人：她有，并且惊人地继续有需求几种版次的足够读者群。《秘密组织与颠覆性运动》再版了7次，最近的一次是1964年。虽然她那怪异的思路使她与普通人或公园法西斯分子格格不入，但她不是独一无二的，她似乎一直都是上、中等阶层的一颗种子，一个贵妇般不计后果的人。尽管她并未承认这一点，但是在珀普·亨内西（Una Pope-Hennessy）那里有先例可循，亨内西在韦伯斯特出版《法国大革命》近10年之前，撰写了《秘密组织与法国大革命》（*Secret Societies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该书复活了"骑士团—共济会—光明会"阴谋的神话。与韦伯斯特同时代的爱迪斯·斯塔尔·米勒（Edith Starr Miller），以"昆波鲁女士"（Lady Queenborogh）而知名。其《神秘的神权国度》（*Occult Theocracy*，20世纪30年代早期自己出版的）包括了此前已熟悉的根据，并得出了与韦伯斯特《秘密组织》相同的结论，即：这个世界正在受到"犹太人—共济会—光明会—魔鬼"的威胁，他们在策划通过毁灭基督教的方式来摧毁现状。但是，米勒清晰指出，光明会不过是犹太人世界阴谋的一个分支，认为"光明会代表了强大的犹太卡哈尔头目努力的结果，它正在使劲占据政治、金融、经济和道德的世界主导权"（引自：Barkun，*A Culture of Conspiracy*，49页），而韦伯斯特并不总

是能够确定谁在主导他们，并将所有的可能性都丢进了这个混合物中，提出德国人—犹太人联盟这个奇怪理论：

> 如果那时一个内圈出现，并形成纯粹由破坏性目的驱动的光明会，那么他们可能在那些德国人中寻找到支持就是可以想象的，这帮德国人渴望从与被看作是未来压迫者结成的国家联盟中分离出来，而那些希望在基督教文明的废墟上建立其帝国的那些犹太人那里，也会找到支持，因此，在落实其世界革命的过程中，便整合出一个一流的组织和庞大的金融资源。
>
> 另一方面，可能那个隐藏的指挥中心存在于隐身幕后的“大东方会”（大陆共济会）的犹太人圈子中，或者，也许像19世纪早期的光明会一样隐身于协定之中，并使用“泛德国人”和异教徒的光明会作为他们的工具。（引自：Barkun，49页）

人们对米勒的理解很少；她的书籍仅仅私下出版，并在其有生之年拥有的读者有限。但是，在今天有关光明会阴谋的研究中，与韦伯斯特一道，她是最广为引用的“权威”之一。在这个几乎是伪学术权威的世界上，诸如韦伯斯特和米勒这样的作者运用巴鲁尔和罗比森的嗜好，玩弄不断重复断言即事实、神话和捏造物即历史这些熟知的阴谋论者的把戏。在这个世界上，罗比森和巴鲁尔是“博学之人、坦诚之人……他们敬畏真理和宗教”（*Secret Societies and Subversive Movement*，viii）。今天，一个德高望重的主流出版商最近的出版物自由引用韦伯斯特的作品，视之为权威的文献资料，征引其“巨量的当代出处”（Marrs，*Rule by Secrecy*，222页）。正是采用类似的癫狂逻辑语调，诸如《备忘录》这样的宣传才能从戈德斯奇的低俗小说和尤里的自由小册子那里诞生出来。一旦足够的来源彼此参照，

他们就会在建构一个彻头彻尾的巨大事实印象上串通一气。20世纪20年代，《时代》可能认识到了它在《备忘录》上的错误，但在大西洋的另外一端，它们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他们有一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充当鼓吹者。

福特的所作所为

《备忘录》1922年的版本包括以下呼应的新引言："我关心《备忘录》的唯一叙述是它们适合于现在正在继续的事情。它们已经16岁了，还是适合今天的形势。"那时，也许读者忽略了这一点，引言总结道："它们适合今天。"那么，谁是如此看法引人注目的作者？汽车大亨亨利·福特（Henry Ford）。

随着人们能买得起汽车，福特开始将《备忘录》引入美国。也许现在福特在反犹思想上的知名度没有在工业方面的成功显著，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那段时期里，他利用其巨大的影响力，在他的《迪尔伯恩独立周刊》（*Dearborn Independent*）上发表一系列谩骂式的反犹作品。虽然（或者因为）他在工业方面非常成功，但是福特喜欢表现出坦言相告的外在形象。他经常被引用的格言，"世界对生活指导的所有需求都能用一本儿童图书的两页即可写完"首次在杂志上发表，就触动了公众的心弦，这个任性无知的说法为他的文章赚得了50万份销量。当《备忘录》于1919年首次引起福特关注的时候，它们与福特的世界观是如此契合，以至于他将其用于一篇又一篇文章的基础，揭露犹太人对美国人生活影响的程度。诸如"美国犹太人如何隐藏其实力"或"犹太人在美国独裁的范围"这样的标题，让读者对福特理解的恐吓程度深信不疑：如今，犹太人掌控世界金融体系的常识性论断，增添了许多证明犹太人参

与工会、媒体、好莱坞甚至棒球（“犹太人赌徒使美国棒球变得腐败”）的令人费解的观点。按照福特的看法，喧哗的20年的支柱——酗酒和爵士乐只不过是犹太人破坏美国生活方式的阴谋：“犹太人的爵士乐成了我们的国乐”。这些文章总共有91篇之多，接近令人厌恶的1000页，均由福特以《国际犹太人：世界的优先问题》的名目出版发行。出版不久后，就在美国销售了50万册，随后被译成了16国语言。德国以最夸耀的方式接受了该书，而福特俨然一个英雄人物，其畅销的自传和等身像就被摆在希特勒办公桌旁边的显要位置上。

福特毫无价值的理论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他的读者群的范围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20年代遍布这个国家的几个偏执的狂潮——恐惧外国人、外国的意识形态、外国的宗教影响着他们，这在某些方面揭示了他们恐惧秘密组织，尤其是恐惧光明会。与内斯塔·韦伯斯特一样，福特认为犹太人不过是光明会的受骗者（光明会传播反犹宣传的目的是分散人们对其真实活动的注意），或者说光明会只是犹太人小集团的掩饰。威廉·盖伊·卡尔（William Guy Carr）毕生都在撰写有关光明会阴谋的著作，例如书名为《游戏棋子与弥漫美国的红雾》（*Pawns in the Game and Red Fog Over America*）的作品，就相信阴谋是如此悠久、对基督教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至于甚至基督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基督揭露并谴责的同样阴谋今天还在继续上演。”亨利·福特将自己限定在美国的历史中，并且认为，就犹太人而言，秘密组织是犹太人转移视线的战术，而不是相反：

> 在美国历史上，人们有两次被发生于他们身上的事件产生的奇怪游戏这个意识所唤醒（18世纪90年代晚期和19世纪20、30年代“反共济会党”成立期间），每次，这些影响力背后的真正力量可以转移人们对共济会的怀疑

> ……书籍在出版，布道在宣讲，新闻在调查，但是没有人看到了犹太人的影响力。

虽然福特没有一一列举他们。但是他对法国“伪共济会”的描述却清晰地指向了光明会：

> 一个法国诞生、被赋予无神论和革命的目的、由犹太人大力资助的伪共济会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但是，公众能够看到的一切只是共济会的外表，而不是犹太人的黑手。（Henry Ford, *The International Jew*, vol II, 186 - 187页）

后来，福特在每个主要的美国报纸上发表文章，撤回来他的观点，声称他没有留意到他自己刊物上的内容。但是，他的声明听上去还是空洞无物：有证据显示，他还在通过在他的工厂中雇用工长来分发活页的形式来继续其反犹宣传，强化“犹太人—共产党”阴谋的观念，旨在摧毁工会的力量。

温诺德的结论

与福特的主张并行发展的是吉拉尔德·B. 温诺德（Gerald B Winrod）的作品，温诺德是堪萨斯州的一位传教士，20世纪30年代，因为支持法西斯主义而声名狼藉（他的恶名甚至到了如此程度，当他作为堪萨斯州的代表竞选联邦参议员时，抗议者发起了“让纳粹主义滚出堪萨斯”的运动）。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组建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基督信仰捍卫者”（Defenders of the Christian Faith），其信条是“回到《圣经》上”（Back to the Bible），其目的是与神学的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斗争。不久之后，他创建了刊物《捍卫者》（*Defender*），这使

温诺德有阵地来吹嘘其挑选的各种攻击目标；在20世纪30年代，他的目标包括罗斯福总统，温诺德认为他是共产主义和犹太主义两大灾祸的替死鬼。温诺德的原教旨主义延伸到了试图将达尔文主义赶出校园的“后斯科普斯审判”（post-Scopes trial）上；他的口号“猴人意味着猴德”（monkey men means monkey morals，Ribuffo，*The Old Christian Right*，90页）有其方法上的特点，即从道德立足点出发来涉及政治问题。《捍卫者》的许多文章都充满一种极为亢奋的道德义愤：不断重复“传染”、“邪恶”、“污秽”和“毒害”这些字眼。他的目标是与他所描述的渐渐渗入美国的“道德消沉”搏斗，而在这场战斗中，《备忘录》正是一个便利的武器。

虽然有某些看法认为温诺德并不相信《备忘录》的真实性，但是他还是乐于利用它来确证其世界观，此举复活了光明会的幽灵，并在故事中有了崭新的排列。温诺德以《备忘录》作为假定的“证据”，在一个沸腾的偏执泥潭中，他不断追逐从光明会到耶稣会、从耶稣会到犹太人的关联性。如果需要这样的证据，即：光明会神话具有永无止境的通融性，并且能够足以变通地合成到新近不切实际的理论中，那么温诺德的解说就可以作为证据而举出。按照温诺德的说法，耶稣会的奠基人罗耀拉（Ignatius Loyola）就是一个犹太人，韦斯豪普特是一个积极的耶稣会员（虽然从历史上看，他绝对不是），他们都在合谋摧毁新教（Protestantism）。

在温诺德反对美国道德堕落的斗争中，光明会阴谋的看法特别有用：在亚当·韦斯豪普特那里，温诺德已经找到了“道德消沉”的化身。韦斯豪普特的革命信条甚至包含了对婚姻贞洁的威胁，而婚姻贞洁正是温诺德极力倡导的拯救美国生活方式尊严的概念。其讳莫如深的宣传册《亚当·韦斯豪普特，一

个人渣》（*Adam Weishaupt*，*a Human Devil*）明确阐释了它的使命，并将现代世界的弊病归结到那位巴伐利亚教授的观念上。在这点上，光明会故事飞向了另一个方向，当温诺德将光明会的观念作为共产主义与犹太主义之间的联系而引入时，这在美国尤其如此。从亚当·韦斯豪普特那里，他可以宣告“光明会的研究将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发端的所有现代观念上显示出来”；比如说，在得出响亮的结论“现代共产主义和古老的犹太启示主义一体、且是一回事”之前，马克思就从韦斯豪普特那里“编纂了他的教义”。

遗憾的是，温诺德不是一个孤独的疯子，他的警报声传到了聋子的耳中：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捍卫者》发行量大约 2 万册；从 3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销量达到 10 万册。如果不完全局限于以下这个群体，也可以说他最庞大的读者群在美国“圣经地带”的贫困农民群体中，也就是那些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新教基本教义派，也许他们从来就没有碰到过犹太人，却将犹太主义与想象的威胁、危险的城市影响和左翼政治家联系起来。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其“红色恐惧”（red scares）的时候，当冷战年代将“共产主义恐怖”带到美国政治前线的时候，这最后一个因素将在光明会神话的下一个阶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关键作用。

第五章
隐秘的赤色分子与光明会

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只是整个阴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共产党活动及其组织的秘密性所表现出来的只是这本打开的书的一部分，里面更是秘密地蕴藏着巨大的邪恶力量。20世纪初的历史强有力地证明了共产主义卷入的阴谋力量的核心，这种力量能指导和控制世界范围的破坏性活动，本质上看，它们具有不可思议的狡猾与残忍；战术上却又高瞻远瞩，耐心持久。

罗伯特·韦尔奇，

《时代真谛》（*Robert Welch*，"*The Truth in Time*"）

罗伯特·韦尔奇的反共论调

1958年12月9日，商人罗伯特·韦尔奇邀请两位他觉得具有"公共精神和热爱祖国"的同僚，来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讨论会。该讨论会在美国心脏地区印第安纳波利斯，即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召开，韦尔奇在讨论会上宣称，他为美国的未来感到担忧。事实上，他差不多做了近两天的演讲。罗伯特·韦尔奇绝非那种魅力十足的演说家，他用一种带着浓重鼻音的语调发布可怖的预兆。演讲时，除非在扶起眼镜或者整理领带的时候，

他的视线极少从那看起来似乎漫无边际的稿子上挪开。他不住地喘着粗气或者大声地清清嗓子，但这些丝毫无碍他所表达的核心观点——美国面临共产党控制的危险。他邀请这些人参加这个会议无非是想组织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十字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被定义为歇斯底里的反共分子，但韦尔奇绝非唯一拉响警报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这一威胁的本质，随着韦尔奇理论的发展，他将亲自找出证据揭露这场阴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重新拾起了二战后期那个被人们所遗忘的传说。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扩大了这个光明会的故事，一直将其带到了冷战时期，并最终把它融入到了对新世界秩序的恐惧之中。

罗伯特·韦尔奇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棉花农场里，他是浸礼会牧师和农场主的后代。然而，韦尔奇并不是一个无知的农场男孩。由于农村地区没有好学校，所以他受过大学教育的双亲，尤其他母亲，亲自在家指导韦尔奇和他的5个兄弟姐妹学习。韦尔奇在这种环境下茁壮成长，12岁就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大学学习，17岁就获得了学士学位，被当地报纸称为“神童”（the boy wonder）。离开家乡后，他参加了美国马里兰州的海军学院，之后又去哈佛大学学习法律。然而，哈佛的这段学习经历并不顺利，至于原因，大家可以尽情去猜测。但韦尔奇本人认为，他之所以离开哈佛是因为他的导师们都是些自由主义者。不管怎样，很难不将他的这些经历和他日后的“东方精英”（Eastern elite）阴谋论相联系，在这个观点中，这些精英和韦尔奇所定义的“内部人”（insider）这一秘密组织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韦尔奇在经历一系列生意上的挫败之后，终于在他兄弟的糖果公司中取得了成功，并一直晋升到该公司的副总裁职位。

在此期间，他的事业延伸到了国内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好几家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一家地方银行，马萨诸塞州的哈佛酿酒公司（Harvard brewing company），以及全国制造业协会（conservativ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他的商业投资活动扩大了他的交往范围，并结识了很多具有理念相似的人，其中包括右倾的企业家和一些对哪怕是一丝社会主义动向都极其敏感的小商业者。韦尔奇对政治的兴趣由此得以增长，他曾两次去英国，亲身感受那里所谓的社会主义政府的统治。他开始在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的圈子里活跃起来。然而，一个企业家在这样一个非常民主的地方却注定要失败。到了 1958 年的时候，在这种过于保守的政治环境中，他的理想趋于破灭，并逐步走向极端，站到了被称为“红色诱饵”（red-baiting）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一边，并两次在公开集会的演讲上声称是麦卡锡的朋友。而他也开始意识到他的共和党同僚们对这一重大现象漠不关心。如果共和党接受美国存在红色阴谋这一想法的话，那只有一种可能，即把它作为一种用以对付民主党的策略手段。另一方面，韦尔奇坚信出现这一情况不仅仅因为腐败，共产党很可能已经渗透到自己的党派中了。所以他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扩大活动范围。

曾经在一段时间内，韦尔奇比其他人更为偏执。冷战初期，美国对共产党威胁的焦虑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反美活动委员会”（House of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的工作以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事件都是美国对共产党恐惧的标志以及应对工具。“反美活动委员会”创建于 1945 年，用于调查反美活动，是早期特别委员会的成果之一，即 1938 年建立的一个临时委员会，用意是调查反美活动的范围、性质和目标。然而，一开始，委员会主要是为了调查支持纳粹的活动，直到 1940

年，共产党活动才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二战结束后，共产党活动进一步被关注，1947 年，“反美活动委员会”调查所谓的共产党渗入好莱坞的案件使其成为反共的中心，好莱坞是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中心，这一案件也被称为“好莱坞 10”案件。“好莱坞 10”由 10 位作家和导演组成，其中包括林·拉德纳（Ring Landner）、勒斯特·科尔（Lester Cole）和塞缪尔·奥尼兹（Samuel Ornitz）。这 10 人在法庭上被指证加入破坏性组织，又因他们拒绝提供证据而被判蔑视国会罪而入狱一年。待到他们出狱之后，皆上了好莱坞电影业的黑名单，所以他们不得不去其他地方谋生——纽约、墨西哥或者欧洲。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黑名单的威力和惩罚力是相当大的。之后，“反美委员会”又返回好莱坞，彻底清除所谓的破坏活动，上百个人上了黑名单，其他人则“改名”才得以保全自己的工作。正是这种恐惧与怀疑的氛围才使得韦尔奇的事业繁荣起来。

韦尔奇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自 50 年代以来，他在多份右翼小册子中阐述了其政治观点，包括 1952 年《愿上帝原谅我们》（*May God Forgive Us*）这本书，书中他断言民主党的杜鲁门政府（1949 年第二次竞选期间）故意使政府的政策“迎合共产党”。他把 1951 年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争议作为他的证据。这场争论，即当时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公开指责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不动用核武器；而杜鲁门则以麦克阿瑟不服从命令为由将其解职，在韦尔奇看来，这件事情就是总统同情共产党的表现。1956 年，韦尔奇编纂了一个发行量较小的右翼杂志，名为《一个人的观点》（*One Man's Opinion*），两年后更名为《美国观点》（*American opinion*）。但是，他最具争议的著作则是一份私人文件，自定义为“信”，最初只是在朋友和志同道合的熟人之间流传。这个文件就是《政治家》（*The*

Politician，也是著名的《黑皮书》，*Black Book*），该书以 6000 字的篇幅，无限制地讨论了共产党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程度，且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了高层。“共产党主导的杜鲁门政府”，根据韦尔奇的观点，“杜鲁门被共产党消极地利用着，而杜鲁门则将自己的学识和默许作为代价让共产党确保他成为总统。”然而关于现在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 年竞选上台），韦尔奇则更为直接，“我坚信，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共产党阴谋的代理人，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同时收集到的大量详细的资料更加坚定了我的这种想法。用一个词来形容艾森豪威尔的目标和行动，那就是‘叛国’（treason）”。这个评论对于无可指责且深受大家喜欢的盟军高级指挥官艾帅显得过火了。当这本书在 1961 年肯尼迪取代艾森豪威尔成为总统之后出版的时候，即 1963 年，里面关于艾森豪威尔的说法修正为“自成人以来就有意地为共产党服务”（引自 Lipset，Raab The Politics of Unreason）。

韦尔奇为了把这一潜在危险告诫他的同胞，遂于 1958 年组建了后来被人所熟知的“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首先他邀请 11 位“具有公共精神和热爱祖国”的人士参加他举办的研讨会，两天后，他计算出共产党渗入美国的程度，并提出予以回击的方法。这场研讨会的记录就是后来的《蓝皮书》，协会的会员们以读《圣经》的热情阅读协会创立者的这一语录。同时韦尔奇采用了福音书的修辞方法，描述了美国同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人类的灵魂与躯体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自由与奴役之间，在基督精神与反基督精神之间的战争。”

首先是研讨会，然后又是蓝皮书，韦尔奇通过这些告诫读者应该“看得分情况”（look at the score）。（保住比分就成了

“约翰·伯奇协会”的例行公事之一。同时韦尔奇出版了年度“得分卡”，用于分析世界不同国家共产党存在的情况。在越战的紧张时期，韦尔奇将美国共产党的渗入定位在60%～80%之间，认为这场战争是美国政府为了让共产党永存不朽而使用的策略。)《蓝皮书》的“得分”记录了目前共产党依靠列宁计划夺取世界政权的情况，并引用列宁对未来情形的描述：首先我们将拿下欧洲；其次是亚洲大部分地区，然后我们再拿下最后一块堡垒——美利坚合众国。我们并不需要攻下它，因为它就像瓮中之鳖一样，擒其易如反掌。”（蓝皮书，2页）。世界将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手中。另外，韦尔奇警告说“……共产党在未来两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如果战略明智的话，将通过电话攻下欧洲”（蓝皮书，10页）。危险在于共产党的狡猾与隐蔽，“对于普通的美国人而言，最难的就是共产党的行动和外表看起来就和正常人一样，或者即使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恰巧知道了共产党，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共产党。”（蓝皮书，92页）。韦尔奇的战略是“组建堡垒——大的堡垒、小的堡垒、永久性的堡垒、各种各样的堡垒”用以教育美国人，将共产党彻底清除。

为了建立他的协会，韦尔奇小心翼翼地挑选着第一批会员。全国工业制造协会会员以及共和党党员的身份扩大了他在商界以及政界的交往范围——使得他的客人远远地超越了偏见与狭隘——相反，很多人都不质疑韦尔奇言论的真实性。这些人中有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大学的教授，麦克阿瑟前私人助理，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负责国内税收的首席行政长官。

尽管韦尔奇的客人们赞同他反共的思想，但他们对共产党已成为全球性威胁却备感吃惊。韦尔奇让他们相信这个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他描述道，一场悄悄拿下欧洲的行动正在进行，

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被共产党占领。共产党的祸害正威胁着世界："除非现在我们拥有一支坚不可摧的军队，否则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几年内将被共产党主导的克里姆林宫分成4个独立的部分。这4个地区和统治辖区的地图都已经做好了。"（蓝皮书，9页）。

韦尔奇的言论刺激了大众的神经，而他自己也为如何进一步在美国宣传自己的理论绞尽脑汁。他在美国其他28个不同的地方继续召开这种研讨会。仅仅两年的时间，到1960年，"约翰·伯奇协会"就已经发展了18000个会员，在34个州拥有分会。到1965年，协会发展到了顶点，估计拥有80,000到100,000名会员。他所谓的右翼哲学——"我们短期的目标、我们长期的目标及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促进更少的管理，更多的职责以及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蓝皮书，39页）——显然吸引了很多保守的美国人。

但是，约翰·伯奇何许人也？协会成立4年之前，韦尔奇写了一本关于浸礼会牧师约翰·伯奇的传记。这个人为韦尔奇提供了冷战后象征美国政府的一个符号。伯奇是佐治亚州一个农民的儿子，在1940年的时候曾到中国传教。当1941年美日战争爆发之后，伯奇成了一名上尉，在战争结束10天之后、局势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伯奇却被谋杀了。他在死后获得了一枚勇敢者奖牌。韦尔奇认为伯奇是在美国政府默许的情况下被蓄意谋杀的，且美国政府一直对伯奇的家属隐瞒了事实的真相。对韦尔奇而言，伯奇具有理想中的美国人形象：一个向善的基督徒，诚实的乡村农民，为了国家而献身。韦尔奇认为在这中间看到"一个美国男孩的故事，经受着他这个年龄的痛苦"（引自Broyles，*The John Birch Society*，16页）。很难知道约翰·伯奇是否愿意和极右扯上关系。根据韦尔奇的《蓝皮书》，"约

翰·伯奇协会”的会员被鼓励阅读伯奇传记，并熟悉他所代表的那种价值。但是协会背后形象的真正体现者并不是约翰·伯奇，而是韦尔奇，这是每个人所熟知的。同时，韦尔奇在很多方面都是美国红色恐怖的带头人之一。

柯林的广播布道

韦尔奇深陷美国全民对共产党恐惧的传统之中。20 世纪，在韦尔奇登上这个舞台之前，美国已经经历了几次“红色恐怖”。一战之后的一次，即在 1919 年到 1921 年的时候，大家就担心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全球性的革命并会波及美国，最近的一次就是 1947 年至 1955 年之间，麦卡锡参议员不顾一切的行动使得这个世纪似乎都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但是在麦卡锡个人十字军战争之前，就已经有人在积极行动了：1930 年，一个来自密歇根的广播就激起了反共的另一场大众潮流，这个广播约有 3000 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这个广播者是一个天主教徒柯林神父，他的个人使命就是清除在美国的共产党，不管他们如何伪装自已。

1926 年，柯林被任命为底特律的一个工薪阶层地区的主教。这是个生活贫困区，和提倡种族暴力以及反犹的三 K 党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少有天主教家庭居住那里，否则他们很有可能成为三 K 党袭击的目标。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柯林开始在周末的电台节目中播报他的训诫，这档节目叫做“小花的黄金时间”（The Golden Hour of the Little Flower）是从他教堂的名字“小花的圣地”（the Shrine of the Little Flower）演变过来的。1926 年，广播还是一个新玩意，而柯林似乎天生适合在广播中讲演。一年内，他的广播一个海岸接一个海岸地转播，期间收

到了众多听众的来信（一个星期4000封左右），以至于不得不雇用一个全职秘书。一位同辈这样形容他“无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声音”，拥有迷人的音质以及“令人信赖的声音”。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成群的人收听他的节目，到1929年他的听众多到数以百万计。那年，华尔街崩溃，柯林必须把他的听众从这个苦难中拯救出来。他用自己那具有魅力且流畅好听的声音，暂时把那些在大萧条中失业的以及堕入贫困的人们从苦难中解脱出一个小时来。他对普通人说的话题，包括探讨美国反天主教偏见以及其他社会公正的起源。大萧条时期，自大萧条对这个国家的经济有了严重的影响之后，（从1930到1933年失业人员增加了3倍，在最萧条的时候，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失业），他的说教就更带有政治性了，同时他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柯林轻蔑地评价赫伯特·胡佛为“富人们的圣灵，华尔街的保护天使”之后，有8万观众写信给他。即便在他的广播节目开始和主流不一致，并且很有可能被抛弃的时候，他仍然秉持那种自由演讲的风格，结果依然有很多听众来信支持他。慑于主流的力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终于把他的节目取消了。但此时的柯林却显得如此成功，他建立起了自己的网络。

柯林的成功归因于普通听众的拥护，即那些反对大企业、东海岸的精英以及华尔街大亨的人们。他的听众大多是信仰天主教的工薪阶层，这些人的宗教和种族都让他们不可能成为被迫害的目标。另一方面，柯林的成功在于其给他的听众制造了发泄不满情绪的靶子，比如“华尔街的律师”、“哈佛和耶鲁的教授”或者“在苏格兰购置房产的银行家”。不幸的是，他没有控制好对东部精英的愤怒（直白地说，由于他们不接受批评），而很快地进入到了意识形态层次的怀疑。他开始不断批评

左翼思想，并坚信有一个全球性的犹太—共产党阴谋。

柯林的广播在1932年的时候毫无保留地支持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某种程度上，他相信他的广播节目对罗斯福击败胡佛并成功赢得总统选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柯林对罗斯福的迷恋在罗斯福执政后的几个月里面持续增长，他还写了数不清的信给罗斯福提建议，甚至在广播中口述信件让他的听众传达他的意见。然而他的热情并没有得到回应，当他发现罗斯福并没有让他担当任何政府要职，同时也没有对他的行为表示感谢的时候，柯林的广播事实上失败了。他的批评和表扬一样露骨，通过电波传向了各地，“今天我非常遗憾地站在美国人民面前，承认我犯了个错误。尽管曾经提出过……这个标语‘罗斯福或毁灭’，但是现在则应该改成‘罗斯福和毁灭’”。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柯林的广播变得更为刻薄。他开始指责总统（“富兰克林·双十·罗斯福”）在新法案中欺骗了美国人民，这个法案是为了减少大萧条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柯林此时的言论无非是把他和共产党扯上关系：“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投票，但如果我们为罗斯福先生投票……就意味着为共产党人投票”。当他要求自己的听众支持自己反对总统的战役失败之后，他的立场变得更右了。虽然他以前可以看作是普通人的支持者，但是他现在的语言却更像法西斯，更激烈地反对共产党以及犹太人。《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这本杂志，是他在1930年创立的。1938年改名为《犹太长老议定书》（*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善于挑战的柯林声称这个文件是真实反映的世界事件。

在柯林的广播还没有公然地转向疯狂之前，就已经有迹象表明他开始策划全球的阴谋论了。在光明会神话还没有出炉前，他仍然相信共产党是亚当·韦斯豪普特创造出来的，正因为韦

斯豪普特“反教权”的性质才导致了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柯林在 1931 年写道：

> 什么是共产党？卡尔·马克思正是从其创立者亚当·韦斯豪普特那里获得启示，把共产党定义为无神论……这也继承了他老师的衣钵，卡尔·马克思强调“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也是俄国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的原因。
>
> （利普塞特，by the sweat of thy brow。1931，181 页）

然而，柯林并不是第一个看到亚当·韦斯豪普特是共产党传播的幕后黑手的人。光明会在内斯塔·韦伯斯特那无所不包的阴谋论中的定义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是每一次世界事件、动荡或者意识形态背后的策划者，所以事实上，内斯塔·韦伯斯特也把韦斯豪普特看成共产党背后主要的推动者：

> ……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韦斯豪普特的观点——消除贫困、继承权、婚姻以及各种道德，消灭爱国主义以及所有宗教。这不是明摆着这个计划已经被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光明会的传统，秘密且成功地继承下来了么？
>
> （韦伯斯特，World Revolution，188 页）

柯林从来没有走的这么远，指名道姓地指控光明会策划阴谋活动，但是他详细阐释了他相信共济会阴谋的存在，在 1936 年的广播中，他说：“一场阴谋正在国际共济会的支持下悄悄开展”，认为“美国人民以及天主教的敌人”是“共济会、高融资以及共产党”。怀疑这三者是 20 世纪极右人士的共同思路：无论光明会是否直接被点名，里面都暗含了阴谋的本质。从柯林所说的韦斯豪普特和共济会，到麦卡锡关于共产党渗透到美国政府的图景，最后在罗伯特·韦尔奇那里达到了顶点。韦尔

奇用创造的新词“内部人”（insiders）来形容光明会的罪行，所以光明会的神话在20世纪依然存在着，或者说是直接被复制到了20世纪。

柯林持续增长的极端主义立场引起了教会的恐惧，他们尽量和柯林保持距离并强调正统宗教和柯林个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尽管这个时候很多原来的听众抛弃了柯林，但仍然存在一小部分仇视外国的听众，相信柯林的观点是经过教会批准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时候，柯林的大主教极力争取让他禁言，到1940年，他最终取得成功，柯林的节目被取消了。两年后，柯林在自己的杂志《社会正义》上发表的极端言论被发现违反了1942年国家间谍法案，随后他的杂志也被查封。柯林，长期以来和所谓反美活动作斗争的人，最后竟神奇逆转，以相同的罪行被起诉。他以退休的方式做出退让并隐匿起来，但是其战争遗产依然存在。当约瑟夫·麦卡锡议员在20世纪50年代点燃了第二轮红色恐怖的时候，他采用了和柯林相似的人口统计方法。

新格局，新问题

二战期间，美国的盟友和苏联共同反对轴心国，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苏联进攻美国的恐惧，但是随着战后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出现，这种旧有的怀疑又卷土重来了。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就提出欧洲整个大陆以意识形态为标准，被落下的“铁幕”所区分。在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的时候，共产党成功传播到东欧，以前的那种恐惧又重新被点燃，诡计、渗透和进攻这些语言再一次进入到政治词汇中。在这样的环境下，光明会神话很容易被控制和繁荣起来。有一次，国家的中心机

构——教堂、学校和政府——据说将受到身份不明的敌人的袭击，由于这群敌人和普通美国人很像，（通常情况下就是普通美国人），所以要发现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五纵队”，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马丁·戴尔斯，也是1938年调查反美活动的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后来的反美活动委员会）警告道，“并非总是穿着外国军队的制服，或者操着外国口音交谈。他们可能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这种伞兵已经在联邦政府着陆了。他们在等待‘进攻时刻’的到来，即等着斯大林给他们发出进攻的命令”。

“这种伞兵”的想法很快地在国内生根发芽，也为急于从民主党手中夺取政权的共和党人提供了方便。共和党人拾起阴谋论的主线，指责民主党通过新法案进行社会改革的方式，把国家一步一步地引向共产主义方向。1946年，在杜鲁门任期内的第一次选举时，共和党领导人在国会中发出警告，认为投票者的选择是荒唐的，“人们将在混乱、迷茫、破产、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以及维护美国的明天之间投票”。这种恐怖手段明显发挥了作用：从1928年以来，共和党人在国会以及参议院中第一次拥有多数（尽管这将在1948年杜鲁门再次竞选那年重新回归到民主党多数）。

阴谋论作为一种政治战略取得成功之后，共和党则继续进一步强调苏联共产党和美国自由主义之间的关联。仅1947年，一年里就有22件调查在美国的共产党渗入事件，从政府机构到电影行业。这年里，一个名为罗纳德·里根的演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被认为按照“共产党的计划……控制了动画产业”。整个政治语言中充满了恐惧、渗透、秘密和狡诈这样的词汇，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后来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在1948年警告说：“我们花费上亿美元去阻止国外共产党

阴谋的时候，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阴谋，要攫取我们自由的事业并毁坏这些事业。”

指责阴谋现在成为了一种快捷和普遍使用的政治武器，在这种怀疑氛围下所滋生出来的只能是政治不信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威斯康星州的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才能够发挥他的政治影响。

1950年的2月9号，在西弗吉尼亚州召开的一次妇女共和党俱乐部会议上，麦卡锡的黎明真正到来了。正是在那里，麦卡锡发表了他那臭名昭著的演讲，警告整个国家，美国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共产党：

> 虽然现在我不能将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员以及间谍的名字都说出来，但是我手中有一份205人的名单，虽然国务卿知道名单上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却至今还在草拟和制定着国务院的政策。

麦卡锡通过这份“205人的名单”再一次地唤起了往事。这份相同的指控名单让人们不由想起了几个世纪前的摩西（Jedidiah Morse）的光明会名单一事。其实麦卡锡没有这份名单也没有关系，他也能够发现目标（在这点上他得到了理查德·尼克松的帮助）。从现在开始他的目标就是嗅出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并把他们清除出去。他没有使用修辞方法，也没有掌握好辩论方法，粗鲁且好斗地准备抓住他的每个政策，就像抓住它们的脖子使劲摇晃它们，直到其牙齿格格作响为止，正如他在1951年演讲中所提到的：

> 我们怎么才能为我们现在的情况负责呢？除非我们相信政府最高领导要把我们引向灾难。……这肯定是一场巨大阴谋的产物，这场阴谋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人类历史上任

何一次经历都相形见绌。它一旦被揭露后，它的黑暗，它的原则将被所有诚实的人诅咒。

和所有阴谋论家一样，麦卡锡能把复杂的情势提炼成一个简单的论点，再通过几把大刷子就可以抚平世界阴谋的紧张气氛，剔除其对美国破坏的威胁，同时还提供一种非常简单的解决方案。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能上报纸的样板，即用口号的方式演讲很容易上头版。直到现在，他政治生涯的特色就是将自己与参议员的其他同僚们分离开来。现在他在参议员中有自己的耳目，即新闻媒体和总统。为了调查这些所谓的威胁，他特地组成了一个参议会特别委员会。尽管麦卡锡的十字军确信美国政府中有共产党，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取得成功（他自己就没有证明出一个），他激烈的指控毁掉了不少人的事业，却没有人对他的证据提出疑问。随着麦卡锡十字军的推进，他的反对者在威胁中投降，害怕他们的异议会被看作不忠诚，因为那些持异议者，如果没有公开指责那些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克里姆林宫的傀儡”。

麦卡锡在后来的4年中成了美国政界的风云人物。他的战略手腕令他成为调查小组的永久负责人，并赋予他调查政府各层人员的权力，这也使得指证共产党的活动渗透到了政府和军队的最高层。在这些指证中，包括1951年助理国务卿威廉姆·本顿和1953年国防部的罗伯特·斯蒂文斯。麦卡锡阵营的很多信息来自联邦调查局，他们的头头当时是埃德加·胡佛，他认为这场共产党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控制美国。用他的话来说：“现在，一些新的东西正在美国扎根，即共产党思想通过有系统的，故意的和有预谋的行动破坏西方文明并将历史带回到野蛮和独裁的时代。”这点美国人民是同意的：50年代早期的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都相信苏联的目标是统治整个世界。

麦卡锡既是一个天主教徒又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中部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比柯林更像柯林，他也强调美国心脏地区的人们和美国东部精英之间的道德差异。当他形容那些共产党同情者是“生下来就与富贵同在”的时候，事实上是暗指东海岸的精英，并将自由的东部和保守的中西部对立起来。当好莱坞在50年代拍了大量的反共电影，例如《檀岛歼谍记》，主演正是约翰·韦恩，这是一部关于东部精英和苏联共产党相互勾结的故事的电影，一边是血性的美国价值，一边是共产党通过“乡村俱乐部”（country club ways）垂死挣扎。由于东部精英拥有高学历，掌握了经济和商业的命脉，拥有特权，所以对他们的怀疑很容易就和冷战后共产党的阴谋连接在了一起，同时也就成了罗伯特·韦尔奇理论中“内部人”以及惯用伎俩（modus operandi）的直接素材。

到了1954年的时候，麦卡锡的信任度急剧下降，而红色恐怖亦开始衰弱。这一重大的衰落始于著名的麦卡锡军队听证会事件，他的助手如果弄不到优先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以调查共产党为借口而被指控危害军队罪。麦卡锡的听证会进行了全国广播，这就允许美国公民通过电波感受到他那有价值的、歇斯底里的、诘难的风格。其实年底的时候，麦卡锡就已经被参议院官方批评了，虽然他直到死的时候一直都在参议院，但并不具任何政治影响力。同时，二战的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向美国人民承诺反对共产党还介绍了方法，并保证即使美国正面临共产党的威胁，美国政府中也不会有共产党存在。1954年年底时，只有4%的美国人相信国家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共产党在政府中的渗透。

麦卡锡的影响可能将持续下去，尤其在对待政治反对意见

的时候。共产党不再是简单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更是美国自由的另外一端，在这种影响下建立了一个非黑即白的极端世界观：美国民主和苏联独裁的对立，基督论和无神论的对立，以及透明与秘密的对立，最终所有的都可以浓缩成好与坏的对立。很可能这种世界观鼓舞了约翰·韦尔奇，并使得“约翰·伯奇协会”得以最终建立。罗伯特·韦尔奇的不同之处在于他通过中和各种光明会的理论，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观点。

“约翰·伯奇协会”

虽然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在 1958 年的时候就完全结束了，但美国的反共情绪依然很高涨。接下来几年发生的事件——1961 年柏林墙的建立，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成功上天以及猪湾登陆的失败，接着第二年古巴导弹危机——给社会发出了紧张的讯号，同时罗伯特·韦尔奇关于反对共产党战争的提议也传遍了整个美国。他的反共战役阵地主要就是教育美国人民。同时协会的会员们被要求阅读一份目录，这份目录是由 100 个标题组成的（被称为“通向真理的 100 步”），同时还要求阅读月刊以及时事周刊。他们的战斗方式就是写信给国会议员或其他政府官员表达他们的观点，还有就是开书店和听有关反共的讲座。

罗伯特·韦尔奇和约瑟夫·麦卡锡以及以前的柯林神父一样，号召的对象是那些经常上教堂的、爱国的小商业者，这些人远离东海岸精英的世界，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无知，很多“约翰·伯奇协会”的会员都是有钱人，且受过良好的教育，虽然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不能接受韦尔奇关于艾森豪威是共产党傀儡的言论，但是韦尔奇的前提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响应。

韦尔奇把共产党和东部精英们等同起来，这就为他的会员提供了一个可见的敌人，他们可能没有亲自遇到过一个共产党，但是自由的东海岸，世人所共知的特权中心、学术中心、拥有金融和商业的机构以及其他权利。正如韦尔奇在《新美国主义》（*The New Americanism*）中所说的，共产党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烟幕弹和圈套：

> 共产党刚开始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代表，支持被压制的穷苦的人们反对那些剥削自己的力量，这个是最大的世纪谎言。共产党自己被那些有钱人、高教育者以及政治力量利用来折磨大众。

同时，韦尔奇非常清楚这些有钱人、受教育者和政治人物在那里：

> 你看看今天美国的共产党们，你不会在颓废的披头士中找到共产党的影子，因为他们不会为了这些琐碎的无意义的事情而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主要以伪装宣传的方法来生存。但是共产党阴谋的力量却在我们国家社会、经济、教育和政治的顶层……我能在美国共产党圈子里轻易帮你找出一大堆操着哈佛口音的人。

这并不是全部：韦尔奇为了反对精英的力量，号召他的会员们警惕那些权力过大的政府。从“约翰·伯奇协会”创建第一天以来，韦尔奇就强调：“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且永远是政府，同时越大的、越有权力的政府就是越大的敌人。（蓝皮书，108 页）”。后来他补充道：“所有的政府都是不诚实的，事实上很少有特例。”对“约翰·伯奇协会”的人而言，资本主义是美国民主的根基，所以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国家进行贸易将从本质上威胁到美国人。1966 年的一份“伯奇文件”强调自力更生

和地方自治的重要性：“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地方自治的历史，只有当地方自治政府被摧毁的时候才有可能实行专制。”

罗伯特·韦尔奇并不是右翼分子中唯一怀疑“大政府”动机的人，但他引人注目的地方却是提出了一个历史发展模式，同时也是第一个得出结论，即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在一系列复杂的背景下产生，而是被人精心策划的。随着韦尔奇无所不包的阴谋论的完善，他越来越相信共产党的传播并不是“自然”的：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威胁，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传播，在韦尔奇看来，是一步一步计划好的，现在比以往更接近美国政府。

艾森豪威尔“破坏”了麦卡锡的事业，很明显他肯定是共产党的傀儡。“共产党为了把麦卡锡除掉不惜采取这么极端的方法”，主要在于他极力想揭露事情的真相。如果这种不法行为需要进一步证明的话，那么“约翰·伯奇协会”在1959年的快讯就提供了这种证明，里面关于麦卡锡48岁的死亡，声称：“我们……知道在现任（艾森豪威尔）共产党主导的政府下，（麦卡锡死亡事件）不可能得到充分调查。”

在60年代早期的时候，韦尔奇把自己的理论和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进一步结合起来，以此作为“大政府”权力过大的证据。外交关系委员会建立于一战结束之后，目的是研究外交政策以防止再发生一次“结束战争的战争”。支持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人，则看到了组织的国际主义动机是致力于世界和平，然而批评者，其中约翰·伯奇协会的声音正越来越高，却看到了该组织的目标无非就是想成立一个世界政府。韦尔奇坚信他的怀疑是基于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成分都是精英：成员被很好地很恰当地安排在了政府、世界经济、法律和媒体里面。从

1945 年开始，所有的总统都会从外交关系委员会中选拔很多人参与到他们的政府，包括尼克松和卡特。同样，1945 年成立的联合国，目的也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也受到了怀疑，联合国关于世界和平的事项有着阴险的动机，就像韦尔奇在“时代真理”中解释的：

> 另外一个具有相似运作原理的就是联合国。这个组织由共产党构想，由共产党建立，同样也是为共产党所掌控，正逐步地——更加厚颜无耻地——实现共产党的目标。然而它通过宣传和伪装，让美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人相信，联合国是一种维持和平并阻止共产党入侵的组织。

到了 60 年代中期以后，韦尔奇阴谋论已经无所不包且很有可能失去控制，大企业、政府官员、学者、东海岸自由人士以及所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都被包含在了他的阴谋论中。在理论失信之前，韦尔奇需要一条主线将理论串联起来。大约 1964 年左右（肯尼迪遇刺后的第二年），巴鲁尔和约翰·罗比森的著作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对韦尔奇而言，罗比森关于法国大革命原因的阐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把这个增加到了韦伯斯特的理论中，并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更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是由光明会发起的。

1964 年“约翰·伯奇协会”在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中支持共和党的巴瑞·戈登沃特（Barry Goldenwater），反对林登·B. 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这时候“约翰·伯奇协会”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但是这场竞选失败后所带来的就是该协会的痛苦与失望，这也成了协会致命的失败，结果是“约翰·伯奇协会”似乎不可避免地只能参与在野党的政治活动了，但是另一方面也促使韦尔奇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韦尔奇决定以极端保守的方法对他的敌人予以回击。他觉得怀疑对

象不能再局限于简单的共产党，而必须扩大范围。（当戈登沃特剩余的核心支持者组成‘新右翼’组织的时候，即共和党极端保守主义的组织，韦尔奇的阴谋理论在正统基督教的伪装下再现了。）

韦尔奇在1966年《时代真谛》一文中写道，那些“阴谋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目标“经常是，且仍然是，帮助他们残酷的独裁政府统治整个人类世界”。他还试图揭露阴谋中心已经到达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地步，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努力是白费的：

> 我们只有通过每卷一千页纸的一百卷书，才能让历史的大阴谋曝光。同时我们希望这些进程能被适当地书写，这样就可以指导和提醒下一代。但目前我们有很多即时和要紧的任务去完成，所以我们只能就这群黑恶势力从其开始到现在的进展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描述。

继罗比森、韦伯斯特等人清晰地揭露了光明会的成员之后，韦尔奇揭示了这一组织的丑恶性质以及深藏在其后的东西：

> 我们必须在黑暗中前进一大步，而不是保持历史的延续性，因为这个阴谋的根扎得很深。两百年前或者18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存在着很多秘密社会，他们不切实际地要推翻所有人类的现存机构，然后从这种混乱中涌现出一个充满力量的统治者，并建立一个新的文明秩序。在这些秘密社会中，1776年5月由亚当・韦斯豪普特在巴伐利亚创立的光明会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然后他列举了光明会的一些罪行：诱发法国大革命，创建共产党，推翻政府以及摧毁宗教：

> 1789年，光明会的势力非常强大，计划并促成了一系

> 列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大屠杀。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共产党战略和意图的东西，这些在今天我们依然非常熟悉。首先就是无情地削弱统治者以及政府的统治，进而推翻他们。然后就是摧毁所有宗教，并用理性崇拜（worship of “reason”）取而代之。

韦尔奇或许意识到他的伯奇同僚们要找到亚当·韦斯豪普特的直系后代，并证明他们在国会山外围政治中发挥作用，这点很难被大家所接受，所以他创造了“内部人”这个术语并以此来描述这些身份不明但极具影响力的人：

> 这些全能的幕后指挥者是韦斯豪普特光明会的残余还是那些秘密社团的精华呢，这些我们都无从得知。他们中的一部分永远不会是共产党，而另一部分却是。为了排除这样的困扰，那就让我们称这些统治小集团为内部人吧。

从这点可以看出，光明会的阴谋其实就是伯奇协会的官方理论，而它的影响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使得很多伯奇协会会员分离出去，主要是那些虽然担心美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危险，但不能接受韦尔奇关于全球的、上百世纪的欧洲阴谋的观点。另一方面，它成就了一个不断壮大的阴谋产业，同时介绍且扩大了政府和世界事件与光明会/内部人之间的关联。在20世纪晚期的时候，光明会的神话变得巨大且无所不包，对人们而言就是一切事物，这也就为“约翰·伯奇协会”制造了可乘的机会。

1967年，举个例子，“约翰·伯奇协会”扮演了销售商和出版商的角色，重新翻印了约翰·罗比森的《阴谋的证据》（*John Robison's Proofs of a Conspiracy*）一书。为了让新一代的人注意到这本书，匿名的伯奇人所写的引言将过去和现在非常牵

强地扯在了一起，甚至试图给阴暗的内部人一个具体的定义。在树立起一个更容易的目标的同时，引言中提到了在更大阴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

> 阴谋的构想、组织和行动都是由教授和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些教授和知识分子中大部分是睿智和狡猾的，他们决定把自己的智慧用于邪恶之中……很明显，这场阴谋依靠这些自负而浅薄的知识分子吸引教育家、作家、哲学家、出版社以及牧师的参与。同时他们的那些统治今天美国的同伴们……拥有同样的自负和同样的自傲，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文明中都以极端的光明和极端的残酷为特征。……通常教授、哲学家和作家都是待在他们的象牙塔里，这反而对世界一点害处都没有。罗比森和历史告诉我们另一面……总统周围的教授和学者……他们都记着韦斯豪普特的计划，用他的世界秩序去控制那些统治者。

引言继续写道，今天的光明会，即“知识分子的阴谋”代表了“非常聪明且邪恶的思想”，这些在以下的机构中经常发生：“被大量资助的大学，免税的基金会，大众传媒系统，如国务院这样的政府机构，以及大量类似对外关系委员会这样的私人组织。”

“内部人”

至此，尽管光明会可能为内部人士这个概念提供了模板，但内部人士的这个概念仍然过于宽泛，以至于列出那些没有参与阴谋的人士反而更容易。勒比洛·奥利弗（Revilo Oliver），“约翰·伯奇协会”杂志《美国观点》20 世纪 60 年代的副主编，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他将阴谋会/内部人和每个人联系

起来，同时也将这个阴谋和（真正的精英式的和秘密的）"彼尔德堡俱乐部"（Bilderberg Group）[1] 联系起来的第一个伯奇人。1964年3月，奥利弗在《美国观点》上撰文说道：

> 自从外部（马克思主义）有阴谋以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应该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很多真诚的且有思想的作家早已经确定了内部阴谋是由以下团体组成的……光明会、恶魔崇拜者（Satanists）、"彼尔德堡俱乐部成员"、犹太复国主义者、法利赛教徒（Pharisee）[2]、可萨人（Khazars）[3]、费边社会主义者（Febian Socialists）、国际银行家、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s）、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或者其他身份不明的"救世主式的唯物主义者"（messianic materialists）。

奥利弗同时也是"约翰·伯奇协会"中极力反犹的会员之一，他在1966年6月份一次集会中声称"如果有奇迹能使所有的布尔什维克、所有的光明会成员或者所有的犹太人在明天黎明来临之前从世界上蒸发的话，那我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他同时也是第一批阴谋理论家声称肯尼迪谋杀案是国际共产党的阴谋。）

虽然"约翰·伯奇协会"对反犹主义的指责非常敏感，但是协会对加里·艾伦（Gary Allen）1971年《无畏于阴谋》

---

① 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头和著名学者所组成，1954年成立。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

② 古代犹太法利赛教派的教徒（该派标榜墨守传统礼仪，《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③ 可萨人是一个位于中国北部和黑海之间的草原游牧部落。公元7世纪至10世纪，这只突厥化的可萨部族东连花剌子模（Khwarazm），西邻拜占庭帝国，向北征服了斯拉夫部落，向南扩展到高加索地区，建立了强大的可萨汗国，当时位于伏尔加河口的首都伊铁尔成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中转站。可萨人信奉犹太教。

（*None Dare Call it Conspiracy*）这本书的认可，暗示了“约翰·伯奇协会”应谨慎的考虑反犹主义的程度。除了一般的“约翰·伯奇协会”的阴谋论之外，这本书还讨论了（犹太人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国际银行家在更大范围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艾伦的书声称“反犹主义在试图描绘例如犹太人等的整个阴谋时却反而被利用了”，同时“它……无端地和邪恶地指责所有犹太人应该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罪恶负责”。然而，事实上他的图标绘制了一个“超政府”（supra-government），这里面包括了在其他组织、国际银行机构和大多数公司中的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神话不断更新的变量。

在其他方面，艾伦拿起了“约翰·伯奇协会”的接力棒，对协会的理论一个又一个地重复着，使用阴谋论家的相同技巧，堆积资料并对所谓的“事实”提出质疑，艾伦声称有证据证明《共产党宣言》的起源：

> 卡尔·马克思所做的都是更新和整理 70 年前由亚当·韦斯豪普特——巴伐利亚光明会的创建者——所制定的革命计划。同时，“正义人之团”（League of the Just Men，声称雇佣马克思写了《共产党宣言》）就是光明会的一个分支，在 1978 年巴伐利亚的政府领导的一次搜捕行动中暴露身份，从此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这已经成为一些这方面专家的共识了。（艾伦，25 - 26 页）

在别的地方，韦斯豪普特被斥责是“创建了光明会的恶魔”，他的“任务……如此可怕，无疑是要建立恐怖统治”。艾伦认为今天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内、美国精英中［“当内部人在新港（美国罗得岛）的避暑山庄里为他们的客人提供香槟和鱼子酱的时候，……他们的代理人正公开奴役并谋杀人民。而你很可能就是他们名单中的下一个对象”］以及在隐秘地拥有超

级精英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内，阴谋会正“积极地朝着最终在全世界建立世界政府的目标而工作着——这个目标就是创建一个由他们内部人及其同盟所掌控的世界”。如果“约翰·伯奇协会”赞赏艾伦的话，那么这种感觉就是的了。这时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果指出“约翰·伯奇协会”的错误，那么艾伦就会疑惑：

> “约翰·伯奇协会”是这个领域（即揭露内部人的阴谋）的领导者，在揭露阴谋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一直做得非常好。他们的工作是解构政治权力以及揭露内部人，这难免会受到大众媒体的诽谤，然而对外关系委员会一直着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并促进权力集中，这点却从来没有受到过非议，难道不奇怪么？

不仅“约翰·伯奇协会”的支持者中有人觉得令人讨厌的阴谋理论是有罪的，甚至“约翰·伯奇协会”自身也已经误入到危险的种族主义领域中了。在好几个“约翰·伯奇协会”的快讯上声称内部人士/阴谋会隐藏在民权运动之中，在这场运动中“黑豹们……被远在他们之上的内部人士的代理人所利用，他们是如此的像大猩猩，拍打胸脯并发出吵闹的声音。”一些其他的极右集团要么跟随“约翰·伯奇协会”，要么拾起内部人士理论并使用到他们自己种族主义的事业中。在这些事业里，大量的光明会/犹太人/共产党的世界阴谋被正当地用作散布仇恨。三K党的《血十字》杂志翻版并扩大了“约翰·伯奇协会”关于阴谋会任务的理论，再一次认为存在一个巨大的企图控制美国的国际阴谋，这个阴谋可以追溯到光明会，而光明会却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时代，且通过共产党信条指示了马克思，同时光明会还得到了犹太人银行业的支持等等。

当“约翰·伯奇协会”越来越和更多的政治极端联系在一

起并滥用历史的时候，很多普通会员都离开了，致使会员数量急剧下降，同时以前的盟友也开始公开指责这个协会。著名的保守派组织如美国保守联盟发表讲话否认和“约翰·伯奇协会”有联系，同时著名的保守派人士罗纳德·里根公开指责“约翰·伯奇协会”。当1985年罗伯特·韦尔奇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并在来年去世的时候，协会看起来要永久衰落下去了。截止1986年，这个组织欠债900万美元，且80年代末的时候，协会的会员也只剩下一万八千名。

然而，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情给“约翰·伯奇协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乔治·H. W. 布什1991年提出的世界新秩序，给阴谋家们再一次地吹响了号角，伯奇人再一次警告一个世界政府的危险正越来越凸显。协会会员提出美国总统对伊拉克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用以增加联合国的权力并削弱美国的力量。到了1995年，据报道，协会成员增长到5.5万人，由于协会声称未作记录，所以很难得到确切的成员数目。

虽然“约翰·伯奇协会”的哲学可能令很多美国人不舒服，但协会的遗产还是扩大到了很多领域。20世纪70年代阴谋论的想法不再被少数极端分子所坚持。约翰·F. 肯尼迪在1963年被刺杀，然后沃伦委员会负责调查这件事情，该委员会1964年秋天的报告被称作是“所有阴谋理论之母”的开端。1963年，可以看作是美国走向疯狂的开端，同时在这一年对官方观点的质问——可以是非理性的，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是一种义务——开始被接受。后来几年内发生的事情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1972年的“水门事件”促使其达到顶峰——在这个事件中，共和党人冲进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最终导致理查德·尼克松被弹劾。这引起了更大范围的怀疑与不信任，使得阴谋

论在一种主流的环境中繁荣起来。对政府机构的批评以及对政府言论的怀疑本身就是一种正常的怀疑主义，但不应该发展成一种妄想狂式的要求领导人或政府官员解职的行为。由于考虑到光明会神话的特别，所以韦尔奇和他的同盟在20世纪晚期，将这一概念扩展到了每一个主要事物和机构里。在千年结束之际，光明会/内部人阴谋的神话将包含“彼尔德堡集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国际银行机构、国税局、美联储，甚至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总统，总统肯尼迪被刺案以及美元上的符号等等。一旦新教右翼（Christian Right）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那么这些结果将会是启示录式的天启。

第六章
《启示录》使者
——光明会与基督教右翼

“组织严密的阴谋”

海湾战争结束后，老布什于1991年3月6日在国会中的一段话，对他的美国公民产生了深刻影响：

> 直到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被分割了——这是一个被带刺的铁丝网和坚实的砖块所分开的世界，一个有冲突和冷战的世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世界正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个世界，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带来真正的繁荣。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在一个“世界秩序”中，“正义的原则以及公平的游戏规则……是保护弱者、反对强者的……”，在这个世界里，联合国从冷战的瘫痪中逐渐恢复过来，并准备完成它的创建者所设定的那些美好图景。在这个世界里，所有民族拥有自由以及对人权的尊重。

但是，不要把美国第四十一位总统在“世界秩序”中详细提到的那些公平游戏规则、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这些花言巧语真当回事。

对一些美国人而言，他可能刚刚宣称自己是假先知（Antri-

christ)：这个词语对具有阴谋论思想的人而言——其直接的意思是指野兽的标志（Mark of the Beast），即明显暗示了美国政府在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及其将派出公民去创建一个世界政府的计划。然而，政府内那些大事声张的批评却几乎都来自期望支持共和党政府的人士——右翼保守分子。他们对一个世界政府的恐惧结合了古代和现代的阴谋论，其中，对国际机制的怀疑，例如对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等组织怀疑的时候，就混杂了宗教启示论的内容，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全球阴谋论。整个阴谋的关键在于抓住各种各样的要素，根据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在他 1991 年《世界新秩序》（*The World New Order*）一书中的定义，即牢牢抓住光明会这个要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罗伯特森的书可以看作是罗伯特·韦尔奇《时代真谛》一书的继续，并通过罗伯特森正统主义基督教事业的影响力，继续发展了光明会这个神话。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正统派基督教集团在电视福音传教士的帮助下已经频繁地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出现，这些电视福音传教士有吉米·斯瓦格（Jimmy Swaggart，在高峰期时，他吸引了来自世界 80 多个国家的听众），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帕特·罗伯特森以及吉姆·巴克（Jim Bakker）。虽然老福音传教士主要关注精神问题，然而这些新一代的传教士却把他们的电视节目作为传播其政治立场的平台，例如大量地关注“家庭道德”的沦丧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由于他们控制了广大美国保守派的地盘，并在寻求资助方面亦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这些传教士开始拥有巨大的政治力量，这也使之成为令共和党所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候，基督教右翼的一些成员暴露了他们和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班子之间的一些分歧。他们从一些令人担忧的证据中推出总统有意或

无意地在世界统治这个问题上，朝着黑暗力量所期望的那样而被其左右。正如帕特·罗伯森在《世界新秩序》中所描述的，他担心即使像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老布什这样诚实的政治家，也会在世界和平问题中担当的大使角色以及与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瓜葛中，很可能被利以执行一个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的邪恶任务。他提供了一种解释蓝图，这些领导人很可能非常单纯，以至于机械地模仿“组织严密的阴谋”（tightly knit cabal）这样的标语。那些制定标语的人在这些领导人周围不断地重复着，促使他们在恶魔的统治下执行新秩序。

在20世纪下半叶，很多保守派的右翼圈子里面，一次又一次地提起这种“组织严密的阴谋”（tightly knit cabal）的恐惧。关于这种“组织严密的阴谋”有很多解释版本，有时它被解释为一个国家自己的政府，有时又被解释为像联合国这样的世界组织，还有的时候被解释成恶魔自己及其亲信——反正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其做出解释。在右翼保守派广阔的地盘上，基督教正统主义是其中最极端的一种“民兵运动”（militia movement），他们使用善良与邪恶、公开与秘密，以及上帝与撒旦这样的词语来决定当下的世界观。同时不管是直接地还是暗地里提到的光明会都成了他们的素材。

“正统主义”（Fundamentalism）第一次应用是为了形容20世纪初美国出现的一股新教主义（Protestantism）势力，他们和早期的美国殖民者有相似的意识形态。正统基督教在20世纪发现诸如英国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这样的新教势力控制了社会的主流，于是他们开始担心自由主义会不断增长，人们会逐渐接受现代主义或更早之前启蒙运动倡导的世俗人文主义。保守的新教领袖认为，正统主义的一系列信仰都内化于真正的新教信仰之中，它寻求把传统价值储存起来，就像《圣经》中

所解释的一样。这种信仰的中心就是启示录式的世界观，将世界看作是好、坏之间的斗争，同时社会面临着一个邪恶阴谋论摧毁的危险。为了和这个阴谋作斗争，正统主义福音传教士力劝大家重新树立真正的信仰，并号召他们的追随者对那些具有阴谋身份的人保持持续的警觉。这个阴谋可能表现为各种形式，但是都为了威胁社会的基石，同时还可能以更险恶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反对基督的统治。20世纪后期，美国的正统主义者频繁地指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及摇滚音乐严重威胁了基督教的价值。然而，这种传统却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的时候，英国清教徒牧师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从欧洲宗教压迫中逃到美国，他在教皇那里看到了阴谋的具体方案；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很多清教徒看到了反基督教者为了维护国王乔治三世的统治而工作。

基督教信仰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历史之中。当清教徒们建立起他们的“山上之城”（city upon the hill）时，他们的使命观就已经坚定地表达出来了，并证明这是上帝派给他们的任务，建立美国其实就是上帝的意旨。早期的清教徒殖民者从《圣经》和一些手稿中找到了证明，并从中汲取力量。《新约·启示录》中讲述的天启，即上帝和撒旦在基督重生之前的宇宙大战，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殖民者在世界上自我认同的重要依据。《启示录》讲述了人们的罪恶是如何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于是上帝就派遣了4位骑手（horseman）去全世界传播战争、疾病和其他灾难。撒旦则利用了这个被称为“大患难”（Tribulation）的机会，送出了他的使者——假先知去愚弄基督徒，使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基督再世（second coming of the Messiah），其真正的目却是为了毁灭基督教。那些基督徒们并没有相信假先知所说的如果不放弃自己基督徒的信念就会遭受死亡威胁的话，这种状况

一直持续到上帝开始干涉，并最终在世界末日大战中战胜撒旦为止。早期到达新世界的殖民者将自己所受的考验和艰辛解读为《启示录》中的“大患难”，即只有遭受巨大的痛苦，才能享受世界长达千年的和平，基督也才能再次降临。正是这种解读加强了他们那种身临世界末日的感觉，即撒旦的继承者——反基督徒（野兽）及其代理人——假先知将在最后战争来临之前统治这个世界：

> 他敬畏野兽，并问道：“谁能比得了那兽？谁又能发动一场反对它的战争呢？”于是就赐予了野兽说大话和亵渎言论的口，且能在42个月的时间内恣意妄为。（《启示录13：4－5》）

因此，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警惕假先知的出现就变得异常重要，假先知很可能正“练习行使他的权威”呢（exercise his authority）。18世纪对光明会的恐惧促使受人尊敬的蒂莫西·德怀特把法国哲学（philosophes）和光明会都定义成假先知，他就是主要参考了启示录中的“来自教皇野兽口中不干净的灵魂”的描述，以此比喻那些法国思想家所支持的自然神论者和启蒙哲学家。他在1798年4月份的一次题为《美国人在目前危机中的职责》的布道中，认为目前正处于一个“没有信仰理论”和“老师没有信仰”的时代，很可能导致一个无神论时代的到来，这是非常常危险的，并警告他的美国同胞要保持警惕，保护自己，防止为这些新观点所左右：

> 这个时代具有典型的特征并面临灾难，因此，不虔诚的老师，或者无信仰的老师将被派遣到全世界，他们的任务是联合人类反对上帝。据说他们……产生于某些国家，那些原则上要联合起来反对上帝的国家；他们像青蛙一样

> 邪恶，令人作呕，顽固不化；他们拥有恶魔的灵魂：渎神、邪恶、骄傲、虚伪还有残忍；他们创造奇迹或者神奇；他们还聚集大量的人去战斗，他们是一个反对全能上帝的公开的、职业的反动集团。

纵观美国的历史，对假先知的定义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从 18 世纪对光明会的恐惧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反基督主义和反共主义，直到出现对联合国、欧洲经济共同体、条形码以及黑色直升机的怀疑——不过总是不断加强一种来自其他地方的不明力量给美国造成的威胁感。观察 20 世纪晚期的基督教正统主义的观点，它明显地滑向了光明会神话的理论，并进一步扩展了该理论。

基督教正统主义者依靠对《圣经》的字面解读去理解这个世界。例如，1925 年声名狼藉的“猴子审判”（Monkey Trail），即前人民党政治家后来转向正统主义的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在田纳西州的一个公立学校，公开向达尔文理论挑战一事，因为达尔文理论挑战了创世纪中人的起源。（令人震惊的是，80 年后这场辩论又重新兴起，堪萨斯州教育董事会被游说要在自然课上教授神造论的观点。）《圣经》是正统主义者理解世界现在和过去的基准。他们大多相信“天命主义”（dispensationalism）——认为世界历史被分成一连串的世纪或者“天道”，每个世纪或者“天道”都依照上帝对人类特有的态度作了标记。根据天命主义者的观点，我们目前生活在最后一个世纪里面。在这个时代结束之际，将发生“被提”事件（Rapture），即基督返回地球把获救的人带到天堂。现世的天命论者相信“被提”事件之前将有着一个 7 年左右的“大患难”期，在此期间，世界将发生一连串的自然灾难、战争、瘟疫和饥荒，之后幸存者将被送往天堂。更为甚者，《天启录》中的预言和《丹

尼尔记》（*the Book of Daniel*）都被认为包含着上述事件何时发生的线索。文本中的预言想象不仅被解释为世界事件发生的依据，还被用作理解这些事件的钥匙，同时也是计算“被提”事件发生时间的重要方法。洞悉美国历史的正统主义者撰写了大量预测基督再次降临时间的手稿。1943 或 1944 年，福音传教士威廉姆·米勒（William Miller）发动了一场被称作米勒教（Millerites）的大众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参与基督再次降临的过程。米勒通过对《圣经》仔细研读后，给出了一份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间表，在里面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是在 1943 年 3 月 21 日至 1944 年 3 月 21 日之间的某个时候。当预期的时间来了且又过去的时候，第二个时间表又出来了，可是时间再次过去，事件却仍未发生，这也就被称为“大失落”。这些失落也显然没有劝止前千年主义者（premillennialist）停止通过尝试熟读《圣经》的方法来预测世界末日的时间。同时后千年主义者（postmillennialist）相信，世界历史是由割成一系列的“天命”组成的，只不过基督重新降临的时间是当基督在地球上建立自己的王国的时候。

正统主义

20 世纪 70 年代，正统主义信仰在美国得以重新复苏。电视福音传教士的兴起让正统主义牧师成为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的名人。“水门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在手稿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这十年最畅销的书是哈尔·林德塞（Hal Lindsey）于 1970 年出版的《伟大地球的末日》（*Late Great Planet Earth*），这是一本前千年的天命主义著作。到 70 年代末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出售了 1900 万册，并被译成 50 多个国家

的语言，最后售出总数达3500万册。林德塞在60年代后期成了一名传教士和牧师。他写这本书的本意是给那些年轻的、更叛逆的且有问题的读者提供一本解释“被提”事件的书。林德塞用《圣经》预言的形式解释目前发生的事件，他认为，1948年以色列建国开启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天命。同时也证明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就是世界末日来临的标志，他觉得这就是《丹尼尔记》中所描述的罗马王国的回归。根据林德塞的观点，苏联明显就是“高格”（Gog）——《旧约》中从北方来的入侵者（苏联后来的崩溃需要重新对此解释进行调整）。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基督正统主义者和林德塞的读者需要有阴谋论的想法，但是林德塞对事件的解释无疑就是归结于一个更大范围的阴谋。当1979年希腊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第十个成员国的时候，林德塞将这理解为《启示录》中所说的第十个角（“被看作是一个拥有7个头、头上有10只角和7个王冠的红色巨龙”）。从这一点，他推测欧洲经济共同体“将成为反基督的领导者。同时我坚信他们的首领应该在欧洲的某个地方；或许他已经成为欧共体议会的一员了”。1981年，在林德塞《大决战的到来》（*Countdown to Armageddon*）一书中，不知是否故意，他将三边委员会纳入自己的攻击目标之中：

> 我认为三边委员会所倡导的一个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世界末日……而三边委员会所倡导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控制者就是世界未来的统治者——假先知。

另外，林德塞声称：“反基督徒具有个性魅力，引人注目，又是一个有煽动性的演说者。他能够运用自己的讲演术迷惑听众”。这样一种形容意味着很多公众人物，如查理斯王子、比尔·克林顿和萨达姆·侯赛因都可能成为这个或那个集团口中

所说的反基督者；哈尔·林德塞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的主要反对者。可以简单地假设，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任何人在公众看来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反基督者。

像林德塞这样的正统主义者认为，《天启录》掌握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钥匙，同时它还可以适应任何形势的变化。它关于瘟疫、火灾、悍妇的描述，以及对诱惑人的、具有煽动性的假先知的比喻，使善永远面临恶的威胁，以及世界一直处于毁灭边缘的世界观得到巩固。此种想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止境的怀疑，即使是最乐善好施的行为，人们也总是能看到其背后的邪恶动机。例如，戈尔巴乔夫的开放与改革（glasnost and perestroika）政策，在正统主义者看来，这不是为了结束冷战，而是考虑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对他们而言，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行为威胁到了基督信仰的权威性，而那个正是反基督者的工作。正是这样的逻辑，教皇保罗二世被认为是另一个潜在的反基督者，因为他的宗旨是宽容和多元文化。

所以，《启示录》不仅是正统主义者理解世界的钥匙，同时也是让他们坚定自身世界观的法宝。是否赞同欧洲的社会政策？是否怀疑政府有阴谋？他们在布鲁塞尔决定要推翻什么呢？很明显，这些普通人怀疑的事情就是反基督者的工作。一份正统主义的时事通讯将布鲁塞尔的计算机网络同无所不包的“邪恶组织”短语联系起来，用以证明反基督者的存在：

> 欧洲共同市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计算机……（是）用数字666做前缀的。那些制造这些计算机和在上面工作的人被称作野兽……他们的触须深入到了黑手党、中情局、马耳他骑士（the Knignts of Malta）以及其他邪恶组织之中，这些组织为了实现全球奴役的目标已经在一起合作多年了……1997年1月，我们得知罗马的现任教皇是一个演员，

他和已经被世界阴谋论者谋杀的真教皇长的很像。(Awakenings Newsletter，傅乐，181 页)

正统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即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实践，它们之间也会有一个巨大而重要的联系，这也就离光明会经过加工混合并重新出炉的时间不远了。虽然光明会的名字还只是边缘性的符号，但是福音传教士和前总统候选人帕特·罗伯特森却已经将其从幕后带到了前台。

罗伯特森和《世界新秩序》

罗伯特森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供职于南部浸礼会，他早期在纽约从事的赚钱生意被认为是物质上的成功，他过着一种花花公子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所谓的基督信仰。但他后来突然发生了转变。20 世纪 50 年代，他不再满足于自己现有的成功，于是转向了上帝，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财产并求学于纽约神学院(New York Theological Seminary)。正是由于他介绍了天命的观点，以及具有魅力的“精神礼物”(spiritual gift) 概念，才使其在福音传教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种精神礼物就是指精神和语言治疗。毕业之后，经过 7 天的禁食和祈祷，他声称得到了上帝的指示，购买了弗吉尼亚一家濒临倒闭的电视台，“上帝说，‘去拥有那家电视台，那是你的了’”。到 1960 年 10 月，他通过电波向一小撮观众传播了他的基督信息。该电视台早年时候一直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但后来得到观众的资助之后就开始有声有色。观众助理帮助建立了一个 700 人的俱乐部节目，正是这 700 人每个月捐助 10 美元才得以支持电视台的运转。这个 700 人的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 90 分钟的时事分析节目，它公开地用基督教来解释新闻，并和观众互动，观众可以通过打电话给祈

祷者提出他们的问题。罗伯特森的“精神礼物”同样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他通过电波给那些打电话过来的观众治病。20世纪60年代末期，估计有一千万人观看了罗伯特森纽约基督广播公司的5个电视台或6个广播台之中的某个节目。在之后的10年内，700人俱乐部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不断增长。后来的发展就是这个节目被卖给了其他公司，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有150家美国国内频道和35个国外频道播放过该节目。

20世纪80年代，虽然世界电视福音传教士发生了一系列丑闻事件，但罗伯特森的电视网络依然和以前一样成功，只不过尽管700人俱乐部节目和时代保持了一致，但它同时却又是目前最带有保守基督色彩的传统节目。罗伯特森的时事通讯却很少受到限制，里面充满了对预言式厄运和道德暴行的斥责，认为世界充斥着“堕胎瘟疫、同性恋、神秘主义、色情文学……家庭不和；柬埔寨的大屠杀；古巴的俄罗斯军队；阿富汗战争”，甚至证明出了世界末日将以“潜在的中东战争”或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方式降临。如果世界正面临进入天启的倒计时，那么也就是说反基督离我们不远了：“今天有一个27岁左右的男人，正成长为撒旦的继承人。”后来在1984年，罗伯特森警告屈从于反基督势力将带来危险，这种危险是与惊心动魄的花招，以及在世俗人文主义指导下残酷的独裁统治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生活200问》中认为，假先知将像耶稣一样出现，我们只有在揭露他真实身份的那一刻才会知道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独裁者——如阿道夫·希特勒。他还警告说目前假先知可能是任何人，他试图领导人们偏离基督，以及许诺给人以足够的尊重。从这个方面来看，学校里的教授、媒体或知识界所宣传的人文主义正是人们崇拜假先知的第一步。

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时候，罗伯特森一直试图把他的

信息递送到白宫，并相信这也是上帝的旨意。对于如何得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他解释道，上帝曾告诉他“虽然你不愿意这么做，但是我要你这么做，因为我想让你成为美国总统”。1987年，他以保守基督徒的身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受到“约翰·伯奇协会”出版的一些书的启发，他将国家的衰落根源怪罪到了美联储的建立、罗斯福的新法案以及越南战争。目前美国的罪人是政府、学院、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因为他们提倡的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家的基督价值。

虽然罗伯特森是美国总统竞选历史上花费时间最多的人，但他还是失败了。尽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且很多支持者也自愿为其捐助大量的资金（大多数都是他的电视观众），但当他个人生活丑闻曝光的时候，他的竞选也就失败了。他被指控利用家族关系逃避去越南作战的职责。而且对一个以高尚道德自律的人来说，妻子未婚先孕恐怕也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这场失败并没有成为他人生的阻力，两年后他组建了一个基督教联盟，目前这是一个拥有100万会员的保守政治集团。

罗伯特森的事业在接下来的10年里面走得更为极端。他圣经式的语言变得越来越令人厌倦，他预言一场飓风将袭击奥兰多、佛罗里达，这是对两地支持同性恋的惩罚。与此同时，他的观点更倾向于阴谋论，例如，他声称得到消息说古巴有秘密导弹基地，或者认为只有他一人知道美国人质在黎巴嫩的地点。他也经常指责大公司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获取利益，且不断增加对国际金融系统、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三边委员会的批评。一旦到达他开始怀疑一个更大的隐蔽活动的时候，就离光明会在他理论中出现的时间不远了。

1991年，罗伯特森出版了《世界新秩序》（*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根据他的出版商）里面包含了“令人震惊的证

据”证明谁是世界真正的统治者并决定着世界的未来。虽然这本书沿袭了韦尔奇《时代真谛》的脉络，但是罗伯特森对光明会神话的解释却是从基督教正统主义的视角出发的。同韦尔奇（以及那斯塔·韦伯斯特，以及更远的阿贝·巴鲁尔和约翰·罗宾逊）一样，罗伯特森相信，历史事件是人们罪恶阴谋的结果而不是偶然发生的。在《世界新秩序》一书中，他描述了公共政策是如何策划的，同时这些政策对那些“来自邪恶深渊”的恶果假装视而不见。

罗伯特森确信这个阴谋可以追溯到千年之前，虽然他重新整合了很多关于阴谋论的观点，但他的观点仍然是从手稿的角度出发的。《世界新秩序》一书详细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阴谋，且这个阴谋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地区，正如圣经中所描述的一样。

罗伯特森从老布什关于新世界秩序的构想出发，从中寻找他的论点并构建了一幅新的历史地图。他不断扩大阴谋论，确定了一条将白宫、国务院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同秘密协会以及“极端新人”（extreme new agers）联系起来的主线。他认为这些组织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世界政府、世界军队、世界法院、世界银行货币系统以及一群管理这些机构的世界精英”。他认为，这些精英此时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包括和美联署有关联的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伍德罗·威尔森（Woodrow Wilson）的行政班子成员；对外关系委员会、联合国以及三边委员会；卡耐基、福特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亨利·基辛格、吉米·卡特和乔治·W. 布什。它意味着每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罗伯特森发展了罗伯特·韦尔奇的前提假设，基于光明会成立于“一个重要的共产党人法定节日”，即5月1号，所以他认定光明会的目的就是要成立共产党。罗伯特森之所以得出这

个结论，源于他对韦斯豪普特推翻政府、颠覆教会、废除私有制的目标，以及要创建一个从“光明会”成员中选出少数人统治的世界政府的设想的分析。

罗伯特森对光明会的正统主义式怀疑来源于两个相反的概念。一个是，光明会代表了世俗人文主义，从其概念中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威胁教会的意识形态。现代基督教正统主义将这种提供了上帝替代词的意识形态视为反基督者的工作。同时，罗伯特森开始把对新时代哲学以及非西方宗教的怀疑（再一次地偏离了基督教教会）与光明会联系起来，后两者正是神秘主义的代表。

罗伯特森把光明会神话放在一个圣经式的框架下分析，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他深化了光明会是撒旦及其邪恶代理人的观念。光明会将不再是异教的组织，而纯粹是一个有着邪恶能力的超自然组织。其次，这种观点将光明会的历史追溯到了世界事件的起源；现代光明会同人类的原罪一样古老，是无限的，是罪恶的具体表现。不管是否故意，罗伯特森将继续为光明会的故事披上玄妙主义、神秘主义和秘密主义的外衣。

罗伯特森的书在第一版的时候，仅仅只是在他的支持者中有所影响。但三年后，这种状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他的书吸引了犹太人反毁谤同盟组织的注意（Jewish Anti-Defamation League），他们注意到书中所提到的“欧洲银行家”的诡计以及引用了像内斯塔·韦伯斯特这些反犹的极右作家的理论，并且得出了比“约翰·伯奇协会”更右的观点。1994 年，米歇尔·林德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扩充了《新世界秩序》一书的论点，并称其观点使“伯奇协会的阴谋论看起来更温顺”。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罗伯特森的文章追溯到“极右的人民党地下文学”时期，这种文学比“约翰·伯奇协会”的任何东西都

“极端古怪和罪恶”。罗伯特森基督联盟运动的力量增强意味着更多的主流保守共和党人的支持，并使得他们开始小心地对待自己，同时他那无所不包的谴责将很有可能使他失去大部分支持者。

罗伯特森盛气凌人的光明会神话和世界新秩序已经和其他极右集团有了相似之处，从而被社会边缘化，他自己也感觉到被主流政治抛弃了。罗伯特森可能就是一个让阴谋论成为主流的工具，但是从到达政治最远的影响力来看，阴谋论在好几十年里就是他的政治资本。美国郊区的极右民兵运动（militia movement）和罗伯特森以及其他正统主义者有很多共同观点。这些观点包括美国政府受制于联合国；宪法中授予美国公民的权利正受到侵蚀。罗伯特森及其同僚们的目标是通过组建自己的政党拿下美国政府。民兵组织的路径则是通过积聚武器并向他们的政府开战从而实现他们的目标。

在美国，民兵或爱国运动（patriot movement）是那些不满政府行为的右翼分子很好的庇护工具，该运动实际上根植于早期的基督认同运动（Christian Identity movement）。基督认同是一个包含了一些极右的、种族主义思想的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K党——他们通过曲解《圣经》的方式，为他们的白色高等种族伸张正义。民兵运动的成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迅速增长，以回应发生在爱达荷州、韦科市、得克萨斯州的红宝石山脊事件（Ruby Ridge。在这个事件中，联邦官员和重装备的混合组织分子僵持不下，并最终以悲剧收场）。虽然在民兵运动这个大框架下存在着很多种类的组织，有的关心枪支管制事务，有的关心宗教原教旨主义，以及最远的可能就是新纳粹主义（neo-Nazism）了，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相信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正遭受着旨在建立一个世界政府的

古老阴谋的威胁。同时，反基督运动正被一个秘密的集团控制着，这个集团可能是美国政府、联合国或者光明会。应对这一即将到来的威胁的唯一办法就是组建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防御的“公民民兵”（citizen's militias）组织。

历史学家迈克尔·巴昆认为民兵集团对想象中的威胁有各种不同的回应方式，一些人采取一种合法的方式反对政府，冀求政府能够相信《圣经》中所说的正统性和不变的原则。第二种情况则是生存主义集团（survivalist groups）控制的灰色地带。他们可能，但不一定有一个基督目标，并寻求推翻整个政府和社会，他们会适时撤退，匿名行动，和世界其他地区断绝联系。因为这些集团的建立是基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不信任，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组织，而且他们大多数都装备有武器，所以和政府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大。第三种情况就是公然采取违法的方式。他们试图通过武器来为他们的种族声张正义，并体现出像圣经先例中所说的那种白人优越性。

民兵组织

很多民兵集团成员同意极右作家格里芬（Des Griffin）所描述的一个世界政府的阴谋。格里芬从早期的光明会理论中寻找支持自己理论的根据，如昆波鲁的《神秘混合崇拜》（*Lady Queenborough's Occult Theocrasy*），书中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金钱男爵——光明会”的工作，同时光明会还资助了俄罗斯革命。根据格里芬的观点，新法案无非就是新形势下摧毁美国政府的古老阴谋而已，这个阴谋起源于新法案起草者的祖先。新法案是“克林顿、罗斯福、光明会每个阶段的计划，其目的是要摧毁我们的宪法和我们的政府，使我们这个民族受苦”（引自马

丁·杜尔汉姆，The Christian Right，132 页)。最近有关阴谋的观点——增加了对三边委员会或者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怀疑——仍然是建立世界统一政府计划的继续，正如网站上对世界末日（End-Times）的描述，认为光明会正通过另外一种伪装（www.benabraham. com)：

> 18 世纪法国雅各宾派的贵族革命运动在今天的美国被称为对外关系委员会，而他们的枪手就是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就是今天光明会政治性的一面。他们制造国会议员、参议员甚至总统，并利用他们通过法律一点一点地将美国引向社会主义。

民兵组织最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美国宪法规定了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超越人们解释力的正统主义真理。很多民兵组织成员都觉得宪法不是由国父创造的，而是直接源于上帝。正如一个民兵组织的领导人所说的：“宪法的来源就是《圣经》，或者说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习惯法。”（巴昆，*Religion and the Racist Right*，207 页）存在一个圣经式习惯法的思想是民兵组织身份认同的基石，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描述了一种由一系列核心真理以及永恒价值组成的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是不容许有任何余地的商量和解释的。第二，它奏响了民兵组织正义的号角。同样，所谓习惯法的支持者们被授予使用“上帝”这个词，这种直接代言不允许有任何对上帝的不虔诚行为。如果你反对或者对民兵组织有任何疑问，那么你就正在破坏基督性（Christianity），最极端的可能，就是你是反基督阵营的成员。这种观点彰显了这个集团的问题。他们称自己是爱国者，并坚信他们自己的政府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目的是要奴役他的公民，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回答一系列非常正义的价值问题。如果政府侵蚀了这些价值，那么就证明了政府

罪恶的本性。

民兵组织对美国宪法的理解是对这种行为最好的证明。他们相信美国宪法就是上帝的“习惯法”（Common Law），任何对这十条“权利法案”的修正与补充都是违宪的。举个例子来说，后来的所得税修正案在民兵组织成员看来是违宪的，进而也就是违法的。如果仅仅理解成民兵组织成员如若逃税，就会受到惩罚，那么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这个乱七八糟的逻辑中可以引申出一个令人讨厌的信号，例如，1870 年的第 15 条宪法修正案规定保护美国各个种族的投票权，这在民兵组织成员看来也是违宪的。所以“习惯法”的观点就成了一把乱舞的大刀，可以随便为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辩护。

所有修正法案，对民兵组织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第二条修正案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关于不同组织的起源，同时还包含了在今天的美国激起很多政治浪花的枪支管制问题。第二条修正案写道：“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枪支）的权利不得侵犯。”持有和携带武器同时也是民兵组织最重要的认同基础。

当 1993 年《布莱迪法案》（*Brady Bill*）通过之后（这个法案要求军火商在买卖之前需有一个等待期限），民兵组织对此予以严重警告。他们认为这个法案是对他们宪法权的侵犯，同时也表明政府正狡猾地向独裁方向迈进。肯尼思·S. 斯特恩（Kenneth S. Stern）对民兵运动的调查报告《平原上的军队》（*A Force Upon the Plain*），引用了民兵组织一个领导者对阴谋论的看法，他认为阴谋论就像一个漏斗，可以用不同的问题，如枪械管制法案或者环境限制法等，吸引那些具有不同需求的人加入进来，然后逐渐精简这些问题使之发展为一个具有反政府性质的东西：

> 然后，你进入到了信仰体系之中。阴谋、光明会、共济会，然后就是关于反犹的阴谋。最后，你就进入了在漏斗底端最狭窄的核心地带，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像蒂姆·麦克维（Tim Mcveigh）这样的人……漏斗的底部越大，那么到达核心区的人也就越多。

蒙大拿地区的民兵组织在1994年召集了一群人抗议《布莱迪法案》，大约有800人参与。他们中大多真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同意这个法案，他们也有权利这么做。然而，他们更喜欢用标题式的语言，例如“新世界秩序的执行者”。其目的在于揭露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即创造一个世界政府，奴役自己的公民：

>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家、我们的政府，以及那些想统治这个世界的人……他们渴求权力，并且腐化了我们的政府，他们还通过破坏宪法的方式来攫取我们的自由，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又称“全球社区”，Global Community）。
>
> 为了实现新世界秩序并最终形成一个单一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得不做很多事情……因为宪法是一个保卫我们国家主权的文件，所以他们必须把它摧毁。由于民兵组织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威胁，所以（他们规定）美国人民必须不能武装……然后，美国人成了“羊羔”。（引自斯特，73页）

在农村地区，那里的枪支管制或者环境限制问题比在大城市或者国会山的影响更迅速，理论上来说，边远地区对联邦政府的干预更为敏感。民兵组织就是利用人们这种对自由权利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推向了极端，声称地区层次之上的所有政府实际上都是非法的，而公民只是对地方行政长官负有责任。民兵组织源于武装力量（posse comitatus）这个词——字面上的意

思是“国家的军队”——来源于地方行政长官召集当地男人的“力量”（posse），目的是为了当地的法律和秩序。1878 年通过的《武装力量法》（*Posse Comitatus Act*）就是为了让美国军队不受国内法的限制，并把这一权利归还地方政府。民兵组织声称，联邦宪法的文件中规定了联邦政府从 1781 - 1789 年具有通过州宪法的权利，并且是唯一具有解释美国法律的权力机构。根据《武装力量法案》的规定以及它的领导者威廉姆·伯特·盖勒（William Potter Gale）的观点，联邦宪法以正统的信仰为基础，且与《圣经》保持一致，甚至美国宪法的最早版本都无法放弃圣经中的习惯法原则。正如联邦法中所写的一样：

> 它们不能被修改、修正或者重复。它们……永久联合的联邦宪法的来源只能是《圣经》……它包含了上帝对他的人民、国家和政府的法律。（引自巴昆，207 页）

对于《武装力量法案》以及其他的民兵组织来说，一个恶势力，不管是美国政府、世界新秩序还是光明会/银行精英杂种，都在试图阻止这些正统真理的实现。按照这种逻辑，任何对宪法的修改都是违法的，因为它试图重新修改或者践踏习惯法的核心真理。照盖勒的说法，美国国内税务局、国家税收机构，都是“一种滥用上帝和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力”的罪恶。换句话说，不仅美国公民没有义务缴纳所得税，同时如若强迫公民这么做也是违法的。在任何事件中，民兵组织都支持大众阴谋理论，正如基督身份小册子所描述的一样，认为美国整个银行系统是“18 世纪光明会的现代版本”。他们的目标就是“获取欧洲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力量以及……创建一个世界政府”（巴昆，205 页）。

为了防止这个邪恶目标的实现，民兵组织（Posse）发誓决定“解雇”任何一个想增加税收或者试图逮捕那些没有缴税的

公民的政府官员。当这种威胁感与携带武器是一种正义、应该储存武器的信念结合起来的时候，情况就更为严重了。

民兵组织的正统主义针对美国政府的行动走得更远。（这里）再一次提及联邦宪法，威廉姆·伯特·盖勒和他的同伴们根据宪法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组成了一个他们自称是国家委员会的组织，试图通过这个组织，在国会休会的时候行使政府职责。盖勒认为这是一个有能力取代国会的组织。1984 年 7 月 4 日，有一个具有相似思想的极右组织打着“契约”（compact）的标志，声称要恢复国家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State，也就是他们自己）。契约包含了诸如恐吓（Caveat）等条文，从本质上看就是对联邦政府雇员的死亡威胁文件：“任何对国家委员会功能和活动的干涉，哪怕是试图干涉都将受到死亡的惩罚，也不能对委员会行使美国国会权力这一行为强加任何罪名。”（巴昆，208 页）武装力量组织的很多成员在提交所得税申报表的时候附带了这个恐吓条文的复印件，1986 年盖勒和其他 5 名成员因给税收官员寄送死亡恐吓信被捕。

戈登·卡尔是北达科他州的一个农民，也是武装力量组织的成员（同时也是前“约翰·伯奇协会”的成员）。他从 1967 年就拒绝缴税，并认为强制收取个人所得税是撒旦的阴谋：

> 如果你给撒旦控制的犹太教缴纳了什一税，那么就是为自己掘墓，请立即停止这一行为吧，像我多年前所做的那样，告诉撒旦的什一税募集者们，“我将不再给上帝的敌人以帮助和安慰。”（巴昆，210 页）

卡尔后来杀死了两名联邦官员，他们有政府颁布的逮捕令，用于逮捕逃税的卡尔。后来他在畏罪潜逃的过程中，后悔地说“我们的国家已经落入外国人之手了”，以及“这些基督的敌人们，已经将犹太人的观点不合时宜地融入到我们国家的法律之

中，把我们的宪法和上帝的习惯法（这就是写在纸上的上帝法则）扔进了垃圾箱”（巴昆，206 页）。他逃跑了 4 个月，并最终在一场枪战中死去。很多极右分子都尊他为民族英雄，同时视之为美国政府侵犯公民权的重要证据。

三个六及一系列恐怖行动

民兵武装组织并不是唯一利用法律的组织，他们相信这是正统精神要求他们做的，所以他们也不得不这样做。一旦他们的中心假设成立——美国政府是不合法的，那么一个虚幻的世界就产生了。他们认为政府的任何干预行为都可能是为了“抓住你”，反过来，他们也变得与社会越来越脱节，事实上法律机构对他们迅速进行了调查。一旦那些自我封闭的社团建立了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世界，就会发现，这个世界面临的所有邪恶力量都可以通过他们周围的世界不断得到加强。同时这和《启示录》的字面解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指引着一条更为复杂的寻找更大威胁的道路。

例如，通过数字占卜的每一次交换数字的时刻，就可以找到野兽的标志（Mark of the Beast），民兵组织在有条形码、现金或者其他电子数字系统使用的地方，为每个美国公民安置了一个社会安全数字。根据《启示录》中的记载，“在每个人的右手或者前额上有一个标记，没有任何人会购买或者出售这个标志，除非这个标志是野兽的名字，或者这个数字就是他的名字……并且这个数字是 666。”他们声称 3 个 6 的出现可以证明假先知即将出现，同时也证明了美国人正在购买和出售野兽的号码。3 个 6 还可以进一步证明政府部门里有反基督者：克林顿总统在 90 年代中期提出了关爱健康的计划，这个定义中包含了数

字18，也就是3个6。酒精、军火以及烟草集团成为很多相信阴谋论的民兵组织的目标，民兵组织认为这些集团在枪支管制以及红宝石山脊和韦科事件中佩带了666徽章。一旦有了对666证据的线索，他们就到处传播：电视福音传教士杰瑞·福尔维（Jerry Falwell）在基辛格名字的字母中看到了666的数字，与此同时，其他的福音传教士发现666经过编码之后可以组成“纽约市”这几个字母——即暗示纽约是国际银行系统的中心且被东部精英控制着。

当然，这种通过复杂的数字编码以及圣经预言来看世界的行为可能只是一种无害的怪癖。然而危险的是有些人通过分析残缺的金字塔砖头来分析美元背面的秘密（不管宣称的内容是什么，不可能那么巧又是3个6的重新排列）。在极右势力的深处，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并深深的扎根于正义之中。

基督身份集团（The Christian Identity group）称自己是上帝的契约、剑与军队（Convenant，Sword and Arm of the Lord）的组织，以南密苏里为根据地，并炮制了一个种族阴谋论，同时他们较其他民兵组织有更好的武器装备，后果也就更加恐怖。他们认为自己很可能会正面遭遇“被提”事件之前的大灾难，同时也清楚地指出撒旦目前的代理人就是犹太人。这个组织1982年出版的《生存手册》（*Survival Manual*）一书都是些关于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大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诀窍：

> 现在，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一样，在世界坍塌之前，……基督徒们将面临大患难（Tribulation）。未来的日子将是展示我们对上帝真爱与信仰的机会。不要让惩罚变成你们对上帝的背叛。明白这是一个清洗的过程，这样，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重新降临……地球将变成在基督领导下上帝的军队，和满嘴谎言的恶魔之父撒旦及其杂种——即流

> 淌着撒旦血液的犹太人之间的战斗。（巴昆，216 页）

一旦犹太人和撒旦之间的联系被重新提起之后，那么离把阴谋和光明会联系起来也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光明会是一个可以代表“他者”威胁的万能词。上帝契约、剑与军队这个组织同样声称从历史中找到了阴谋论的“证据”，他们重现了《犹太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中的神话，尽管这个组织不是一个专业的基督书籍的作者。此时格里芬的《富人的第四帝国》（*Fourth Reich of the Rich*）也为他们的反犹线路做出了贡献，书中强调：

> “主要的计划”：即他们的邪恶阴谋正如议定书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这群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光明会的成员，是“光明使者”恶魔撒旦的追随者。他们崇拜撒旦，这是撒旦的阴谋。（巴昆，193 页）

上帝契约、剑与军队这个组织匿名出版了《巫术与光明会》（*Witchcraft and the Illuminati*）一书，明显参照了格里芬的观点，同时通过世界新秩序将亚当·韦斯豪普特和罗斯柴尔德俱乐部，即将光明会和犹太人联系在了一起。通过林肯和肯尼迪的刺杀事件，进而引发了两场世界大战，他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成功地给历史作了标记。

很多极右的民兵组织使用 ZOG 的术语，即犹太人占领政府（Zionist Occupational Government），用以形容政府中的光明会——犹太人的阴谋小集团。这个术语来源于 1978 年的一部小说《特纳日记》（*The Turner Diaries*），是威廉姆·L. 皮尔斯（William L Pierce）以安德鲁·麦克唐纳德（Andrew Macdanald）的笔名写的。《特纳日记》对很多极右民兵组织而言是残忍的（但讽刺的是，皮尔斯本人据说对民兵组织运动非常

蔑视），里面描述了一个白人爱国游击队反对犹太人统治的革命故事，犹太人政府通过剥夺公民权来奴役人们。小说对民兵组织残忍的地方是将叛乱起源归结于一部虚构的《科恩法案》中关于禁止公民携带武器的规定，这似乎预示了 90 年代初《布莱迪法案》的出炉。书中描述了故事主人公厄尔·特纳是如何加入这个反犹统治政府的组织。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书得到了民兵组织的认可，但是书中关于特纳进入组织的典礼和仪式却是参照光明会等神秘组织的仪式写出来的。在故事中，特纳最后成了该组织最核心的秘密成员（不为底层的战士和外围的组织所知晓），并在一次典礼上，通过誓言、蜡烛和长袍使得成员们相信他是“上帝实施其伟大计划的工具”（巴昆，226 页）。后来的一次战争中，特纳在一阵欢呼声中接受了一个自杀性任务，即驾驶一架载有核导弹的飞机撞击五角大楼。作者在后记中写道，这个组织在美国取得了成功并最终向欧洲扩散。

从上面的内容中，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特纳日记》能够吸引民兵组织，因为它清楚地描述了人们对一个非法政府的恐惧，以及写到了公民委员会成功（重要的是，上帝与他们同行）地与这个政府进行了战斗。在现实世界中，事实也回应了小说中的内容，80 年代早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极端组织叫“秩序”（Order）（或者，对成员来说叫做沉默的兄弟，Silent Brotherhood），他们立誓要推翻犹太人占领政府。为此，这个组织通过持枪抢劫和造假活动来支持自己所谓的正义行动。1984 年的一次抢劫装甲防弹车的行动中，他们获得了 3800 万美元，除了部分用以支持极右活动之外，其他大部分钱款却不知所踪。这个“秩序”组织负责替别人进行暗杀活动。1984 年 6 月，他们杀害了一位受人欢迎的、却颇有争议的电视脱口秀主持人阿兰·

博格（Alan Berg），仅仅因为他曾通过电波批评和嘲笑这个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还打算暗杀罗斯柴尔德的一家，而亨利·基辛格以及大卫·洛克菲勒也上了他们的暗杀名单。当法庭要求读出该组织的誓词，即“尽一切可能把我们的人民从犹太人手中拯救并给雅利安民族带来完全的胜利，这是神圣的事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秩序”组织对小说中秘密组织的模仿程度有多深，类似的誓词还有：

> 我，一名雅利安战士，发誓对组织绝对保密，对同志绝对忠诚……请见证吧，我的兄弟，如果有敌人伤害了你，我就追着他，哪怕到了天涯海角，也要把他的头拧下来。同时……如果我违背了誓言，那么请让我的人民一直叫我胆小鬼或者背信弃义者吧……因此我们要求歃血为盟（blood covenant）并宣称我们正处于一场内争之中。（巴昆，229 页）

1987 年 11 月，两名“秩序”组织成员因暗杀博格而被判处监禁 150 年；另一个在和联邦调查局两天的僵持战中葬身于大火之中。其中有一个叫大卫·赖恩（David Lane）的成员，他因为参与了博格谋杀案而被监禁，但他仍然相信美国政府内存在阴谋：“美国政府已经试图蛮横地摧毁白人的领地……对白人种族的大屠杀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目标和追求的结果了。”（巴昆，111 页）

蒂莫西·麦克维，因 1995 年 4 月参与了俄克拉荷马市的阿拉弗雷德·姆拉联邦大厦爆炸案而被捕，在这次爆炸中有 186 人死亡，500 人受伤。当他声称自己最喜欢的书就是《特纳日记》之后，这本声名狼藉的书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麦克维和很多民兵组织成员一样有着共同的信仰，就是认为美国政府正通过枪支控制来剥夺公民权，但是麦克维把这个

信念推向了极端。在得到了诸如《特纳日记》(在这本书的多个场景中，包含了对一个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爆炸案的详细描写）的支持之后，麦克维决定践行自己的信仰，他认为美国政府被一个邪恶的阴谋集团控制着，实行一次连环爆炸能阻止类似“韦科事件”的发生。这场爆炸发生在“韦科事件”最后一天的两年后，即联邦调查局和大卫·考什雷及其宗教追随者结束僵持的那天。麦克维认为联邦调查局制造了这起事件，并超越了自己的职责范围来处理这件事情。在这一点上，麦克维并不孤立：“韦科事件”是激励民兵组织行动的重要动因之一。对于那些坚信美国政府在那次事件中有罪的人来说，相信美国政府是俄克拉荷马市爆炸案背后的阴谋主使并不难。

在爆炸发生后的很短时间里，极右集团的谣言制造厂就开始超负荷地运作。在互联网的帮助下，这些谣言能够很快地扩散并蒙蔽人们的常识。传单上写道：“克林顿指使俄克拉荷马市的爆炸”……麦克维被“安排”去执行爆炸任务，他不算什么，只不过是政府阴谋的一个棋子而已。其他的则声称联邦调查局在“韦科事件”中越职行为的证据就在那个大楼里面，所以政府安排这样一次爆炸意在毁灭证据。查理·杜克（Charlie Duke）当时是科罗拉多州议员，也是一个活跃的爱国会（Patriot）成员，他支持民兵组织和基督联盟，同样认为政府参与了爆炸案。一年前，他长时间地支持州权力应高于联邦政府的权力，现在他公开指出美国政府内部腐烂的本质：

> 我们正在处理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正在应付那些正在占据整个国家的事情，而这个国家是在基督领导下、由基督创建的、把基督徒放在首位的。如果你听得足够仔细，那么你将更敏感，你将能够听到邪恶的力量正流淌在（合

> 法）的政府之中……你将听到天花板中的咯咯笑声，你将能够听到野兽正催促它的傀儡尽快完成使命的微笑。（斯特，217 页）

对光明会神话的改造使得极右分子的反政府行为能够在基督正义的掩饰下开展。把世界末日的预言同秘密精英的运作原理等同起来，光明会的观点和邪恶本身就融合在了一起，并且难以辨别。与此同时，全球阴谋论的观点，即“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开始变得普遍，且被纳入大众文化，更进一步地把阴谋论推向了主流的世界观。伴随着光明会的深化并步入主流文化这个过程，尽管有了这一新的伪装，但它还是借用了它们早期令人不愉快的祖先——它的反犹主义及仇恨外国人的根基——虽然失败了，但还是留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阴谋论框架。当它不能走得更远的时候，它们就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文化，同时这个阴谋也走向了银河系。

第七章
金字塔和不明飞行物
——光明会进入宇宙

光明会图表

1969年6月4日，一张精心设计的图表出现在地下小报《另一个东村》（*East Village Other*）的新闻中。此图表将美国共产党、美联储、美国银行和一般阴谋发起者，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犹太长老会"以及秘密集团（包括占星术士会[①]、共济会，神社等）这些组织联系起来。若仅仅根据这些信息，那么这篇文章很可能被认为出自"约翰·伯奇协会"之手。但这篇文章却和伯奇协会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即反主流性。因为图表把"共和党"、"香港银行"（The Bank Of Hong Kong）和"雅皮士"、黑豹党（Black Panthers）、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联盟（Student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②] 这样的组织等同起来了。

图表上把五角大楼安排在中间，周围有5个圈包围着，每个圈代表了阴谋的一个"阶段"，这些阶段包括："慌乱"、"不一致"、"动乱"、"不幸的恶果"，以及"官僚机构"（Confusion、Discord、Chaos、Aftermath、Bureaucracy）。每个"阶段"

① 17、18世纪一些自称属于会玄术的秘密会社的人。
② 20世纪60和70年代在美国青少年中盛行的一种思潮。

都有两个统治者，阴谋策划者通过计策使他们不和：阿迦汗（the Aga Khan）、“光明会的监督长”（Primus Illuminatus）和圣尤塞里安——约瑟夫·海勒反战讽刺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 -22）中的主人公，共同占领着“不幸的恶果”这一阶段；另外，理查德·尼克松、“光明会的总负责人”（Grand Illuminatus）以“莫德采犯规”（Mordecai the Foul）的特征控制着“动乱”这个阶段。其他重要人物包括马克·莱恩（Mark Lane）——当时坚持肯尼迪被刺阴谋论的人；“圣麦克默菲”（Saint Mcmuphy）——从肯·克西（Ken Kesey）《飞越疯人院》（*Th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的小说中引申出的无政府反英雄主义者（anarchic anti-hero）。这个图表的标题是“巴伐利亚光明会阴谋论的目前结构图以及五原则（Law of Fives）”，同时，这个图表还把光明会神话引入了另一个领域，使左翼和右翼都对光明会产生了相同的恐惧，并且它也复活了那个古老的神秘主义神话。

这个图表由时任《花花公子》的编辑罗伯特·安东·威尔逊（Robert Anton Wilson）所作，这是一个精美的阴谋论骗局。安东·威尔逊对光明会神话的兴趣来自于他的读者（显然，一些读者花钱要求杂志社写一些关于光明会活动的文章）。继肯尼迪总统 1963 年遇刺之后，马丁·路德·金也遭暗杀，这使得阴谋论在美国开始盛行起来，并成为人们解释世界事件的方式之一。沃伦委员会（Warren Commission）对总统遇刺案的调查似乎没有阻止谣言磨坊的运转，总统一死，谣言磨坊就工作起来了（他们对谣言的贡献在于把每个存在矛盾和有明显差别的地方挑选出来并加以细化）。来自新奥兰多的地方律师吉米·盖瑞森（Jim Garrison），是肯尼迪谋杀案阴谋论的主要提倡者之一，他经常提供一些煽情理论吸引地下左翼出版社的注意力，这些

出版社中有一个曾使用方程式（the equation）的方法介绍光明会。面对阴谋论，左翼和右翼一样容易上当，这一点激怒了安东·威尔逊。于是他开始策划自己的阴谋——其中就包括“光明会图表”。“我们指责每个光明会的成员——尼克松、约翰逊、威廉姆·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我们自己、火星人侵者（Martian Invaders），所有阴谋论的爱好者、每个人”，安东·威尔逊毫不掩饰地兴奋地解释道。这个拙劣的模仿品越来越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流程图，并与同为《花花公子》编辑的罗伯特·施（Robert Shea）在1975年合著了《光明会!》（*Illuminatus!*）三部曲一书，其中用幽默讽刺的口吻精细地描述了人们对秘密协会阴谋的恐惧，这也为光明会神话开辟了新的解释道路。其实在这之前，光明会神话只是政治右翼散步谣言的工具而已，但现在，光明会神话却成为左翼主导的反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了，代表了一种怀疑现存一切事物和对神秘事物不断感兴趣的潮流，这些都是7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在新时代的伪装下一直延续到今天）。

《光明会!》（*Illuminatus!*）三部曲包含了小说《金字塔上的眼睛》（*The Eye in the Pyramid*）、《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和《利维坦》（*Leviathan*），并融合了光明会神话中所有可能的组合以及它们创造的新东西。“事实上，《光明会!》是讽刺那些醉心于阴谋的人（conspiracy mania）。”施在1976年接受某杂志采访时说：“醉心于阴谋是一种逃避……历史责任的方法。”小说的最后部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不断传播的恐惧，将政治左翼和右翼一起奚落了一番。

三部曲是从一系列日记中发现了阴谋作为其开端，那些日记中记载着光明会正密谋占领整个世界这件事情，故事的高潮

是光明会对因格尔斯塔德（Ingolstadt）[1] 地区一场摇滚音乐会的听众进行大屠杀的事件。这本书采用了美国人熟知的阴谋论，例如，林肯、肯尼迪遇刺案；超自然事件（如纳粹士兵在因戈尔斯塔德地区外的一个地下湖中悬浮着生活），以及一个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不谐者协会（Discordian society）——一个由格雷格·希尔（Greg Hill）和克里·托尔利（Kerry Thornley，那时他们使用的名字是小马拉克里普斯和奥马姆·哈亚姆·拉文赫斯特，Malaclypse the Younger and Omar Khayam Ravenhurst）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创立的宗教。该书作者就是此协会的成员，这也是很多人关注三部曲的原因之一。

《光明会！》

不谐者协会被其追随者描述为“既是一个笑话又是一个宗教”。其主要前提是不和谐与混乱是宇宙的自然状态，这跟对古希腊不和之神厄里斯的崇拜是联系在一起的。《光明会！》三部曲通过模仿该协会主要文件《不和原则》（*Principia Discordia*）的文字风格和里面内容混乱的转换方式以及省略了大量的时间提示，意在迷惑读者，也为了强调不和哲学背后的快乐无政府主义。不谐者协会的《原则》文件将自己和政府对立起来，并发出任何现状中都包含了阴谋这一信号。和《光明会！》三部曲一样，它的攻击目标是左翼以及右翼。文件中设计了一个讽刺性广告，里面提到了光明会，“古代光明会的巴伐利亚先知邀请你一起参加世界最古老且最成功的阴谋”。后来又有了一则广告：“我们警告你请勿模仿！我们的阴谋才是正宗的原创”，同

---

① 德国东南部城市，位于巴伐利亚州，地处多瑙河畔。

时间道："是不是在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童话故事中删除了一个深奥的寓言？"里面还有一封来自光明会成员的信戏弄了政治光谱中的左翼和右翼，信中写道：

> 需要提醒你的是，我们的教学不宜公开。虽然公开也没有坏处，但要承认，其中的一些可以在乔伊斯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巴罗斯的《新星快车》（*Burroughs' Nova Express*）、詹姆斯·金（King Jams）翻译的《圣经》（尽管不是拉丁或者希伯来语）、（"约翰·伯奇协会"的）《蓝皮书》，以及本·富兰克林的私人论文（！）中都可以找到我们教学的内容。但我们仍然要禁止这些书籍的发表。（《不和原则》，72 页）

《不和原则》和《光明会！》三部曲都强调了所谓秘密/神秘的先驱，并以此扩展光明会神话的范围。两部作品都详细地描述了光明会的信仰，即该组织比传闻中所说的 18 世纪还要古老（《不和原则》认为它起源于公元前一万八千年的亚特兰蒂斯），书中把伪造的意义和符号系统作为理解宇宙神秘的关键，目的仅是为了摧毁人们那种寻找绝对事物背后隐蔽意义的倾向而已，这也是这两本书立即取得成功并被人们广泛秘密传阅的关键所在。《不和原则》文件的关键是"五原则"，即"古老的基督传说中的一个原则……"，其具体表述是这样的："万事万物都以五的形式出现，要么能被五除，要么是五的倍数，要么直接或间接地符合这个原则。"更重要的是"五原则永远不会错"。但接下来的内容就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因为威尔逊在里面继续写道："当你明白五原则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不和哲学的启迪，然而五原则并不是真的，事实上它什么都不是。人的大脑一分钟内要接受千百万个嗡嗡的、强烈的和忙碌的信号，其

中大部分都被忽略了，只有剩下的一小部分才会和自己当前的信仰结合起来”（约翰逊，Architects of Fear，183 页）。

《光明会!》三部曲正是这些千百万个嗡嗡的、强烈的、忙碌的信号选集，所有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连贯的叙述，但说不定在某个地方就是有问题的。在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金字塔上的眼睛》里面，主人公在寻找日记的时候，顺便把那些流行的、时常还自相矛盾的关于光明会的观点都介绍了一下，同时通过验证其中所谓的阴谋来揭示这些观点的荒谬。在一篇日记的序言中写道：“我认为，我们找到了解决拜火教创始者（Zoroaster）、飞碟和所有极端主义者的光明会难题的线索。”同时在另外一篇，作者又写道：“这里有更多关于美国国玺上的金字塔下布拉瓦茨基夫人、通神论（theosophy）以及格言如何和光明会联系起来（或者没有任何关联，事实上我越追究就越糊涂）的线索。”一旦读者大量阅读了书中关于光明会传说以及阴谋论的内容之后（该书包含了很多阴谋，难怪文化历史学家马克·芬斯特曾经形容这本书为“阴谋论百科全书”），作者就夸张地告诉读者，他们所知道的流行神话只不过是一个巨大阴谋的冰山一角而已。例如，在 1786 年巴伐利亚光明会成为非法组织之后，亚当·韦斯豪普特的命运发了什么样的转变，对此该书的观点是：

> 没有历史学家知道，自亚当·韦斯豪普特从巴伐利亚被流放后发生了什么……以及乔治·“华盛顿”的日记内容在那天之后就反复地提到维尔努（Mount Vernon，华盛顿家）的大麻。乔治·华盛顿很可能杀害了亚当·韦斯豪普特，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我们第一任总统，还连任了一届，这点目前得到了验证。

以上就是该书关于建国阴谋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以一

种大家都知道的讽刺形式而写的。事实上，一些包括华盛顿本人在内的建国元勋都是共济会成员，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同时，共济会的传统及照片在那个时代也是被公众认可的。当1778年革命军从英军手中重新夺回费城的时候，华盛顿就穿着他的共济会服饰并带领了一小队共济会成员满城庆祝这次胜利。可是现在，共济会的地位并没有因华盛顿等人而受到大家的尊敬。《光明会!》三部曲的作者深谙此点，所以干净利落地省去了历史上这个明显不一致的地方，同时还强调美国建国和共济会里面的一些神秘事物分不开。后来，在一本幽默讽刺的书中，他提到了一张传单，这张传单是为了揭露圣殿骑士在法国大革命中所谓的角色而制作的。其中，作者悄悄地安排了一个故事情节，里面韦斯豪普特给身临险境的托马斯·潘恩用法语写了封信："他写完了信，向潘恩解释自己为什么不能帮助他，还……喃喃自语道，'雅克·德莫雷（Jacques de Molay），你一次次地被报复着'。"（其中不经意地提到德莫雷——圣殿骑士最后一位总团长，1413年被法王菲利普四世处死——实际是对古老传说的幽默暗示，即法国大革命是光明会为了祭奠德莫雷之死而发动的。）

在这个故事的末尾，韦斯豪普特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意义的美国国玺"把信封封印起来。同时，在一本没有时间观念的书中，提到了一个人花了一天的时间，苦苦思考美元上的华盛顿肖像，最后得出结论："这根本不是华盛顿，这是韦斯豪普特。把他跟早期华盛顿真正的照片作对比，你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美国国玺及美元钞票隐藏的意义启发了阴谋论家，这里面应该有更为复杂的阴谋。安东·威尔逊和施压缩了那些大多数人都熟悉的阴谋，并做了一些自己独创的修改。（根据《光明会!》的观点，国玺是一个身穿黑色外衣的神秘男人给托

马斯·杰弗逊的，这个男人很可能是从外太空来的时间旅行者。）

威尔逊和施对神秘国玺的解释，给已经很复杂的传说又披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虽然他们用荒谬可笑的口吻叙述了那些阴谋论，但读者只有在掌握了大量的阴谋论、并对它们有一定的了解后，才能感受到里面夸张的效果，就如前面提到的德莫雷传说一样。20世纪面临尾声之际，相对于那些无所不包的阴谋论而言，人们更容易接受三部曲中撰写出来的阴谋故事。

事实上，美国国玺的设计牵扯到了很多人。一开始，大陆会议任命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以及法国艺术家皮埃尔·斯密梯雷（Pierre du Simitière）负责设计美国国玺。那年8月，他们公布了国玺的设计方案：一个光环下面有一个盾牌，盾牌上面有一个三角形图案，外围是一圈光芒，里面则有一只眼睛。下面有一句话，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当然，这个方案离最后完成还需要进行进一步修改；1782年，即6年后也就是三届委员会之后，国会秘书查尔斯·托玛逊（Charles Thomson），最终完成了国玺的设计，也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国玺图案。国玺前面的图案是一只鹰，它的左爪抓了13支箭（因为最初美国由13块殖民地组成），右爪则抓了一根橄榄枝，鹰图案的背后是一座没有竣工的金字塔，距离竣工的顶点只有13步。在金字塔的底部是罗马数字“MDCCLXXVI”（1776年，即美国宣布独立的那年），而上面是一只“普罗维斯之眼”（Eye of Province），这只眼睛似乎在观察着一切。最上面和最下面分别写着“Annuit Coeptis”（天佑吾人基业）和“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新秩序”）。

1935年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提议下，美元的图案设计和国玺的图案联系起来了。美元正面是乔

治·华盛顿的肖像，背面是国玺的两道光环。这些创造性设计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托马逊认为："金字塔象征了力量和耐性；上面的眼睛和誓言暗示了上帝支持美国的原因。"华莱士认为国玺具有多样性统一的象征性意义，同时也是美国的一个重要象征，国玺上面的金字塔代表了人类的努力和对知识的渴望。

但是对于那些具有阴谋论思想的人而言，对国玺善意的解释并不能消除他们对它的怀疑。在他们看来，国玺被创造的故事及其象征意义的背后肯定隐藏了秘密，在图像中肯定隐藏了一股邪恶的力量。国玺上最有争议的图像可能就是金字塔上那只注视着一切的眼睛。眼睛和金字塔的象征意义可以追溯到前基督时代，不管有多少辩论者指出那只普罗维斯之眼是全能（基督）上帝的传统象征，阴谋论家仍然一意孤行。对他们来说，这个眼睛是埃及太阳神何鲁斯（sky-god Horus）的象征，何鲁斯以猎鹰的方式出现，他的右眼是太阳，左眼是月亮。由此可以看出，这只眼睛大体上代表了对太阳和光的崇拜。再进一步，对光的崇拜和对光明之光（Bringer of Light）的崇拜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就是对露西法（Lucifer）的崇拜，因此这个符号明显的象征了撒旦/共济会/光明会。著名的阴谋论者威廉姆·盖侬·卡特（William Guy Carter）在介绍《棋子》（*Pawns of the Game*）一书的文章中这样解释了国玺的意义：

> 国玺上图案的重要意义是：上面的金字塔代表了摧毁天主教（广义基督）教堂的阴谋，以及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原文如此），或者建立光明会控制下的联合国独裁统治；而从各个方向发出光芒的眼睛，实际上是一个"间谍眼"，象征了恐怖的、类似盖世太保这样的间谍组织，这是由韦斯豪普特用"拍马屁的朋友"（insinuating brethren）这个名字建立起来的组织，旨在保护光明会的

"秘密"并威胁大众接受他的规则。

这个符号并非是力量和统一的象征，也不是上帝庇护下美国人民努力的象征，而是光明会目标的象征。(没有人会傻到去相信一个所谓的秘密社会竟然选择这样的一个公共标志来代表他们，而且里面还隐藏着他们的目标。可见，严密的论证并不是阴谋论家的强项。)

虽然金字塔上面的眼睛曾出现在共济会的图案中，但它也曾在古埃及的图案中出现过，况且普罗维斯之眼也不止一次的在《圣经》中被提到（例如，《诗篇》32：8："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事实真相是，那只眼睛并非是光明会的象征，可是依然有无数未经证实的言论认为它就是光明会的象征。而事实上也没有文件表明韦斯豪普特的光明会使用过类似的图像，但是依然有很多人认为光明会使用过这个图像，在某种情况下，它还作为事实的真相被人们所接受。除了几个支持阴谋论的网站上有些文章之外，就连"大英博物馆里面也没有文件"支持这种观点。但它无疑和钱包中美国政府发行的钞票一样吸引人。

你一旦走上那条路，就必然会为国玺神秘的象征而愤怒。在数字占星家的眼中，13 这个数字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意义和一开始 13 个殖民地的事实相差甚远。阴谋论家认为鹰魔爪下的 13 支箭，13 个浆果以及橄榄枝上的 13 片叶子、盾上面的 13 根线条，还有鹰头上面的 13 颗星星，这些——是巧合，还是里面有邪恶的东西呢？——组成了一个六角星。这些东西还有得一说：这个鹰明显有 32 根和 33 根羽毛，这就是共济会最高级别的象征。同时，下面的拉丁标语是最有问题的，他们把标语"Novus Ordo Seclorum"（"时代新秩序"），通常重复地（错误地）翻译成"一个新世界秩序"。最后，那个日期——1776 年

——每个美国人，年轻的或年老的都知道是美国宣布独立的日子。在美国，有什么比把这个日期放在美元后面更具有意义呢？然而，每个阴谋家都会告诉你这个日子事实上也正是光明会建立的时间。

帕特·罗伯特森（Pat Robertson）在《世界新秩序》中对国玺的解释吸收了很多目前流行的观点。例如，那个眼睛象征了“古埃及奥希里斯（Osiris），他是在秘密仪式或共济会仪式上被主要祭祀的神。”在罗伯特森看来，这暗示了1776年——共济会在他们的万能领导者奥希里斯的领导下——新时代的曙光——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同时，他是否从中还领悟到了共济会要建立的是什么样的新秩序？他们要打破的“旧秩序”又是什么？国玺上的那些文字是否还存在只有部分开国元勋才知道的意思呢？对于这一点，罗伯特森有意无意地拣起了政府背后隐藏着“更高统治者”的观点，即：那些看起来在核心权力圈里甚至站在权力金字塔最高处的人，可能只是那些深藏不露的“精英”的玩物而已。对罗伯特森来说，这个“精英”想用“神秘的宗教”来代替欧洲和美国传统的基督教世界秩序。

在国玺解释这点上，罗伯特森的观点相比其他的观点而言还算是比较温和的。一本阴谋论的书写下来还真是痛苦——要将中心观点和鹰的眼睛及金字塔联系起来，又要数图案中的每根羽毛和砖头（或者将国父们的人数做除法）就为了证明整个图案是一个共济会的、犹太人的、神秘的、光明会的、撒旦的信息卡，然后还要证明美国政府正被外国人控制着。

《光明会!》三部曲的作者善于运用吸引人的方式来解释光明会，同时也喜欢发明新的解读方法。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他们声称美国国旗和光明会有联系，即国旗的象征含义中包含

了唤醒刺客（这里指的是阿萨辛）和地狱天使（Hell's Angels）的口令。当然，还有印度大麻（cannabis）：

> 美国国旗，除了角落里那一小块蓝色之外，主要的颜色是红色和白色：这两种颜色也是阿萨辛组织的官方颜色。还有，国旗和光明会金字塔都是被13条横线分隔，而13在古时候就象征了大麻……地狱天使事实上也是使用13来表达大麻的意思。（《光明会!》，42页）

作者提到“阿萨辛”（古代暗杀组织，他们从11世纪开始就令穆斯林世界感到恐怖，同时大量使用毒品使人进入昏睡状态）这样的组织，就等于承认光明会具有久远的神秘主义传统，这也就是说，人们每重新讲一遍光明会的故事，就会把它的起源时间往前推。一旦这种无所不包的阴谋论在20世纪成为阴谋家的主导思想，它也就意味着亚当·韦斯豪普特是古代秘密组织骗子的这个观点赢得了大家的赞同。伊斯米尔·里德（Ishmael Reed）在1971年的讽刺小说《黑人崇拜》（*Mumbo Jumbo*）中用警句的格式写道：“世界历史就是一部秘密社会之间的战争史。”

居然是外星生物

正当《光明会!》三部曲成为当时流行的阴谋论幽默素材的时候，阴谋论和光明会的故事也有了新的听众：一个知道内幕的行家，懂得人口统计学，也知道故事幽默背后的所指，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反对一切已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读者从书中大量的一语双关及幽默的风格中感觉到阴谋论的荒谬，同时也使他们对“官方”历史中所宣扬的东西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书中，作者列举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怀疑和传说，并把这些融

合在一个超级阴谋之中，使得所有的阴谋看起来既可能却又不可能，正像书中一个人物所怀疑的：

> 那些光明会阴谋听起来好像是真的，……但光明会是犹太人的阴谋，天主教的阴谋，共济会的阴谋，银行家的阴谋，这似乎也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将最终找到证据表明，所有这一切是在火星人或者金星人的主导下设计的一个太阳系阴谋。(《光明会!》，200)

1976 年 5 月 1 日的一次摇滚音乐会使得该书的故事情节进入了高潮，书中模仿《启示录》的修辞，揭露了光明会的真实身份，不过这个身份是经作者加工过的。

显然，该书和大众读者产生了共鸣。它丰富的讽刺、怪诞的幽默以及大量的文字游戏使其连续 13 年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平装本科幻小说。1997 年，英国国家剧院还把这本书导演成一个 8 小时的舞台剧，并邀请安东·威尔逊友情出演了其中一个角色。尽管施和威尔逊此后再没有合作过，但威尔逊在他多产的写作事业中，仍然继续他的阴谋论和光明会神话的创作。他的著作包括《宇宙扳机 1：光明会的最终秘密》（1997，*Cosmic Trigger1：Final Secrets of Illuminati*）、《光明会的面具》（1981，*Masks of the Illuminati*），以及《寡妇之子》（1985，*The Widow's Son*）。这些书还被开发成了名为《光明会》的游戏，里面的人物自然就是夺取世界的控制权。游戏中有一张数字卡和可供选择的各种人物角色，游戏者可以选择一个数字作为游戏角色身份认同的标志。该游戏里对普通阴谋角色的模仿从左到右做一个排列是："大媒体"、不明飞行物、"苏黎世银行家"以及美国国税局，以及一些想不到的犯人，其中包括"国会议员夫人"（Congressional Wives）、便利店和童子军。文化历史学家皮特·奈特（Peter Knight）对这种诙谐幽默的阴谋论思想作了如

下评价：

> 看起来……大多数有点讽刺风格的（阴谋论）网络和那些严肃风格的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其中很多确实和《光明会!》三部曲有着令人不舒服的相似之处……那些严肃的和娱乐的阴谋论版本正好可以互相补充形成一个不断上升的圆，虽然这不能吸引更多的付费会员，却无疑使阴谋论变得更加出色。

与此同时，尽管三部曲差不多就是一本关于阴谋论的非主流专著，但里面大量模仿了阴谋家的思维模式。在书中创造了一个超级阴谋，表面上理解就是将每件事情都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大阴谋，这也为20世纪后期更加极端的阴谋论的出台做了铺垫。威尔逊对此解释道：这本书包含了“这么多阴谋选项……每个人如果愿意，都可以从中挑出自己喜爱的那部分。我倒希望因为钱多得发愁的人能看透阴谋的本质，从而少一些上当受骗的。”相反，对那些钱多的不知如何处理的人，支持那些阴谋论家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就像阴谋论评论员罗伯特·希克斯（Robert D. Hicks）所写的：“如果证据和所要证明的阴谋不相符的时候，那么就制造一个更大的阴谋吧。”到了20世纪末，一些阴谋论家的观点变得非常大，以至于都超越了地球，把光明会同会变形的外星人联系在了一起。

阴谋论家密尔顿·威廉姆·库珀（Milton William Cooper）通过好几本书和文章精心创作了下面的这个主题，他试图证明光明会来自另外一个星球，且要占领地球。他的书《看到一匹白马》（*Behold a Pale Horse*，1991）虽然是从右翼正统主义的视角出发，但他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在值得《光明会!》三部曲作者骄傲的那个无所不包的阴谋论熔炉中，库珀讲述了那个纠结的阴谋故事、光明会的邪恶目标及其在一个秘密世界政府

中的角色，以及与来自太空的灰色生物之间的联系。

库珀是军人出身。他在1961年高中毕业后就加入了美国空军，在空军部和海军部的服役时间加起来有10年之多，在此期间，他因一次突出表现获得了好几枚勋章。1966年，他自愿去潜水艇上工作，也正是从那时起，他声称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飞碟：在一次观察夜空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和航天飞机差不多大小的奇妙机械从海底发射出去并消失在夜空中。之后，根据海军上级的命令，他必须保守这个秘密。两年后，库珀参加了越战，在那里，他看到了更多的UFO，在《看到一匹白马》这本书中他作了详细的描述：

> 我在越南的所有时间……看到了那里有很多的UFO活动。我们有旨在用来把信息编译成密码的个人24小时密码系统，因为当时情况非常危险，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有可能被抓住，所以我们对一些敏感的信息需要使用特殊的密码。UFO，在当时就是非常敏感的信息。我得知，一个村庄的所有人看见UFO在村庄上空盘旋，之后这些人竟集体消失了，这件事情非常敏感。我也获知，当时双方军队都对UFO开火了，UFO也发出一种蓝色的光予以反击。还有传闻说，UFO绑架并弄伤了两方军队的士兵之后，把他们扔在了灌木丛中。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没有人知道，但是，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谣言里面应该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后来我发现谣言的大部分都是真的。

这就是库珀的那些经历。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自称接触到了国家的顶级机密，这也是他为什么用近20年的时间写《看见一匹白马》这本书的原因。而这本书也很好地体现了美国20世纪阴谋论的方向，即自18世纪晚期约翰·罗比逊的书被引进之后，阴谋论的内容就包含了每个恐惧、威胁、神秘和

谣言。库珀发现自古埃及以来，一直到现在的太空时代（Space Age），秘密组织在政府的阴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我希望把那些现代秘密组织……一个真实带有目的的组织展现在大家面前。你可以随便称呼他们……罗莎尼亚（the Roshaniya）、卡巴拉（the Qabbalah）、圣殿骑士、马耳他骑士……耶稣会士（the Jesuits）、共济会……光明会、纳粹党、对外关系委员会执行人员……占星术士（Rosicrucian）……三边委员会、比利时集团……他们都一样，都是为新世界秩序的最终目标而工作。

他还解释了肯尼迪遇刺案（总统被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警告人们外星人将在美国出现这件事情）以及揭露了一个拿美国公民做实验的地下实验室。库珀在书中声称找到了外星人和一个秘密政府之间结盟的证据，认为这件事情发生在 1947 年，一直延续到 1952 年，这期间有 16 架外星飞船在美国坠毁，里面的 65 具尸体——包括一具活着的——被人们一一发现。当然，这些都是对公众保密的，而且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洛克菲勒家族的帮助下才阻挡了外星人的入侵。库珀并不是唯一拥有这种观点的人：他在民兵运动中是一位名人，并每周 5 次主持广播节目。自 1947 年“罗斯威尔事件”（Roswell incident）发生之后，在美国，并非只有库珀一人确信 UFO 是存在的。

新墨西哥州的罗斯威尔是那个神秘事件发生的地点，这也使得它将永远只能成为一个农村小镇。案件的梗概要从 1947 年 6 月 14 日的一次发现说起，那天在城镇外的一个农场里发现了一个不明碎片。之后，农场主就拿了一些样品去附近的罗斯威尔空军基地，很多天后，新闻官员发表了一个声明，在里面提到了“飞碟”或者“飞行物体”的东西。很快，一切神秘又有了新的说法：空军基地的官员又证明说碎片是雷达的反射器及

气象气球的碎片（这个是参谋长联席会议 1946 年主持的一个项目，所以只有很少一部分高层军官知道这件事情），主要是用来测试原子爆炸后的沉降物对美国的影响。第二天，当地报纸的头条就以“飞碟释疑”为标题。尽管政府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大众的共识，但是这份政府声明似乎就足够解释这件事情，因而这个案件也就终止了调查。至此，“罗斯威尔事件”似乎结束了，但情况并非如此，飞碟的观点就此开始进入大众文化，并深深地在人们的意识中扎下了根。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头几个月内，有调查显示 90% 的美国人都听说过 UFO 事件。“罗斯威尔事件”发生的数十年内，公众关于 UFO 的看法和认识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66 年有 96% 的美国人听说过 UFO 事件，同时有 46% 的人相信它们的存在。到 80 年代，UFO 开始成为众多阴谋的一部分，并和政府试图掩盖背后的那个秘密政府以及创建新的世界秩序联系在了一起。最近，2000 年的一份民调显示，49% 的大众相信美国政府掌握着 UFO 的资料。

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下，诡异的“罗斯威尔事件”又被重新提起，1980 年出版的很多书就是为了揭开这个事件的真相。这些证明“罗斯威尔事件”的书中写得最好的要属《罗斯威尔事件》（*The Roswell Incident*）这本书了。它是由查尔斯·伯利兹（Charles Berlitz）和 UFO 学家威廉姆·摩尔（William Moore）在采访了当年一些主要见证者之后合著的。在“罗斯威尔事件”发生 30 年后，这个故事的内容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军方官员声称自己恢复了碎片，碎片的材料是其从未见过的，不管使用什么方法都不能让它烧起来、弯曲或是被毁坏，用这个官员的话来说，“不像是来自地球的东西”。另外一些见证者认为这个碎片是从一个被撞毁的飞船上掉下来的，而那个飞船的残骸至今也没有被发现。这本书得到了 UFO 圈子中

(UFO community)大多数人的认可，并拉开了“罗斯威尔事件”重新为人们所关注的帷幕。虽然这个故事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人们还是一致同意在罗斯威尔找到的材料并非是一个气象气球，而且直到今天政府还在极力掩盖着什么——因为在残骸中间发现了4个具有人类特点的外星人，且这些外星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政府的实验室弄去研究了。

对“罗斯威尔事件”的解释如今成了人们对政府和权威不信任的一种文化现象。20世纪晚期的时候，甚至那些不相信UFO的人都相信政府在这件事情里面掩藏了什么。这种转变表现了“政府”观点很容易受到大众的怀疑，因此发现“真实”的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罗斯威尔成为文化历史学家所说的“偏执狂的融合物”(fusion paranoia)，在这个事件中，极右和极左势力有了共同的怀疑对象，即政府内部的腐败。一旦双方的意见达成一致，那么阴谋论就可以开始从右到左，从此到彼，无休止地转换和变化了。

UFO圈子也有自己阴谋论的故事，主要集中在政府控制了外星人活动的真相这点上，但他们与诸如密尔顿·威廉姆·库珀那样的极端观点是不一样的。库珀的理论将极右势力对政府创建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观点同UFO学家对宇宙的理解结合了起来。而且，他还把民兵组织的极端观点——也是很难融入主流的观点——和那些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合成一个新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信仰了古怪的宇宙理论，那么他也更容易接受广义上的通俗文化。文化历史学家认为，库珀的观点连接了两种文化的同时，还提供了一个可以双向转换的点，即：将大众对UFO的观点注入了极右的观点之中，反之亦然。例如70年代，UFO理论新的发展就直接和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观点联系在了一起，这也对UFO圈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70年代开始，“外

星人拐骗”的故事直接表达了这一点，故事里的“被拐骗者”通常声称他们被外星人绑架了，还被强迫忍受一些具有人身侵犯性的科学实验，之后又被送回来。很多“被拐骗者”报告说，他们体内被移植了一些装置，这和极右势力所信仰的《启示录》中的野兽的标志具有相似性，在《启示录》中提到了美国政府通过使用条形码和扫描装置来控制美国公民。不仅仅政府和反基督者（Antichrist）是一伙的，就连外星人和他们也是一伙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个秘密政府和我们的政府一起工作的观点，是与部分极右分子的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观点紧密相连的；这个观点到80年代，尤其是在乔治·安德鲁斯（George Andrews）《我们中间的宇宙人》（1986，*Extra-Terrestrials Among Us*）出版之后，被披上了一层宇宙的面纱。在这本书中，作者声称人类精英的秘密集团和外星人将联手控制其他的人类。这个超级精英的外层组织就是中央情报局（CIA），他们的整个活动很明显就是邪恶事业的一部分。政府幕后有一个秘密政府的观点以及虚构的“黑衣人”形象目前在美国大众文化中盛行，那些没有名字的官员被派去调查并（掩盖）宇宙活动，这些已经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并最终愚弄大众的文化）。

这些作者把这样的观点带到大众面前，实际上却是在自我愚弄。1977年，英国的盎格鲁电视台（Anglia Television）播报了一份伪造的文件《选择3》（*Alternative* 3），这份文件讲述了美国和苏联联合在太空建立殖民地，即建立一个天堂，目的是在地球环境被严重破坏后，选一些人过去定居。尽管这份文件很明显是骗人的——况且节目还是在4月1日播出的，那只不过是一个愚人节的游戏而已——但仍有很多人相信这个节目是

真实的。一年后，一本关于这个节目的书出版了，吸引了很多读者，那些人要么忘记了原来的节目，要么在美国从来就没有看过那个节目。这本书提出了一堆问题，并建立或者说巩固了很多 UFO 阴谋论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关键就是解释那些被选中的人的身份。他们是谁？他们在阴谋中的作用是什么？对此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一些人认为他们与外星人是一伙的，要么是阴谋者要么是被他们骗的（不管哪一个，都不过是普通的乌合之众而已）；或者，整个外星人入侵的场景是精英们编造出来的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即建立一个世界政府。不管如何解释，结果对人类而言都是悲惨的。而光明会神话在这种新的偏执狂融合物（fusion paranoia）的理论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强；威尔逊画了一个愚弄大家的地图，在里面他们处于一个精密的神秘力量结构的中心，现在似乎都成真实的了，同时，光明会看起来似乎是试图控制人类这一长达千年之久的阴谋背后的力量。

库珀通过这份伪造的文件来证明彼德尔堡集团也是阴谋会的组成部分。他觉得“文件”怎么可能通过嘲弄的方式由它的制造者揭露出来呢？这里面肯定存在一个双重骗局：

> 我在海军情报局（Naval Intelligence）了解到，至少每年一次……彼尔德堡集团和苏联代表以政策委员会（Policy Committee）的方式见面……议事日程包括在太空项目中合作统治“选择 3”的问题……一份标题为“科学报告”的 BBC 电视文件也揭露了这个真相，但后来竟被收回了……然后这个节目又说这份文件是假的……BBC 历史上从来没有播出过虚构的节目……“选择 3”是真的么，还是说它是宣布进入世界新秩序计划中的一部分呢？

政府的这个阴谋的进一步“证据”是 1987 年所谓的“MJ -

12 报告”，这个报告指出，政府的目的就是要隐藏外星人活动的真相。威廉姆·摩尔（William Moore）这个 UFO 学家，也是第一个将“罗斯威尔事件”带到公众面前的人，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声称，他们收到一卷含有高级文件图片的胶卷，这个文件上标有“最高机密”。它的副标题是“简报：MJ－12 操作的情况，为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而准备”，日期是 1952 年 11 月 18 日。这份文件包含了从杜鲁门总统时期开始的调查在美外星人活动——尤其是罗斯威尔地区——的详细情况。调查小组由 12 人组成，他们都是从最高级别的军方、情报局和科学组织中抽调出来的，同时简报中包含了这项工作的详细调查结果，其中包括一些组织声称观察到了大量的 UFO 相撞事件，以及发现了 UFO 外星飞船的残骸。这个调查要求最高级别的安全保障以防止和限制公众的好奇，例如，编造气象气球的故事就是为了对公众隐瞒“罗斯威尔事件”的真相。这份“MJ－12 报告”几乎立即分化了 UFO 圈子。文件中大量的矛盾显然揭示了这个文件是伪造的，里面字体的风格看起来是 60 年代才写上去的，而不是当时直接打印出来的，以及一个伪造得很差劲的杜鲁门签名。摩尔声称，发现这份文件是很幸运的事情：他当时正在整理关于“罗斯威尔事件”的文件，而“MJ－12 文件”正好可以证明他所有的观点。如果说是骗人的，那似乎不可能：这份文件具有相当的真实性，因为是由国防部评估的，所以一旦被郑重地对待，就将有利于拓展光明会神话的范围。虽然这份文件可能引起 UFO 爱好者观点的分化，但是对像密尔顿·库珀这样的“外星人—世界新秩序”阴谋论家而言，“MJ－12 报告”可以为他提供更大范围的攻击对象。对库珀来说，制造“MJ－12 报告”的个人并不仅仅来自军队情报系统，他们也部分来自于美国对外委员会这个组织：

> 我在海军情报局读到的最高机密文件中说道，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定了6个CFR（对外关系委员会）执委会的成员成为神奇十二人（Majesty Twelve）的专家组成员，出于安全原因，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多数十二人（Majority Twelve）。神奇十二人是一个秘密组织，目的在于掌握外星人的信息和计划。

库珀大量采用骗人的"MJ－12报告"让他和极右民兵组织分享了很多共同的观点，即：政府被背后的一个秘密政府所控制，目的在于奴役人民大众。把UFO的观点吸收进这个世界阴谋论中，也就把阴谋论扩展到了宇宙层次：这不再是一个世界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潜在的银河系政府（one-galaxy government）的问题。库珀在一个拥有很多版本，标题为"最高机密/神奇"（Top Secret/Majic）的文件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观点。就这样，在相信UFO的前提下，库珀大大曲解了民兵组织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巴罗克式的复杂阴谋论。库珀提到自己军人背景的时候，声称自己看见了外星人的飞船，上面有"三边徽章"（trilateral insignia）的标志，明显暗示了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和他们外星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政府对外星人活动这一现象的保密无疑就是为了防止大众恐慌，但是从另一个方面却证明了它想奴役自己公民的阴谋，为了实现这个阴谋，美国政府和外星人之间签订了一个条约。在这个条约下，美国政府将为外星人提供人类，这样，外星人就有足够的器官满足自己种族的需要：

> 他们将提供我们先进的科技以帮助我们发展科技。他们不再和地球上其他国家订立条约。他们拐走一小部分人之后，定期地根据目的对剩下的我们进行医疗检查并观察我们的发展情况，保证人类将不会对他们产生伤害，同时

> 还会继续返回到被拐走的指定地点，而人类也不会记得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外星人还会给神奇十二人提供一份名单，里面包括所有人类的名字以及定期要拐走的人。(Majestic 12 and the Secret Government)

不幸的是，这份条约的履行情况非常糟糕。外星人违反了条约中所允许的拐走人类的数目；同时苏联单独和外星人秘密谈判，希望他们也能拥有新技术。为了应对这一变化，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向洛克菲勒集团求助。（库珀声称，"关于外星人问题向洛克菲勒求助，这是艾森豪威尔对美国甚至人类的未来所犯的前所未有的错误。"）库珀描述了美国公民在政府经营的集中营中被拐走的详细经过，以及中央情报局从国际毒品交易中获利以资助外星人研究的事件，库珀在书中写的最后一个事件把故事推向了高潮，即世界末日（End-Times）的事件：时间旅行的外星人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剥夺了人们的宗教信仰：

> 外星人解释说，他们通过杂交的方法创造了我们，并通过宗教、恶魔、巫术、魔法以及神秘主义控制着人类……外星人拿出一个政府拍的全息图，并声称这个才是真正钉死基督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们。他们真的用我们纯正的宗教来控制我们么？还是他们真的就是我们宗教的来源并用这个一直来控制我们？（同上）

这个可笑的阴谋直接来源于《光明会!》三部曲，但到了90年代后期，它使库珀向极右势力的观点靠得更近了。他开始用《犹太长老议定书》（*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个文件支撑他那咯吱作响的阴谋论大厦，在《看见一匹白马》书中加了点内容，里面用指令（instructions）代替书中提到的"犹太人"和"光明会"，同时，他把外星人描述成一个邪恶的种族，

其出现就是为了打乱《议定书》的计划。1992年，在一次和UFO怀疑论者雅克·瓦利（Jacques Vallee）的访谈中，他将外星人分为四个类型，其中一种是有着很大鼻子的“灰人”，它的相反类型是高挑的金色“日耳曼人”（Nordic）和“雅利安人”（Aryan）。然后他进一步将日耳曼人和手稿中的天使作了类比，认为他们和“灰人”是相对的，“灰人”有可能是魔鬼之类的东西。毕竟，《圣经》中讲述了在最后几天和恶魔签订了一个条约……导致了世界末日的大决战（Armageddon）。

这时候的库珀已经迷失在外太空阴谋中了。在1998年的一篇日记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家人“成为联邦政府监禁或者消灭的对象了……因为他证明和追究了即将到来的光明会独裁下的世界新秩序的暴政这一事实。”他加入到了那些认为美国政府是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主要罪犯者的极右势力之中，这些极右人士还将美国首席法律官员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描绘成“韦科的屠夫”，而克林顿则是“光明会社会主义者的美国总统”。

库珀的信仰好几次都将他带到了反政府的道路上。他追随了民兵组织的“普遍法原则”，例如反对征收个人所得税、“汽车驾照法”或者地区水平以上的强制执行法。他经常声称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逮捕，他的话是对的，2001年的时候，他与法律执法机构的官员发生了枪战，在射中了一名官员头部之后，他被击毙。在这个事件之前，他声称收到了秘密政府在世贸中心爆炸案中的角色的消息，而他的死亡受到了一些民兵组织成员的怀疑，他们把这看作是光明会要使库珀永远保持安静的证据。

新时代阴谋论

有人说，如果一个人向右走得太远的话，那么你就会在路的左边碰到他。大卫·伊克（David Icke）令人震惊地通过新时代的眼光来分析光明会的奇怪言论，成功地为外星人阴谋这个理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然而，他的结论和库珀以及他的同辈非常相似。不过伊克的不同之处或者说让他区别于其他阴谋论家的地方是——他世界观里面的光明会并没有和外星人结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外星人，而且还是一种变形蜥蜴（shape-shifting lizards）。

大卫·伊克在着手创建银河系这一宏大的阴谋论，即新时代阴谋论（New Age conspiracy theories）之前，在很多职业领域中获得了成功。他一开始是职业足球运动员，可是后来的类风湿关节炎阻断了他这一事业，然后他成了BBC体育节目的写手和评论员。到20世纪80年代，他转而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并成了绿党发言人。1990年，他接受了一个精神理疗，以缓解他关节炎的疼痛。期间，他说自己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精神体验，这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伊克所言，在他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接到了一个强烈的精神信号，这个信号告诉他，他在地球上的作用就是要治愈地球的创伤，而且一旦他这样做的话，就会闻名全世界。之后，伊克在秘鲁的一次精神测试中，又有了另外一次强大的能量从他身体中涌出的经历，"神奇的力量从我手中涌出"，非常的强烈，以至于"我的腿持续颤抖了24个小时"。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最近的这段职业生涯——书写和宣讲他自己的这套独特观点。

历史学家迈克尔·巴昆（Michael Barkun）根据伊克前4本

书的发展轨迹推出了伊克的理论发展情况。伊克从1994年出版第一本书以来，都是从相似的前提出发，然后很快就转到了令人震惊的超现实视角。这些书的第一部即1994年的《机器人的背叛》（*The Robot's Rebellion*），这本书采取了和阴谋论者相同的阴谋论写作方法，在书中，伊克选择了一个叫兄弟会（Brotherhood）的组织负责操控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件，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兄弟会实际上是那些巨大的秘密组织网络的集合体，是拥有金字塔结构的组织，处于这个金字塔最顶端的就是光明会。该书中，伊克和内斯塔·韦伯斯特的观点有很大的相似性；韦伯斯特曾经提到过《议定书》，但和伊克一样，她也劝读者将“光明会”替换为“犹太人”。光明会，伊克认为，通过兄弟会这一巨大网络控制着世界，最终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这个组织采取的方法很普通，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利用控制世界金融系统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紧接着是在……《真相将让你自由》（*And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1995）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金字塔体系结构：在金字塔底层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之上的运作体系是怎么样的，他们仅仅是这个大阴谋的棋子而已。那些被选到金字塔顶端的人被称作“全球精英”，但即使他们自己也都是由外星人控制的；这些外星人称为“监狱看守”，在他们之上还有叫“露西法意识”的东西。外星人的一支军队通过在地球的表面设置一片“负能”从而控制着地球。这片负能就是那些位于金字塔最高处的精英们通过防止世界上的人拥有精神拯救能力的方式促进一个新世界秩序的产生。但1999年《天大的秘密》（*The Biggest Secret*）一书的出版，将伊克和其他所有阴谋论者最终区别开来，他在书中写道：“我希望我没有向大家介绍下面的信息，

因为它使故事变得很复杂，并让我可能成为大众的笑柄。”此时，他宣称已经发现了统治地球超级精英的身份：他们是来自迄今未知的某星球的爬行动物，叫德拉寇（Draco），他们居住在地球地下某山洞中，试图通过和人类繁殖来控制人性。这些有人的面容和爬行动物血统的杂种生物现在正控制着这个世界。《孩童帝国》（*The Children of Matrix*，2001）一书进一步揭露了这些生物在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彼德尔堡集团和国际银行等组织中的作用，同时认为那个拥有古代爬行动物“血统”的杂种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时期，这也就把一般的阴谋目标带进了科幻小说的世界。所有统治世界的家庭和领导者都拥有共同的血统（“这些家庭之所以不停地杂交并非出于势利的动机，而是为了满足他们控制这个特殊结构的欲望”），这个血统“可以追溯到外星人干涉的时期，正是这些外星人创造了它”。同时，就是这群杂种人控制着世界——“称呼它为光明会的目的是想要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

一个曾经是绿党成员的人认为伊克“从来不会关注他不喜欢的阴谋论”，同时你也很难发现一个阴谋、神话或者传奇不在他那个巨大阴谋论中，从前基督时代的金字塔神话到现在的一个星际新秩序，这些脉络都可以从他那个模糊的新时代哲学中得到证实。伊克代表了一种观点，即一个面临世界末日（End-Times）的世界和一个低级趣味的科幻小说中的世界相冲突的观点，所有这些导致了对神秘的事物和“机会”（alternative）哲学的兴趣。一个例子就是，他在新千年来临时所发出的警告中，认为光明会将创造一个不好的千年，其目的在于利用世界的能量。在书中他展示了“错误千年的光明会仪式以及光明时代到来”的图景，他认为，新千年之所以会到来，就是因为我们采

用了阳历[1]纪年法，这个历法是由在梵蒂冈工作的光明会成员推广的。伊克认为，这个历法并不是为了衡量时间，而主要是为了和太阳周期以及天上各大星星的位置保持一致——这些对光明会的核心事业而言至关重要。他指出，精英们对千年夸张的庆祝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这是光明会的密谋，所以特别选择了某些重要场所，如埃及金字塔之类的，同时所有参加者都是“光明会成员”，比如乔治·布什等人。

一方面，很难直接将大卫·伊克划入到阴谋论作家之中，因为1991年的时候，他在英国一个叫泰利·沃根访谈节目（Terry Wogan's talk show）中当场被观众和嘉宾嘲笑，他当时肯定相当难受，这也让他从此具有了比别的阴谋论家更为直接的怀疑精神。然而，我们很难为他那些人数众多的追随者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方法。伊克后来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举行的巡回演讲都获得了成功，每次出场观众席都爆满。大多数时候，他的出场都好像是某种民兵组织的博览会，他那“新时代崇拜”（New Age spirituality）和能量治疗法（energy healing）的观点与生存主义及自由携带枪支的民兵组织的观点本身就很不协调，但他却硬要将这两者连接起来。他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世界贸易大厦袭击事件的书中表达了和右翼反政府组织相似的观点，认为这个事件是政府通过光明会机构做的，所以政府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书中表现出来的对能量及土耳其玉治疗（turquoise）的崇拜并不具有什么危害性，但书中揭示了《议定书》的邪恶基础，并把这个基础描述为“20世纪正在发生的令人震惊的预言”和“很有可能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和爬行雅利安人共同创造出来的”。

---

[1] 目前全世界通用的历法，又称格里高利历。

由于大卫·伊克的揭露，光明会神话看起来已经破灭了。伊克那混合多种阴谋论观点的理论，终因自身过于庞大而倒塌了。这一理论拙劣地模仿了罗伯特·安东·威尔逊的理论，即：通过“对有钱人的责难”来宣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他的理论中包含了每个世界事件，致使他的理论没有办法有更大的突破。同时，正如它不可能被消灭一样，光明会的观点不可能得到证实。在因特网时代，博客和 BBS 使得人们的观点可以在全世界进行交流，这也就为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光明会的神话还能够继续存在？它又将何去何从呢？

结论：今日光明会

今天，在网上搜索光明会，你会发现至少有 100 万个包含了从它原本历史定义的有关光明会故事的网站，即从一个没有名气的短命哲学协会，一直到极端的阴谋论中所说的外星变形人的代名词的各种版本。一次随机抽查表明，光明会可能是撒旦、共济会或亚特兰大人（Atlantan）；也可能是非常聪明的人，掌握着古代神秘的钥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这个世界。他们或者是时间旅行者，或者是三边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会，以及中央情报局的神秘成员，或者是美国总统、教皇或者本身就是恶魔。

困难的是很难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观点。关于光明会的观点曾经偏离过它历史上的本来面目，它们看起来无休止的互相交换和融合这个神话的观点，同时也不可能提前确定它们有什么可能的政治价值。光明会神话如今突然出现在一些令人惊奇的地方，例如，最近团体说唱人杜帕克·沙库尔（Tupac Shakur）重组了光明会理论的要素，草率地将半讽刺、半严肃的阴谋论和数字算命术融进了他的新单曲《光明会：七日学说》（*The Don Illuminati*：*The Seven Day Theory*，1996 年死后发行）之中。有关光明会的观点从最初一个省级法律专家的脑力劳动成果到今天演变成为科幻小说的化身，令人恐惧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是很多秘密社会中的一个，而是因为它是整个秘密社会中最

为关键的一个，但这样一个过程为何会经历了250年之久呢？

光明会神话已经证明了它的所有阴谋论观点都具有无尽的适应性，并能够将现在的恐惧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融入进来，这是其他阴谋论会所不具备的。这个集团从一开始就是与它们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到的最坏的东西相联系的。它们的启蒙哲学因为怀疑教会的权威性，提倡自然神论，而与当时的宗教正统争执不下。这导致它成为了邪教，指责也由此开始。当异教概念发生改变的时候，光明会的定义就发生了变异，它反映了社会恐惧的最阴暗的一面。一旦光明会和危险概念等同的时候，这个集团原本的宗旨就被遗忘了，它的信条也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而披上了人们最恐惧的那些东西的外衣。

当对光明会的恐惧扎根于18世纪的欧洲时，启蒙民主的秩序原则深深地威胁到了社会，尤其是社会的上层阶级，他们非常恐惧社会剧烈的变迁。如同法国大革命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恐惧是正义的：法国的教会力量，国王神圣权利的思想以及卫道士的权威无可挽回地丧失了。这些对革命思想力量的焦虑很容易转移到新生的美国，在那里，新生国家不断增加的痛苦表明，他们对新英格兰牧师保守的态度。这个时候，光明会成为激进主义的同义词，也是从这里迈了一小步把它用于解释暴乱和无神论。由于是清教徒发现了美国，所以很难知道哪个更糟糕：政治激进还是无神论。

当关于光明会的观点一百年后再次出现的时候，这个组织的最初目标被遗忘了。这个名字，现在是秘密、异教和危险的代名词，同时很容易成为20世纪对以犹太人为代表的异族恐惧的附属物。修正主义历史学家（Revisionist historian），比如内斯塔·韦伯斯特，使古老的有关光明会的观点重生，并把这种观点通过一系列历史标题的方式引荐给新的读者，也就产生了今

天我们所知道的故事起源。但是今天很多资料，人们在引用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或更糟糕，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并不在意——韦伯斯特的想法源于对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反犹主义遗产的继承，另外，她的光明会看法的资料大多引自一份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文件，即伪造的《犹太长老议定书》。

20世纪50年代，在以麦卡锡为特征的歇斯底里式的怀疑时期，一个人对把光明会的故事带到中心舞台负有责任，这个人就是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极端保守的“约翰·伯奇协会”的创始人。现在，光明会简单地以“内部人”（Insider）而为大家所熟知，他们代表了一个超机密的精英集团——政府、大企业和全球事务的真正幕后操控者。在韦尔奇看来，他们的真正的目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光明会神话衍生出了两个不同的路径。一个是在极右圈子里继续发展的观点，即：光明会在世界新秩序中的阴谋，现在这种观点以世界末日的图景出现，其中光明会扮演了《启示录》中代理人的角色或者它们自己就是反基督者。另一个是大众文化中的阴谋论，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觉到它所带来的震撼。罗伯特·安东·威尔逊，好几本关于光明会神话和阴谋信仰本质的搞笑版小说的作者，与罗伯特·施合写的《光明会!》三部曲开了这个头。

威尔逊和施在他们那个时代深刻地反映了阴谋会信仰转变的本质，即政府掌握了关于阴谋和诡计的信息，却不透露给公众，这点成为目前大家的共识，并且也是文化图景的一部分。肯尼迪遇刺案（这个事件发生40年后，繁衍了它自己的阴谋论产业并赋予了自己新的生命力）和“水门事件”的后果就是使固定的永恒真理变得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不信任和怀疑。

这是人类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部分本性：

在政府版本的事件中的某个地方隐藏着真正的问题；它仅仅需要被发现而已。《光明会》三部曲里的一个人物，在承认被有选择的阴谋论的历史观点所吸引的时候，表达了这种想法：

> 你已经对两百年来一样的历史观点厌倦了，这就使我觉得如果我要接受的话，我就得继续保持坚定。但我是被强制的，我承认……部分因为我被教授的历史正统版本让我有了这样的意识，我知道人们怎么通过歪曲历史来满足自己的观点……如果说在过去几年我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比较疯狂的观点更容易看起来是真的。

那种供选择的历史观点，在《光明会》三部曲的刺激下，今天依然被坚持着，喜欢秘密的和神奇的内容，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同反主流文化一块兴起——是今天颇受欢迎的新世纪信仰的先驱。在这种传统下，光明会的认知（虽然是错误的）是和遥远的、神奇的过去，以及古波斯的刺客或者神秘的16世纪的西班牙先觉派（Alumbrado）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被灌输古代的秘密的知识，掌握了真正的启蒙秘密。毒品文化显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最好包含了一个扩张意识的、对被禁知识的怀疑的精神，而不是一个古老的神秘组织，尤其是有数世纪之久——如果不是千年——被当局禁止，因为它的危险想法。

与此同时，对政府的不信任在20世纪后半期变得普遍起来。1964年的一次民调显示，75%的回答者相信联邦政府“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做的都是正确的”。到了70年代中期，“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影响使公众的信仰出现了严重的缺口，对于上面的这个问题，三个答案中间只有一个是“是的”。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公众的批判精神达到了历史最高：只有25%的被调查者相信政府做的都是对的。政府涉及自我牟利阴谋的想法变得普遍起来，在千年到来之际，有四分之一的人相信政

府精英与某种阴谋有关。

今天，似乎我们都相信阴谋论，并把它作为解释世界的方法——或多或少地。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我们对政府形象和公务员坚定信仰走向终结的苗头。我们几乎继续了对政府的虚伪、试图掩盖的事情以及丑闻进行揭露的要求，并相信我们有权对政府的观点提出质疑。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乃是一种健康的批判，而不是极端的偏执，同样，这也意味着阴谋论是一种可接受的，甚至是解释世界的老一套方法。这又清楚地表明了阴谋论就这样走进了大众文化之中。

歪曲的、故意窃取自我意识的阴谋论，从70年代由罗伯特·安东·威尔逊建立以来，今天已经广泛传播到大众电影、书本、网络游戏以及网站中。“万事万物相联系”或者（《X档案》的标语所说的）“真相就在那里”的观点可以通过速记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观点在反应了对政府不信任的同时，也体现了滥用阴谋论的情况。斯蒂芬·杰克逊的光明会游戏以及相关的网站、简报和网络论坛在讽刺了阴谋论同时，也表现了反政府主义；一个模仿要点，即在看到里面的笑话时就会会心地眨眨眼，并且包含了目前的信念，你应该在接受“官方”对事件解释的同时和这种理论一样疯狂。这就使得反主流文化有机会分得一杯羹，允许他们反对官方语言，但是同时也使他们自己和古怪的极端阴谋论分离开来。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阴谋论传统上是右翼的活动范围，但现在已经通过大众文化咨询及世界问题的方式渗透到了左翼的活动之中。近年来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1999年的西雅图事件，2001年的热那亚事件——各种政治人士都有参与。同时，左翼民主反政府人士在痛苦地思考如何与右翼反政府认识划清界限——对世贸组织工作或者政府和大企业及彼尔德堡集团活

动的相互勾结的怀疑，这两个集团的观点并不是一致的。他们可能有共同点，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却是截然不同的。自我嘲讽意识充满了关于阴谋论的大众文化，这使得左翼就此区别开来。

那么这对光明会神话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它允许自己成为衡量阴谋论信念的准绳——你可以怀疑政府撒谎了，但如果你相信光明会神话的话，那么你就越过了这条线——同时，成了巨大的无所不包的阴谋论的重要素材。最近两部电影很好地表明了光明会是如何在这方面相调适的。最近的《古墓丽影》（*Lara Croft Tomb Raider*）短暂地提到了反派角色的光明会成员身份，这已足够反映出阴谋背后的主导力量是谁了。是否是因为剧本的问题还是有坚定的信心认为观众明白里面所指的是什么，里面并没有解释光明会是什么或者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它们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已经存在的大众文化词汇，作为全球恶势力的同义词。迪斯尼最近进军动作片市场，拍摄了一部合家欢式的电影《国家宝藏》（*family-friendly National Treasure*），里面更加有趣地发展了秘密组织的神话，它承认并积极揭露了秘密组织在美国建国中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观点，现在他们是作为一种善的力量而存在着。圣殿骑士隐藏了宝藏——这种轻率地和美国纪念物联系的目的——和民主原则作了对比：它太珍贵了，以至于不能仅仅托付给一个人。

虽然这暗示了另一种光明会神话变异（光明会有了合家欢式的迪斯尼版本），但它并不代表这个故事的最终版本。光明会邪恶的起源——根植于反犹太主义和排外情绪——永远不能从光明会的故事中剔除出去。网络上流传的金字塔观点和留言也大多清楚地——虽然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是从令人不愉快的光明会神话起源中发展而来的。

由于网络允许人们快速且无限地交流自己的观点，无需规

则或者选择，这就促进了可供选择的历史观点的提出，它和“官方”版本看起来具有相同的分量。在这个领域中，内斯塔·韦伯斯特和约翰·罗比逊被认为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提供了历史上光明会存在以及具有威胁性的“有价值的文件证据”。当像丹·布朗（Dan Brown）这样的小说家，把事实和幻想结合在大众小说之中的时候，真相就更加扑朔迷离了。一旦意识到了这种争议，他在《天使与恶魔》的序言中写道“光明会是历史事实”，然后为这个组织编了一个完全虚幻的起源，里面包含了血腥的仪式和使人疯狂的复仇故事。这个后来在网上就成为了历史真相，同时在外面还笼罩了一层曲折的传说。

光明会信仰已经离它真实的历史事实很遥远了，以至于这个故事可以用于任何用途。光明会甚至在世贸中心遇袭的观点中出现，它命令傀儡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制造了这起事件，在目前它无疑也同时在穆斯林世界里训练自己的代理人。一旦人们感觉到无助、深陷黑暗中，需要一个简单答案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会得到继续发展，并伴随恐惧和怀疑的发展而发生变异。

讽刺的是，事实上光明会的目的恰恰相反。为了促进启蒙运动，它把目标定位在与蒙昧主义、偏见和无知、奴役进行斗争，正如韦斯豪普特自己在 1787 年写的那样，“理性的阳光”是为了“驱散迷信和偏见的乌云”。光明会永恒的遗产似乎是作为恐惧和无知的“卜仗”[①]（divining rod）。无论那些有关光明会的文献如何现身，它们事实上都是为反启蒙运动而工作，在那里，歇斯底里、迷信和偏见胜过宽容和理性。

---

① （一种用迷信方法探寻矿脉、水源的）木叉式卜仗。

如果直到今天还依然记得光明会的话，那么它也是一种模糊不清的邪恶力量；否则就是一种对危害现状的令人莫名恐惧的符号。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神话的起源——巴鲁尔神父——将会惊奇地发现，这个组织很多十恶不赦的罪行来自以下几点："人类应该平等与自由；主权原则本质上源自人民；法律无疑是公意的表达。"今天，我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为什么这么一个值得称赞的人物会变得如此令人不解、被如此歪曲，且在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它反意的代表？这个故事似乎是通过窃窃私语，代代相传，有意或无意的，通过歪曲里面的意思来反映我们今天的流行观点。正如每个故事都是建立在无数先人的基础上一样，光明会神话也是一个混合的创造物，一个有迷信和恐惧残余组成的法兰肯斯坦怪物①，它的真实性从来不被怀疑。正如韦斯豪普特自己写的那样："啊，人类，还有什么你不相信的东西呀?"

---

① 英国女作家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所著小说中主人公，系一生理学家，亲手创一怪物，但结果自己被怪物所毁。

邮购书目

新书、畅销书

日本史	[美] 詹姆斯·L. 麦克莱恩	52.00
大陆台湾六十年	李成武、[中国台湾] 戚嘉林	38.00
西方文明史	[美] 理查德·E. 苏里文	88.00
霍金的宇宙（修订版）	[英] 戴维·费尔津	48.00
数学的故事（修订版）	[美] 理查德·曼凯维奇	28.00
霍金的宇宙（修订版）	[英] 戴维·费尔津	48.00
八正道	[斯里兰卡] 德宝法师	25.00
非常坛经	[中国台湾] 海云继梦	58.00
非常金刚经	[中国台湾] 海云继梦	48.00
本经疏证	[清] 邹澍	68.00
理解中国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32.00
基辛格：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 亨利·基辛格	32.00
进步简史	[加拿大] 隆纳·莱特	30.00
石油政治学	[美] 迈克尔·克莱尔	32.00
观呼吸	[斯里兰卡] 德宝法师	25.00
生命不仅仅如此	樊馨蔓	30.00
台湾山海游	[中国台湾] 蔡文居	30.00
内观	[美] 威廉·哈特	25.00
禅的真义	[日] 铃木俊隆	24.00
雪豹	[美] 彼得·马修森	32.00
我的灵魂遇见动物	[美] 盖瑞·科瓦斯奇	22.00
禅学的黄金时代	[中国台湾] 吴经熊	25.00
是肉七分毒	[加拿大] 彼得·伯沃什	22.00
我们为什么生病	[美] R. M. 尼斯 G. C. 威廉斯	29.80
世上是不是有神仙	樊馨蔓	25.00
正念	[美] 乔·卡巴金	25.00
光荣与梦想之二：战争与和平	[美] 威廉·曼彻斯特	32.00
海云继梦讲人生·非常心经	[中国台湾] 海云继梦	48.00
基辛格越战回忆录	[美] 亨利·基辛格	56.00
光荣与梦想之一：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	[美] 威廉·曼彻斯特	32.00
林清玄说禅之三：好雪片片	[中国台湾] 林清玄	24.00
林清玄说禅之二：香水海	[中国台湾] 林清玄	24.00
林清玄说禅之一：会心不远	[中国台湾] 林清玄	24.00
林清玄解《百喻经》	[中国台湾] 林清玄	28.00
医路	沉着	29.00
寻找薛定谔的猫（修订版）	[美] 约翰·格里宾	38.00

上善若水	王壮弘	42.00
兵器史	[美] 罗伯特·L. 奥康奈尔	42.00
联合国过去与未来	[美] 保罗·肯尼迪	29.80
俄国史	[美] 沃尔特·G. 莫斯	65.00
西方大历史	[法] 马雷	60.00
熊猫的拇指	[美] 斯蒂芬·杰·古尔德	30.00
自达尔文以来	[美] 斯蒂芬·杰·古尔德	28.00
海蒂报告：海蒂篇	[美] 雪儿·海蒂	35.00
海蒂报告：职场篇	[美] 雪儿·海蒂	35.00
海蒂报告：家庭篇	[美] 雪儿·海蒂	40.00
改变世界的领导力	[英] 安德鲁·罗伯茨	30.00
生命的安顿	王　伟	38.00
国家间政治	[美] 汉斯·摩根索	58.00
美国世纪	[美] 沃尔特·拉菲伯等	68.00
法医探案	[美] 迈克尔·巴登等	30.00
外科医生手记：生命的脸	[美] 舍温·努兰	28.00
外科医生手记：死亡的脸	[美] 舍温·努兰	28.00
营销批判	[英] 杜雷顿·勃德	32.00
深度瑜伽	[美] 克里斯蒂·特林顿	48.00
大宇宙百科全书	[英] 约翰·格里宾	39.80
你就是世界 II	[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	22.00
成功演讲技巧	[美] 琼·戴兹	20.00
领袖们	[美] 理查德·尼克松	42.00
伟人与大国	[美] 赫尔穆特·施密特	38.00
蓝血十杰(修订版)	[美] 约翰·伯恩	39.80
经典德鲁克(增补版)	[美] 彼得·德鲁克	32.00
爱因斯坦的圣经	[美] 萨缪尔	38.00
歧黄医道	廖育群	38.00
金赛性爱对话	[美] 琼·M. 赖尼希	48.00
大唐狄公案(全译注释本)	[荷] 高罗佩	98.00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修订版)	[美] 麦克·哈特	29.80
女性健康课	[美] 克里斯蒂娜·阿默尔	58.00
智慧的禅公案	杜松柏	28.00
禅是一盏灯	杜松柏	28.80
人·岁月·生活(插图合订全本·上下卷)	[俄] 伊利亚·爱伦堡	98.00
修道——老子的生命真言	王邦雄	30.00
修心——孔子的生命智慧	曾昭旭	26.00
修身——孟子的生命哲学	刘锦贤	28.00
修真——庄子的生命本质	王邦雄	26.00
你就是世界	[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	22.00

其他

新世纪万年历—1901 ~2100 年阴历、阳历对照和常用知识宝典	秦　钢	20.00
一年笑到头	[美] 大卫・格罗斯	19.80
隐形战斗机	[美] 戴维・奥利弗等	32.00
溃疡 — 直面中国学术腐败	方舟子	21.80
《故宫珍本丛刊》精选整理本丛书		
◎ 渊海子平	[宋] 徐子平/编	45.00
◎ 御定六壬直指（上、下）	李　峰/注释	98.00
◎ 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宋] 陈承 裴宗元等	40.00
◎ 三合集・卫生汇录	[明] 张继科/撰	20.00
◎ 种杏仙方・内府药方・药性分类	[明] 龚廷贤/编辑	24.80
◎ 名医类编	[明] 刘泽芳/原撰	24.80
◎ 阴阳五要奇书（上、中、下）	[晋] 郭璞 景纯/著	128.00
◎ 声律启蒙与诗词格律详解	袁庆述/著	25.00
太平洋战争史话系列　共 11 册　每册定价		29.80
◎ 偷袭珍珠港　◎ 菲律宾浴血　◎ 燃烧的东南亚　◎ 缅甸泥潭		
◎ 拉包尔　◎ 瓜达尔卡纳尔　◎ 中途岛之战　◎ 军国末日		
◎ 马里亚纳　◎ 硫黄・冲绳"玉碎"　◎"大东亚共荣圈"之梦		
第三帝国丛书・人物篇　共 5 册　每册定价		25.00
◎ 戈林 兆丰/著　◎ 邓尼茨 王新霞/著　◎ 戈培尔 郭威/著		
◎ 希姆莱 鲁文岚/著　◎ 隆美尔 林文/著		

我社图书邮购方法：

方法一：可将所购图书的名称、数量等发至 hnyougou@sina.com 订购；

方法二：可直接邮政汇款至：
北京朝阳区北苑家园清友园 6 号楼 4 门 203 室
邮编：100012　　收款人：李鹏

方法三：可以直接将书款汇至：
银行卡号：
（1）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
卡号：622 202 020 001 295 0420　　开户名：李鹏
（2）中国邮政储蓄绿卡
卡号：622 188 100 003 986 7932　　开户名：李鹏

无论以何种方式订购，请务必附上您的联系地址、邮编及电话。款到发书（邮政挂号），免邮寄费，如需快递，另付快递费 5 元/每册。

请咨询电话：010 －84966011/12 转 82　（9：00 －17：00，周六日休息）
15001134197（短信联系）

邮购信箱：hnyougou@sina.com

博客链接：http://blog.sina.com.cn/hnbook



who are the illuminati?

光明会，一个简单的启蒙组织，诞生在德国。阴谋论借它的名义四处招摇。卷入其中的有华盛顿、基辛格、肯尼迪、乔治·布什、洛克菲勒、老福特；涉及的事件有法国大革命、种族灭绝、金融风暴、世界末日、UFO、外星人，以及我们熟悉的文学作品：《天使与恶魔》《古墓丽影》《国家宝藏》《X战警》。我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谁是光明会成员？



ISBN 978-7-5443-3158-6

9 787544 331586 >

定价：28.00元

陈列类别◇社科 ◇西方历史